

三十至七十年代的 托洛茨基主义

米·伊·巴斯马诺夫著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三十至七十年代的 托洛茨基主义

(苏)米·伊·巴斯马诺夫著
苗为振 陈永秀 阎志民译

人 民 出 版 社

本书由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翻译。译者如下：苗为振——前言和第六章，陈永秀——第一、二、三、五、七、八、九章，阎志民——第四、十、十一章和结束语。全书译文由苗为振统一校订。

М. И. Басманов

В ОБОЗЕ РЕАКЦИИ.

ТРОЦКИЗМ 30~70-х ГОДОВ

根据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9年版译出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

Sanshi zhi Qishi Niandai de Tuoluocijizhuyi

〔苏〕米·伊·巴斯马诺夫著

苗为振 陈永秀 阎志民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182,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3001·1862 定价 0.93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是系统地评介、批判现代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著者米·伊·巴斯马诺夫为苏联历史学博士。

巴斯马诺夫认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3到1917年，托洛茨基主义是作为孟什维主义和国际考茨基主义的变种而出现的；第二阶段从1917到1927年，托洛茨基主义是作为苏联党内和其它许多国家共产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派别而存在的；第三阶段从1927年到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从一个党内派别变成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革命的流派，结成了与国际共产主义相对抗的组织。鉴于学术界对于托洛茨基主义活动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研究得比较多、对第三阶段研究得比较少，而托洛茨基主义在六七十年代的活动又有所加强，急需从理论上回答：托派重新活跃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六七十年代托派的思想政治纲领是什么？它与托洛茨基的“正统学说”的关系如何？托派在新的条件下企图依靠什么人，他们采取哪些手段来加强自己的地位等等，因此著者写了这本书来回答这些问题。

全书共分十一章，详细地介绍了现代托派的发展历史、组织状况、理论观点和策略手法等，材料比较丰富，对于我国理论工作者了解和研究现代托洛茨基主义以及苏联当前对

待托派的态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著者在批判现代托派时，连篇累牍地引证苏联党的文件及其领导人的著作，竭力为之宣扬、吹捧，而对我国的党和领导人，以及与我国友好的兄弟党组织，则加以攻击和污蔑，把臆造的所谓“毛派”同托派相提并论。这些地方，我们基本上未加删节，以供读者分析批判。

前 言

1927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一千五百多名共产党员——他们大部分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在会上讨论对国家的命运，对世界革命过程以及对整个人类的社会进步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苏联正满怀信心地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迈进——这就是代表大会对苏联人民在第一个十年期间进行的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所作出的评价。党号召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

代表大会批准了关于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从而为以后各个历史性的五年计划打下了基础。这些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有助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自己的伟大解放使命，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创造了物质前提。

“我们是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①这是中央委员会向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的英明和远见卓识已为以后的全部历史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4页。

所证实。苏联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巩固和发展了伟大十月的革命成就，为世界革命运动的其他队伍开拓了通向无剥削的社会的道路，开创了整个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一伟大功绩之所以可能实现，应归功于始终不渝地遵循列宁所开创的路线的党的卓越领导。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完成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粉碎列宁主义的最凶恶敌人——托洛茨基主义的任务，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党的团结，而党的团结是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决定性条件。代表大会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在思想上已同列宁主义决裂，蜕化成了孟什维主义的集团，走上了向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投降的道路”。^①代表大会宣布，参加托派和宣传其观点同留在党的队伍内不能相容。

这次代表大会反映了全党的意志。1927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公布了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提纲，并宣布就这份提纲进行全党争论。在当时参加党的会议的七十三万零八百六十二名党员中，投票赞成中央委员会的路线的有七十二万四千零六十六人，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四千一百二十人，占百分之零点五，弃权的有二千六百七十六人，占百分之零点三^②。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热烈支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经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的共产国际执

① 参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9页。

② 参看《苏联共产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1975年莫斯科版第533页。

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议着重指出：“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赞同它的观点，是同今后继续留在共产国际队伍内不相容的。”^①正象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托洛茨基集团在纲领问题、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方面所持的观点，表明该集团已滚到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去，并在客观上变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工具。因此，把它开除出联共(布)，是正确的和必不可免的事情。”^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光荣地完成了共产国际在二十年代中期提出的揭露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存在于各国党内的政治派别的任务。^③

在这方面，各国共产党人依据的是列宁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所作的批判。列宁多年来一直在揭露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在本质上同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格格不入的观点体系。他彻底揭穿了托派“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实质和孟什维克投降主义实质，对托洛茨基破坏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原则的活动进行了坚决回击。他强调指出，托洛茨基“纠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敌人”，“联合一切酷爱思想上分崩离析的人”^④，“他总是他那一套=摇摆，欺诈，装得象一个左派”，却“帮助右派”^⑤，而且他“觉得‘可爱的’，仅仅是欧洲机会主义的榜样，而决不是欧洲党性的榜样。”^⑥

①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提纲和宣言。1919—1932年》，1933年莫斯科版第749页。

② 同上，第873页。

③ 参看上书第481—482页。

④ 《列宁全集》，第17卷第5页。

⑤ 同上，第35卷第279页。

⑥ 《列宁选集》，第2卷第500页。

列宁揭露托洛茨基主义反动本质的许多著作，其政治意义不仅仅在于作出了上述批判，还包含着有关世界革命过程根本性问题的许多深刻的理论结论。正象在揭露其他各种机会主义时一样，列宁在这里也发展和深化了有关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许多论点。

列宁对托派的折衷主义、诡辩术、唯意志论、主观主义和政治上无原则性之类特点的分析，也具有不可磨灭的政治价值和科学价值。反历史主义，故意无视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蛊惑人心地把一些陈腐刻版的公式奉为一成不变的信条——托派在方法论上表现的诸如此类的缺陷，则是在二十年代后半期，由继承和完成了列宁在思想政治上的不妥协斗争的共产党人所揭露的。

这样，各国共产党便捍卫了列宁关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粉碎了托派把社会主义说成属于遥远未来的投降主义观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遵循列宁的遗训，制订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实行社会改造的明确纲领。共产党人鼓舞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使他们确信，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项在当前就可以付诸实施的现实任务。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战前年代的顺利实现，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突击力量——法西斯主义的溃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各殖民帝国的解体，我国向共产主义建设的过渡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向发达社会主义的胜利前进——所有这一切使世界的面貌发生了令人无法

辨认的变化,加强了社会主义、和平与民主的阵地。

正象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所指出的,“我们正在迎接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主义将以历史所规定的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成为地球上占居优势的社会制度,它将给整个劳动人类带来和平、自由、平等和昌盛。这并不是乌托邦,也不是美丽的幻想。这是现实的发展前景”。^①

二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功绩,在于它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粉碎了托派贬低这一理论的意义,以假马克思主义的投降主义思想取而代之的企图。各国共产党人坚决支持列宁对世界革命过程的想法以及列宁关于各个国家中的革命动力问题、关于民主主义任务与社会主义任务在革命中辩证结合问题的提法。列宁的理论来源于革命发展的内在规律,它使革命的参加者建立起胜利的信心,而这种信心的决定性因素首先是工人阶级既善于站在革命运动的前面引导人民群众跟着自己前进,同时又善于把争取民主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共产党人揭露了托派不承认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有必要建立劳动群众的广泛联盟的思想的反动性。这样便粉碎了托派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上宗派主义道路和使它脱离群众的企图。

共产党人揭露了托派从一个国家向另一国家“移植革命”的方针的投降主义实质。按照这种冒牌理论的公式,各国革

^① 《遵循列宁主义的方针。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6卷,1978年莫斯科版第598页。

命的命运归根到底并不取决于革命所发动起来的本国的力量，而要看是否能得到邻国革命的支持。外部的条件压倒了内在的条件，而且可以决定事态的发展。大家知道，列宁坚决反对“移植革命”的策略。他在批判那些想为其他国家规定革命日期的人的观点时说道：“……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即使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不会执行的”。^① 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教导说，革命不能从国外引进，而要有有关国家的人民自己去实行。二十年代的各国共产党人一致拥护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粉碎托洛茨基主义，意味着列宁关于把党建设成战斗的革命先锋队的思想取得了胜利。托派早在革命前就试图在党的问题上向列宁主义挑战，决不是偶然的现象。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思潮的主要内容，始终是敌视关于建立和巩固一个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集中化的、有纪律的革命组织的纲领。苏共中央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提纲强调指出：“在建党之前，列宁便进行了大量的思想理论工作，他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对改良主义的以及其他机会主义的思潮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没有这些清扫工作，便不可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与解放运动的结合，便不可能奠定一条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路线”。^②

托洛茨基利用列宁生病以及后来逝世的机会，对党发动了正面的攻击，妄图削弱党，并从思想上腐蚀列宁主义的组织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781页。

^② 《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纲》，1969年莫斯科版第9页。

原则。托洛茨基在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展开进攻的同时，纠集了由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的反对派和党内宗派，其中包括原来的孟什维克、崩得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对于这种试图把党从列宁主义拖向机会主义立场的活动，共产党人予以坚决的回击。

各国共产党通过反托派斗争保卫了伟大十月的成果。到二十年代的后半期已经十分清楚，托洛茨基实行的整个政策的宗旨，就是要破坏世界革命运动的堡垒、第一个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国家——苏联。托派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方法，与不择手段地妄图动摇我国人民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的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完全相同。他们开始成立地下的小组，越来越多地散发诽谤性宣传材料，组织反苏的示威，为发动国内战争进行准备工作。托洛茨基在被开除出党之后不久，便向他在国内外的追随者发出指示信，号召他们更加积极地“打击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组织罢工和反苏行动。

当时在红军中担任指挥员的某些托派分子与原来的一些白匪军官建立了联系，这些白匪军官曾经酝酿过在国内实行武装政变的计划。国外的托派拥护者则唆使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

现在我们看看美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威廉·泽·福斯特对这个时期托派的政策是怎样评价的：“不仅俄国革命的命运，而且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都被当作了赌注。托派一旦成功，就会给全世界的反动势力带来决定性的胜利。”^①

^① 威廉·泽·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9年莫斯科版第371页。

由此可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变成“第三势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工具”^①的结论，是完全有根据的。

学习反对托派斗争的历史经验^②，在托洛茨基主义又有所抬头的今天，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现代的托派组织并不隐讳自己是“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继承者。现代托派毫无保留地赞成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完全拥护托洛茨基的政治行动，拥护他反对列宁、反对苏联共产党、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因而他应当对过去托派所作的危害革命和社会进步事业的一切罪恶分担责任。

在这样的条件下，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观点，对他的“不断

① 参看《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速记报告》第1卷，1961年莫斯科版第429页。

② 那一段时间各国共产党反对托派的斗争在苏联历史学家的一系列论著中都有记述。这里应指出以下几本书：《苏联共产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1975年莫斯科版；弗·米·伊万诺夫、A·H·施麦列夫：《列宁主义与在思想政治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1970年列宁格勒版；H·A·斯拉米欣：《列宁对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揭露（1917—1924年）》，1977年莫斯科版；《列宁反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冒险主义的斗争》，1966年莫斯科版；亚·格·季托夫、柯·米·斯米尔诺夫、K·Д·沙拉金：《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同反列宁主义的组织和派别的斗争（1917—1934年）》，1974年莫斯科版；费·达·雷任科、A·П·乌格柳莫夫：《列宁的党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1907—1927年）》，1969年莫斯科版；亚·格·季托夫：《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托派的斗争》，1975年莫斯科版；雅·格·捷姆金：《列宁在革命前时期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1977年莫斯科版；等等。莱奥·斐盖尔：《托洛茨基主义即反对列宁主义》（Léo Figuère, «Le trotskisme, cet antileninisme»），1969年巴黎版；贝蒂·里德：《英国的极左派》（Betty Reid, «Ultra-Leftism in Britain»），1970年伦敦版；《哲学上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根源、论据和作用》（«Philosophischer Revisionismus. Quellen, Argumente, Funktionen im ideologischen Klassenkampf»），1977年柏林版。

革命论”的批判，依然是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有效武器。此外，共产党人也重视自己的前辈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思想交锋时锻炼出来的思想武器。苏联共产党、其他兄弟党和共产国际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提出的主要政治观点和理论观点，至今仍然完全适用。

由于近年来托派活动的加强（有的地方他们竟大言不惭地自称政党，尽管人数少得可怜），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往往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二十年代已经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粉碎了托派是否恰当？他们接着说，托派不是现在还在活动吗。

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总是忘记提及这样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二十年代胜利地完成了它面临的任务，把托派赶出了自己的队伍。各国共产党都对他们紧闭了大门。

直到六十年代，托派始终在苟延残喘地勉强维持，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干什么。最近二十年，他们在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托洛茨基主义，也不知道它过去给革命运动带来怎样危害的人们中间加强了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挑衅活动，因而才受到人们的注意。当前的反托派斗争，就是要促使那些错误地追随托派的人，看清托派反革命的真面目。各国共产党人现在正在做这项工作。

1969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文件、苏共第二十四次和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对一般的机会主义，以及其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作出了原则性的评价。这些会议为从思想上揭露形形色色的机

会主义指出了基本途径。苏共的几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揭露了毛派同托派组织无原则的合作。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曾谈到过，毛派有许多观点都是从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武库里搬来的，他说：“反对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的逻辑，使中共领导人愈来愈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同托洛茨基主义结成一伙”。^①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中国领导着手在一系列国家中建立以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幌子的分裂主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往往同这些集团结成同盟。^②

七十年代，苏联和国外出版了一系列科学著作，揭露现代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与实践的反革命实质。这些著作都着重地谈到了列宁和苏共反对托派的斗争经验的历史意义，指出现在的托派在客观上已成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帮凶。

为了实现在柏林召开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孤立和战胜反共主义”的任务，必须加强从思想方面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作，指出它是形形色色最凶恶的反共主义和反苏主义之一。在当前的条件下，列宁关于必须了解“敌人的力量，他们的组织状况以及他们营垒中的政治派别”^③的指示，关于必须集中力量批判“这个时期”“对民主对

① 《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文件汇编》，1964年莫斯科版第243页。

② 《遵循列宁主义的方针。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3卷，1972年莫斯科版第214页。

③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0页。

社会主义最有害的政治思想派别”^①的指示，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托洛茨基主义便属于这种思潮。

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03年到1917年，当时托洛茨基主义是作为孟什维主义和国际考茨基主义（中派）的一个变种与列宁主义对抗的。

第二阶段是1917—1927年，托洛茨基主义则表现为我们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派别。对它的揭露，在当时具有党内斗争的性质。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捍卫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击退了以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的阴谋活动。

第三阶段是从1927年末到现在，这时所反对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从一个党内派别变成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革命的流派。它的追随者结成与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的组织，反对当代革命的先锋力量。

现在向读者推荐的这本书，是专门论述各国共产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第三阶段的。与前两个阶段比较起来，历史学界对这一阶段所作的研究是最少的。

托派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破坏活动有所加强，这一现象要求我们对下述一系列问题作出回答：这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又活跃起来的原因何在？六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62页。

六至七十年代托派的思想政治纲领是什么，它与托洛茨基的“正统学说”的关系如何？托派在新的条件下企图依靠的是什么人，他们采取哪些手段和方法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各国共产党怎样利用列宁和最初三十年期间共产党人的反托派斗争经验，现在根据已经变化的政治形势又创造出了哪些斗争方式和方法？在苏联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这些问题并没有全都得到充分的阐述。写作本书的意图，就是想要对解决这一课题多少有所补益。

正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鲍·尼·波诺马廖夫所指出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是一部思想上和政治上堕落、叛变的历史，在实际上同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反共主义打成一片，是它合乎逻辑的结局”^①。因此，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各国共产党人的一项共同的思想政治任务。

^① 《鲍·尼·波诺马廖夫言论选》，1977年莫斯科版第430页。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怎样“发展”了 他的“不断革命论”	1
从恶毒的反共立场出发	1
反苏主义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特征	8
破坏争取民主的斗争，分裂反法西斯力量	13
在种种欺骗口号的掩盖下反对争取和平的斗争	22
第二章 “第四国际”是三十年代托洛茨基主义 的产物	27
打着不存在的“党内派别”的旗帜	28
“第四国际”的建立及其纲领	34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托洛茨基主义	44
托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看法	44
从理论上的失败主义到行动上的失败主义	52
托派执行的是使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遭受孤立 和失败的路线	60
第四章 四十年代后半期至五十年代的托洛茨 基主义：“实验室时期”	69

被生活嘲讽的种种预测·····	69
组织上的“异化”·····	73
无处可寻的“统一思想”·····	80
第五章 托洛茨基主义为什么在六十至七十年	
代又活跃起来? ·····	86
出现这种现象的社会政治原因·····	86
促使托洛茨基主义活跃起来的思想原因和其他原因·····	94
第六章 七十年代下半期的托洛茨基主义；各	
个“国际”的竞争 ·····	107
仍都打着“第四国际”的旗号·····	109
托派组织的“地理分布”·····	119
第七章 现代托洛茨基主义是“左”倾极端主义	
思想的一个变种 ·····	128
“左”派的极右翼·····	128
“左”倾空话掩盖下的反动性·····	142
第八章 勾结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反对现实的社	
会主义 ·····	151
不相信工人阶级的革命创造力·····	153
对社会主义革命采取有计划的敌对行动·····	157
从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立场批判社会主义·····	162
第九章 托派敌视反垄断和反帝运动 ·····	172
立场有假左派和右派之分，标榜的是同一个“理论”·····	175
破坏工人阶级的战斗力，臆造“新的革命先锋队”·····	185

“政治道路堵塞”论·····	191
两面派策略·····	207
第十章 托洛茨基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 ·····	214
妄图孤立民族解放运动·····	219
冒险主义的处方·····	230
第十一章 托派是和平共处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政策的反对者·····	239
把革命斗争同和平共处政策对立起来·····	244
“帝国主义不会让步”的提法的投降主义性质·····	253
鼓吹“革命的核战争”·····	256
结束语 ·····	263

第一章

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怎样 “发展”了他的“不断革命论”

从恶毒的反共立场出发

三十年代，国际工人阶级、各国共产党着力于解决对人类命运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各种问题。那是一个为争取民主与和平，为反对法西斯和战争进行伟大斗争的时期。共产党人经过长期锤炼，创造了一整套以革命方式进行革新的勇敢行动的战略和策略，从而促进了各国国内的以及国际范围的反法西斯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

各国共产党最先看出法西斯的黑“卐”字党徽是对人类的致命威胁。它们对法西斯主义作了精确的阶级分析，指出它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突击队。

各国共产党制定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策，成为团结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进行不懈斗争的光辉范例。人民阵线的使命，是保证工人阶级同并不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但反对法西斯主义，主张民主自由和保障各种社会经济要求的非无产阶级各阶层人民结成联盟。人民阵线政策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发展和巩固民主自由，限制垄断组

织的统治。共产党人提出了为建立能团结反法西斯民主力量的人民阵线政府而奋斗的口号。

共产党人还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建立工人统一战线，以便克服无产阶级深刻的分裂，使它团结起来同法西斯主义进行决战。他们认为，捍卫工人阶级的直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反对法西斯主义，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内容。共产党主张在各个企业中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同社会民主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在形势许可的一切地方，扩大和加深工人统一战线纲领的阶级内容和社会内容，引导群众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各国共产党竭尽全力制止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侵略阴谋，尤其是德国法西斯的侵略阴谋。争取和平成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

三十年代共产党人的政治斗争基本方针，已载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反映在各国共产党的文献中。

后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是有远见卓识的，他们集中力量进行了反对法西斯和保卫民主与和平的斗争。三十年代共产党人的战略与策略的经验，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可资借鉴的，虽然现在条件不同了，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已经改变，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共产党对各种政治过程的影响作用也比过去更为广泛深刻。当时产生的一些思想在现在的条件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充实了新的内容^①。

^① 参看《共产国际。简明历史纲要》，1969年莫斯科版；鲍·莫·莱布森、基·基·希里尼亚：《共产国际政策的转折（纪念第七次代表大会三十周年）》，1975年莫斯科版。

托洛茨基则妄图干扰这个在当时条件下唯一正确的纲领的实施。他采取了对各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行为的正确性一概提出异议的态度，这样就日益加强了他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联系^①。

托洛茨基自称三十年代是其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年代”，并再三强调说正是那一段时间他“完成了最重大的工作”^②。他在1935年3月写道：“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然而，正如英国的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帕·杜德指出的那样，“苏联的托派及其追随者在这段时间的政策和有组织的活动，都是反革命的阴谋”^③。

托洛茨基在1929年被逐出苏联之后，继续加紧炮制早些时候已被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体系。他一反过去的主张，不仅不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一词，而且千方百计地鼓励使用它。他甚至还自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39年4月他在和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谈话时宣称：“我们把自己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④。

① 其实托洛茨基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下述事实就是证明。1938年12月20日他发表了一份类似舞台对话的东西（托洛茨基就喜欢在形式和文体上搞些新花样），在那里他自问并力图自答。其内容如下：“您不能否认法西斯分子正在利用您的批评。当您揭露苏联的时候，一切反动势力都在注视着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您在客观上是站在反动势力一边。”托洛茨基在回答自己给自己提出的关于反动势力利用他的观点的问题时承认：“他们当然要设法利用这一点的。”

② 《工人新闻报》，1972年9月2日。

③ 帕姆·杜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要（1848—1963年）》，1966年莫斯科版第253页。

④ 让-雅克·玛丽：《托洛茨基主义》（Jean-Jacques Marie. «Le Trotskysme»），1970年巴黎版第70页。

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伊·多伊彻在论述这个时期时使用了“新托洛茨基主义”一词，他认为这个“新托洛茨基主义”和二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①。这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三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前几十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大量共同之处。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之后几个月就发表了《不断革命》一书，他认为该书是他的“思想信条”。书中从第一次公开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开始叙述他以前的观点的。他在前言中说道：“在本书中，我首先恢复了1905年针对俄国革命的内部问题所阐明的不断革命论”。他再次企图证明，在革命的基本问题方面正确的不是列宁，不是党，而是他托洛茨基，是他的“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主义一切最消极的东西始终都是来源于这个“理论”，它是过去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所产生的最反动的思想政治纲领之一。“不断革命论”成为从假“左”派的立场攻击每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攻击国际工人阶级取得的各种社会成果，攻击革命的先锋力量，攻击建设中的或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这个“理论”从一开始就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极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思想依据。托派世界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他们竭力要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要通过散布民族虚无主义思想，通过曲解阶级斗争的国际性与民

^① 伊·多伊彻：《被放逐的先知。1929—1940年的托洛茨基》（I. Deutscher,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1970年伦敦—牛津—纽约版第298页。

族性的辩证关系来动摇革命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

真正的革命者决不人为地把国际性与民族性相对立。他们一贯的出发点是：凡是忽视本国人民的利益，忽视本国人民进行斗争的特殊条件的人，都不可能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这一点正象不得把本国的任务与国际的义务对立起来一样，都是革命者必须遵守的定理。

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确地阐述了一般与特殊、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列宁写道：“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传、同情和物质来支持）**所有的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①。

托洛茨基“理论”中的世界主义首先表现在，他描绘了这样一幅世界革命事态的发展图景：国际工人阶级中任何单独一国的队伍都不能指望自己的斗争能取得胜利的结果。“如果没有把握得到邻国的支持，就不要开始行动”——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不高明的哲学。首先发难者总是要冒最大的风险，因为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等待他的是死亡（托洛茨基在上述的《不断革命》一书中写道：“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可见，世界最好是坐待遥远未来的“伟大转变”的到来。

忠于“世界革命”的种种表白，都是用来掩饰托洛茨基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的一无成就。许多其他的政治流派都能以国家建设的实践来证明其思想和政治主张，托派自问世以来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3页。

手
去
三
二
八

11

则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提出过一项积极的行动纲领。

西德历史学家京·巴尔奇注意到，托派荒诞至极的世界主义排除了提出本国纲领的可能性，因而也否定了他们自己的“党”在各国的地位。他不无道理地写道：“如果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理论办事，托洛茨基主义在单独的一个国家之内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无疑是自我否定……托派掉进了他们自己的理论罗网”^①。

托派企图把“国家这一概念已经陈旧过时”的说法来论证他们的“纲领性”论点具有世界主义性质。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一书中写道：“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不仅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而且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托派用对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敌意来证明他们“高于民族的纲领”，证明“必须从全世界或全欧洲的范畴来思考问题”。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同任何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都没有联系，同一切革命的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公开冲突，而且越来越成为反动的空想，因此便与垄断资本的世界主义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众所周知，垄断资本的世界主义思想一贯宣扬对各个国家的命运和社会问题抱无所谓的态度，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一样，托洛茨基主义也从思想上解除各个国家工人阶级队伍的武装，使他们看不清自己的目标和任务，陷入投降主义和只管作些空洞无谓的

^① 京特·巴尔奇：《托洛茨基主义是原来的苏联共产主义吗？第四国际和它的竞争联盟》(Günter Bartsch. «Trotzkismus als eigentlicher Sowjetkommunismus? Die IV Internationale und ihre Konkurrenzverbände»), 1977年柏林版第57页。

计划的死胡同。

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加紧了寻找新的反共斗争形式的活动。他在被逐出苏联一年之后在柏林发表了《现在谁领导着共产国际》的小册子，书中对各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都进行了诋毁。他从同样的立场出发还写过几十本其他“著作”，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都乐于出版这些书并在各类工厂的工人中间进行推销。^①

在这一时期托派还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出粗暴的主观主义和故意不愿考虑客观因素这样一些特征。只有符合它对现象和事件的反动空想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由于简单的公式化和对整个世界的宗派主义仇恨心理，导致凡是超出他们的上述想法的事物都被说成是变态的和反常的^②。托派所固有的折衷主义在当时则表现为，他们越来越多地从一些最见不得人的资料来源中搬用各种观点^③。

思想上的杂食性，政治上的无原则、反历史主义，事情“合

① 《共产国际》，1937年第7期第122页。

② 西德《新社会》杂志在谈论托派这方面问题时，尖刻地讥讽道：“世界不理睬他们，所以他们把世界说成一所疯人院”。（见该杂志1973年第5期第337页。）

③ 1977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京特·巴尔奇的一本书。他在书中把托派描写成一种“革命流派”，同时也列举了一些事实，说明托洛茨基为了极力充实自己的思想资本，达到了何等不择手段的地步。例如，托洛茨基曾要求自己的追随者向法西斯主义“学习”，号召仔细钻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和墨索里尼的言论，以及利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法西斯分子使用过的破坏和驱散工人集会的方法“来锻炼干部”。在1937—1938年期间，托洛茨基还提倡向耶稣会教徒“学习”，称赞他们“敢于并且具有战斗的组织性”。（京特·巴尔奇：《托洛茨基主义是原来的苏联共产主义吗？第四国际和它的竞争联盟》，第57页。）

适”就大加提倡、“不合适”便不加理睬——这一切都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制造如列宁所说的“对理论的一种讽刺”^①时惯用的手法。托派所臆造的一套僵死抽象的公式，在实质上是双料反动的，在倾向上是世界主义的，在形式上是假革命的。

上述的一切，都反映在托派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言论中，反映在他们对争取和平民主，对反法西斯斗争的态度上。

反苏主义是托洛茨基 “不断革命论”的特征

在三十年代，粗暴的肆无忌惮的反苏主义成为“不断革命论”的主要内容。诽谤苏联，竭力败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声誉，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悲观预测，都是托派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所决定的。

托派反苏主义的基础，依然是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论点。在《不断革命》（1930年版）一书中托洛茨基再次提出了这一思想：“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他宣称，革命“在新社会在整个星球上获得彻底胜利之前是不会完成的”。两年之后，托洛茨基又写道：“与在苏联境内建设一个闭锁的和独立自主的社会比较起来，德国和欧洲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一项更为现实更为迫切的任务”。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0页。

苏联全面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和人民都改变了面貌，而托洛茨基却顽固地断言：苏联“已在更大的程度上接近资本主义制度”，而没有接近社会主义，它“离开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他要人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决定着世界的发展，因而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进行根本的社会经济改革都是不可能的^①。和过去一样，托派对执政的工人阶级建设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和能力持怀疑态度。

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反动派把破坏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威信放在意识形态活动的中心地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宣传界妄图使群众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已经开始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便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进行伪造，贬低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苏联在各条战线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托派正是这样做的。在社会经济方面他们主张实行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卷土重来的经济政策。《反对派通报》要求解散国营农场，撤销大部分集体农庄，放弃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托洛茨基声称，“消灭富农就是消灭农民”。他的支持者拉柯夫斯基承认，“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托派从未考虑过“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或剥夺富农”。^②

^① 引人注目的是，在七十年代托派还在称颂托洛茨基的这个投降主义观点，对于他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创造了任何国家都无法摆脱的世界经济”的思想大加赞扬（自称“社会主义工人联盟”的西德托派就是这样吹捧他的。——见《火花》（《Der Funke》），1974年1月15日）。

^② 参看《苏联共产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第541—542页；弗·米·伊万诺夫，A·H·施麦列夫：《列宁主义与在思想政治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第471—472页。

托派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样持敌对态度。他们提出了一个以使国家经济落后为目标的投降主义的“递减曲线论”来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相对抗。按照这个理论，经济只是在恢复时期才可能高速度地发展，然后就一年比一年下降。托洛茨基呼吁停止“工业中的奖励竞赛”。

在这个基础上，托派同形形色色的“左”派和右派找到了共同语言。在1930年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格·康·奥尔忠尼启泽指出：“我们同党内‘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从根本上可以说是争取实现真正切实可行的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斗争”^①。

在社会政治方面，托派要求重新评价党和苏联人民在建立符合国内已经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新的社会阶级结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们的主张实质上是要使社会阶级结构“资本化”。如果按照托派关于“公允地对待”富农阶级和实行企业的资本主义租让的建议去做，其结果必然如此。

“放弃一党制”和“恢复多党制”的要求，其目的也是要动摇苏联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的上述建议的论据是：似乎我国的社会结构应保持不变，始终应包括各种非无产阶级成份，尽管他们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1936年4月，托洛茨基在《苏联新宪法》一文中公开提出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苏联的社会结构要比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的结构庞杂得多。这样便为成立若干个政

^①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6月26日—7月13日）。速记报告》第1卷，1935年莫斯科版第538页。

党提供了充分有利的条件”^①。

在思想政治方面，托派则竭力破坏苏联人民的巩固的团结，干扰新世界观的确立，阻挠苏联人新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原则的形成。托派企图动摇的是，激励苏联人去建立劳动功勋和战斗功勋的根本思想，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想的信仰，对领导和团结整个社会力量的党的信赖，对实现他们正在执行的宏伟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的信心。

托派的阴谋家妄图使苏联社会产生不和，挑起工人阶级反对农民，挑起工农反对知识分子。他们梦想离间党与人民的关系、一般党员与党的领导的关系、老一代人与青年人的关系。

托派们厚颜无耻地把在“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口号下掀起的全民竞赛说成是“白白浪费力气”。托洛茨基甚至把斯达汉诺夫运动这样的人民热潮称作“克里姆林宫的骗局”，要求加以“谴责”。在他起草的“第四国际”的“纲领性”文件中竟然出现了“打倒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口号^②。

这样托洛茨基主义以自己的表演再次证明，它的方针是何等有害，坚决与它划清界限的党何等正确。1934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说：“如果托洛茨基的路线取得胜利，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阵线的胜利，因为托洛茨基的路线将把国家引向毁灭”^③。

① 《托洛茨基政论文选。让·巴伊歇利评选》（《Politique de Trotsky. Textes choisis et présentés par Jean Baechler》），1968年巴黎版第146页。

② 《第四国际文件集（1933—1940年）》（《Document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1933—40》），1973年纽约版第213页。

③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速记报告》，1934年莫斯科版第73页。

早在二十年代，托派已经成为历次反苏阴谋活动的组织者，他们不断地加紧寻求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新手段。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国内尚存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身上，企图利用这些人在政治上的不坚定以及对党和工人阶级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满情绪进行投机。

起初，托洛茨基寄希望于“在苏联实行革新”。他所谓的“革新”就是要冲毁苏维埃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他认为这种改革“不用进行新的革命，而是用改良的方法走改良的道路”。通过苏联社会中“分歧的加剧”和“裂痕的加深”就可以实现。

但是，托洛茨基看到他的这种打算根本站不住脚之后，便又宣布说，关于“在苏联实行革新”的预想是错误的。他开始发出要求实行“政治革命”的白匪式号召。这样，托派的“不断革命论”又增添了一个不体面的内容，即号召以暴力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过程被描绘成以下两个部分的结合：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另一个是……苏联的“政治革命”。

托洛茨基提出了“变质的工人国家”的论点作为其反苏活动的“思想”基础。而所谓变质的原因，他认为在于革命没有立即从俄国转入其他国家，以及苏联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处。依托洛茨基看来，“过错”在于历史，因为事态不是按照“不断革命论”发展的，没有纳入这个理论无法实现的公式。

进步人类认为苏联是争取社会主义、和平与民主的斗争的支柱，是国际革命运动的最伟大成就。托洛茨基则认为苏维埃国家是世界革命道路上的障碍，指责它不愿开展国际范

国的阶级斗争。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这就是号召推翻苏维埃制度的托洛茨基的心愿。难道这还不是双料的反革命？托洛茨基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效劳算是作到了尽其所能无以复加的地步。

托洛茨基继续宣传他从马尔托夫和考茨基那里抄袭的“苏维埃政权热月化”的论点。他指责党和党的领导“篡夺政权”，实行波拿巴主义和官僚化，等等。

而实际上，如果加以历史的类比，准备进行类似热月反革命政变活动的恰恰是托派。因为1794年反对法国革命的政变就是在一些伪装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那些口号与托派捏造的“蜕化变质”的谎言十分相似。

破坏争取民主的斗争， 分裂反法西斯力量

大家知道，托派“理论”的危害之一，在于它无视一般民主斗争。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一书中承认，他对“问题的提法确实与列宁不同”。托洛茨基断言，似乎在帝国主义时代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映大多数民族利益的争取一般民主的革命行动，列宁对此进行了批判^①。

十月革命之后，托洛茨基的观点依然是轻视一般民主斗争，轻视工人阶级争取非无产阶级阶层的任务。他歪曲三次革命的经验，企图把民主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物。托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8页。

洛茨基在1937年宣称：“十月革命明显地表明，社会革命不可能在民主的范围内实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处于街垒战的对立两方”。

托洛茨基的这些观点在三十年代后半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时争取民主的斗争和反对人类最凶恶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的斗争极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法西斯瘟疫已有笼罩整个欧洲，延及其他大陆的危险。

法西斯主义的阶级目的，就是要一举取消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坚韧不拔的斗争所赢得的全部权利和自由。法西斯分子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对于业已陷入深刻危机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危险的，因此猛烈地攻击各种民主制度和议会制，镇压民主主义的一切表现，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

现实生活迫切要求把一切革命的和民主的力量联合起来。反法西斯斗争在当时已经成为首要的任务，共产党人适应这种新的历史情况，发展了列宁关于建立劳动人民的广泛联盟，以争取实现各项民主目标的思想^①。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乃是最反动、最具有沙文主义、最抱帝国主义野心的财政资本家的公开的、恐怖的专政^②。德国法西斯主义被宣布为挑动又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祸首，**国际反革命势力的急先锋^③**。

① 参看《共产国际。简明历史纲要》，第368—409页。

② 参看《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言论选》，1972年莫斯科版第113页。

③ 参看《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集》，1935年莫斯科版第11页。

然而此时托派却试图散布反法西斯斗争注定失败、前途无望的悲观情绪。它鼓吹说，资产阶级民主必然转变为法西斯主义。更有甚者，托洛茨基在1938年竟然宣称：“在发达国家捍卫民主的纲领是反动的纲领”^①。他认为只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才可以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

自称为“国际共产党人外国委员会”的德国托派则到处散布法西斯主义具有“巩固性”和“强大生命力”的言论。他们要人们相信，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要经历这个阶段。他们宣称：“与列宁的观点相反，帝国主义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继帝国主义之后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它到处都会占据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托派千方百计地阻挠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和人民阵线的建立，败坏负有结束无产阶级队伍分裂状态使命的工人统一战线的美誉。

他们指责各国共产党搞“联合主义”、“背弃阶级立场”等等。1938年1月，托洛茨基甚至指责共产党人堕入孟什维主义：“这里姑且不论‘人民阵线’政策的好坏，它始终是孟什维主义的一种传统的政策”。他竟自耸人听闻地宣称：“一个是人民阵线，另一个是法西斯主义——这两者是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的政治手段”^②。

对人民阵线政策的这种仇视态度从何而来？看来，问题不仅仅在于托派一贯轻视一般民主运动。归根到底，托洛茨基在这里暴露出了他和妄图破坏人民阵线政策的大垄断资产

① 《托洛茨基政论文选》，第216页。

② 《第四国际文件集(1933—1940年)》，第182页。

阶级患有同样的恐惧症，即他们都害怕共产党人和追随共产党的各个工人阶级队伍，一旦与社会上非无产阶级各阶层建立起巩固的联盟，便会加强自己的地位。革命民主运动如果陷于分裂，那么形形色色的反动的的小资产阶级流派便会和垄断资产阶级一样，更加便于施展它们的阴谋诡计。反之，如果遭到明确提出斗争目标和斗争方法的人们的一致抵制，它们玩弄骗人伎俩的机会就会减少。

和那些用“赤祸”来恐吓非无产阶级各阶层以反对人民阵线的资产阶级不同，托洛茨基是从假左派的立场发动进攻的。他指责共产党人“放弃革命行动纲领”，号召“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普遍成立工人政府，同时又以“把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武装起来”的口号来对抗人民阵线的政策^①。

这种极左的空话是在为法西斯主义帮忙。如果工人阶级真的以托派提出的哀的美敦书——“要么是共产主义，要么是法西斯主义”，把非无产阶级各阶层从自己身边吓跑的话，那么实际上得到好处的不正是法西斯主义吗？要知道，法西斯主义恰恰是依靠大肆鼓吹必须反对“共产主义危险”的宣传妄图扼杀革命运动的。

法国和西班牙的托派分子的行动证明，托派的口号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法国共产党在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工人统一战线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并在1934—1937年期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莫里斯·多列士就此问题写道：“我们不是凭空想出这一

^① 引自《今日马克思主义》，1975年第10期第314页。

任务的。它是由世界工人运动的经验，首先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经验本身提出来的。法国共产党的功劳在于她了解**今天**应当做些什么，它不听从那些不断扰乱党和妨碍实现反法西斯斗争统一战线的宗派主义分子的摆布，而是勇敢地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根据同社会党联合行动的协定，组织起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作为正在形成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基础”^①。

法国共产党人要求解散法西斯组织并解除它们的武装，把法西斯军官赶出军队，实行国家机关民主化，扩大劳动人民团体、特别是工会的权利，保证国家实行爱好和平的政策^②。他们努力使人民阵线提出实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的要求，把矛头指向金融寡头政治，指向“二百家族”的统治。

共产党人成功地吸收了社会党和激进党的许多成员参加人民阵线。人民阵线的基础——工人统一战线也得到了巩固。在法国总工会和统一总工会这两个工会组织实行联合的基础上，于1936年春全国成立了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统一的法国总工会。

参加人民阵线的各个政党在1936年的议会选举初期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共产党人争得了一百五十万名选民的拥护（在1932年是七十九万名）。在第一轮选举中就有九名共产党代表当选^③。

① 《莫里斯·多列士言论选(1930—1964年)》，1966年莫斯科版第53页。

② 参看莫·多列士《为统一战线奋斗的法国共产党》，载《共产国际》，1935年第4期第24、25、26页。

③ 参看莫里斯·多列士《人民的儿子》，1960年莫斯科版第102页。

1936年夏全国掀起了巨大的罢工浪潮,促使1936年大选后成立并依靠人民阵线支持的利昂·勃鲁姆政府对劳动人民作出的一系列重大让步。工人争取使工资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实行了确定劳动报酬条件的集体合同;通过立法程序限制了全国的每周工作时间;农民和城市各中间阶层的许多要求也得到了满足^①。

法国托派是怎样对抗人民阵线上述政策呢?他们阴谋抵制劳动人民权利的斗争,声称“现在已经不是为煎牛排而斗争的时候”,“在资本主义结构没有遭到革命力量直接打击之前”,不可能有“任何改善”^②。托派号召“立即采取革命行动”以代替建立人民阵线。他们得到其他“左”倾分子拥护的口号是:“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要法西斯主义,也不要议会主义”,“立即实行社会主义”。^③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莱奥·斐盖尔评价托派的口号时,得出这样一个十分有根据的结论:“如果这些表面上‘极端革命的’口号不是遭到共产党和莫里斯·多列士的坚决批驳的话,它们在1936年夏就会把人民阵线,即无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联盟搞垮,中间阶层便会投入最黑暗的反动势力的怀抱。这样便会为法西斯主义打开迅速取得胜利的道路”^④。

现在的伦敦“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首领之一托尼·坎普妄图推翻这一论点,他宣称:“1936年实际上并不存在法西斯

① 参看《共产国际。简明历史纲要》,第435页。

② 参看《莫里斯·多列士言论选(1930—1964年)》,第41页。

③ 参看《共产主义手册》,1968年第10期第78页。

④ 莱奥·斐盖尔:《托洛茨基主义即反对列宁主义》,第193页。

危险，在罢工结束之后也并不存在。各种法西斯团体当时已经解散”^①。他只字不提正是由于实行了人民阵线政策，工人阶级才保证了自己队伍的团结，并把广大中间阶层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打乱了法西斯势力的计划和阴谋。

在西班牙，托派所干的是同样的背叛的勾当。他们还利用了无政府主义在国内的影响，以及在工人阶级中间相当流行的“左”倾宗派主义观点。

由于共产党的努力，西班牙也建立了人民阵线，并且在1936年2月的国会（即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就为在全国进行重大的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大型企业国有化、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打下了基础。1936年7月，法西斯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发动叛乱，人民阵线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共产党号召普遍掀起反法西斯行动：“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反法西斯分子都应当把自己看作是已被动员入伍的战士”。

托派分子则集中力量造谣中伤和破坏人民阵线，使工人阶级在敌人面前解除武装^②。托洛茨基诬蔑人民阵线的政策“是要无产阶级接受资产阶级领导”，并且扬言：“‘民主的胜利’不过是一条依然要通向法西斯主义的弯路”。他号召“动员群众起来反对人民阵线及其政府”。长期以来总是以“红色瘟疫”恐吓老百姓的西班牙法西斯报纸，甘愿刊登托派反对人民阵线、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是不足为奇的。托派竭力主张取消正规的共和国人民军，他们的要求是“建立红军，而不要人民

① 《工人新闻报》，1973年3月13日。

② 参看《西班牙共产党史简明教程》，1961年莫斯科版第50、161—162页。

军”^①。

托派打算怎样在西班牙实现其“以革命方式粉碎法西斯主义”的纲领呢？请看托洛茨基对形势所作的完全无知，而且在政治上极端幼稚的答案吧：“西班牙革命可以使敌人的军队摆脱反动军官的控制。只要庄重而勇敢地提出西班牙革命的纲领就足以做到这一点……法西斯军队连二十四小时也经受不住这个纲领的影响；士兵们会把他们军官的手脚捆住，送到最近的工人民兵指挥部去”。

西班牙的托派搞了一些只对法西斯分子有利的左倾实际行动，来支持这个异想天开的“战略”。在托派的积极参加下，在巴塞罗那（1936年7月）举行的有组织的反共和制暴动就是其中的一例。那里有一个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组织，早就在开展反对人民阵线和所谓“资产阶级化”的共和政府的活动。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托派组织，但在它的队伍中有不少托洛茨基的拥护者，而且托洛茨基过去的私人秘书安德列·宁参加了领导工作。托洛茨基在许多问题上都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意见，正如伊·多伊彻所指出的，这个组织可以算是一个“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党”^②。

巴塞罗那的叛乱分子（和托派一起活动的有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从各国来到西班牙的其他左倾分子）指责共产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是为民主进行斗争，他们在加泰罗尼亚动手

① 《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文献集》（《Trotsky et le trotskysme. Textes et documents》），1937年巴黎版第91页。

② 伊·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I. Deutscher. «Staline. Biographie politique》），1953年巴黎版第510页。

实行诸如“废除货币”，“取消宗教”之类的“社会主义”措施。他们对共产党人和其他拥护共和政府的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多·伊巴露丽写道：“第一批死于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枪弹下的是领导巴塞罗那港党组织的同志”^①。

这个发生在共和国军后方的叛乱，“内战中的内战”，是为法西斯分子效劳的^②。为了镇压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的叛乱，就必须从反法西斯军事战线抽调出一部分共和国军队，敌人则利用了这一情况。此外，佛朗哥反对者队伍中的思想分歧也加剧了。

一向戴着“国际主义”假面具和冒充反对“狭隘民族局限性”战士的托派分子，当现实生活真的把国际工人阶级力量联合起来的任务提到首位时，却完全唱起了反调。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支持共和政府的广泛国际运动。当各国共产党人派遣志愿人员，募集资金和药品的时候，托派却暗中破坏向西班牙人民提供物质和医疗援助的各种委员会的活动。

托洛茨基甚至对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匈牙利、

①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唯一的途径》，1962年莫斯科版第418页。

② 有材料说法西斯分子也参与了巴塞罗那“起义”的组织工作。1937年5月7日纳粹德国驻西班牙大使福佩尔同佛朗哥将军的兄弟的一份谈话记录保存下来了。下面是大使向柏林报告的谈话内容：“关于巴塞罗那的混乱情况，佛朗哥通知我，说巷战是他的密探们挑起的。尼科拉斯·佛朗哥在说明这一情况时谈道，在巴塞罗那他们安插了十三名密探，其中有一个人很早就报告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关系急剧紧张化的情况，并且说这个人采取了某些措施促使冲突进一步激化”。尼·佛朗哥密告德国大使，他的密探们“接到了上街开火的有关指示，这个行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德国外交事务文献》第III卷D辑（1937—1945年）（《Akten aus dem Archiv des Deutschen auswärtigen Amtes》），《德国和1936—39年的西班牙内战》（《Deutschland und der Spanische Bürgerkrieg 1936—39》），1951年巴登—巴登版第343页。

保加利亚、比利时、美国、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志愿人员也加以侮辱^①。他诬蔑说国际纵队“是各国共产党和苏联的走狗”。当苏联志愿人员到达西班牙时，托派宣称：“来了苏联的公民，但这不是苏联政府的援助”^②。对于苏联所提供的许许多多其他的支持，他们也进行了欺骗宣传^③。

对于反对世界大战威胁的斗争，托派的态度也表现出他们是法西斯主义的帮凶。

在种种欺骗口号的掩盖下 反对争取和平的斗争

在“不断革命论”中，颂扬战争占有显著的地位。“暴力论”鼓吹破坏、动乱和冲突，它是种种小资产阶级流派——包括露骨反动的和假革命的——所固有的思潮，但是托洛茨基并不是简单地推崇这一理论。他是通过为战争进行辩护，来诋毁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性目标。托洛茨基鼓吹破坏，只有

① 在西班牙参加战斗的有来自五十四个国家的三万五千名志愿人员。参看《共产国际。简明历史纲要》，第461页。

② 《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文献集》，第91页。

③ 斯大林在给西班牙共产党的电报中阐述了苏联的立场：“苏联劳动人民只是在尽自己的义务，给予西班牙革命群众以力所能及的援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把西班牙从法西斯反动派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不是西班牙人的私事，而是全体先进的和进步的人类的共同事业”（转引自《西班牙共产党史简明教程》第133页）。在战争一周年纪念日，西班牙部长会议主席在叙述苏联的援助时写道：“西班牙以及整个世界都对苏联及其伟大的领导者们表示永恒的谢意”。（同上，第134页）。

破坏才能使世界获得新生的思想^①的同时，把这种思想说成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指责各国共产党“放弃革命斗争”，“背离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们认为革命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现在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日常工作之中。

托洛茨基关于战争的议论一再改变腔调，为的是使他对列宁主义，对各国共产党的攻击适应各种不同的政治形势。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大家知道托洛茨基主张“革命的侵略性”。他要求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用“红色刺刀”把革命带给其他国家。他认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战争的一个桥头堡^②。

被逐出苏联之后托洛茨基在战争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他的观点的特点是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那么现在占首要地位的则是公开的反革命性和对苏联露骨的仇视。

这时托洛茨基宣称十月革命“已被叛卖”（苏联人民坚决地摒弃了那些怂恿他们在对外政策上实行冒险的分子，径自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不再鼓吹“革命战争”的思想。他发表了一些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新观点，把帝国主义

^① 托洛茨基常常为破坏进行辩护。例如，他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宣称：“破坏可以消灭和粉碎自己道路上的一切，同时也为新的建设扫清道路……”——《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4月）记录》，1960年莫斯科版第96页。

^② 托洛茨基企图用一些具体的建议来充实他所主张的苏维埃俄国同国际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战争”的路线。1919年，他建议派三万至四万名骑兵到印度去“直接推动被压迫群众的起义”；1923年，他坚持主张派遣红军正规军去德国，并以此“在欧洲点燃无产阶级革命之火”。

战争看作是反苏的同盟军。以前托洛茨基在谈论革命战争时说过，苏维埃国家可能在革命战争中灭亡，但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坏事，因为对革命来说这个共和国是不成熟的^①。而现在他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国家必然把苏联拖进战争，而且战争将以苏联的灭亡而告终。托洛茨基写道：“我们能够指望苏联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不致战败吗？对于这个坦率地提出的问题，我们将同样坦率地回答：如果战争始终只是一场战争，苏联战败将是不可避免的。从技术、经济和军事的意义上说，帝国主义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强大的。如果帝国主义不是由于西方的革命而陷于瘫痪的状态的话，它将会铲除十月革命所产生的这个社会制度”^②。他反复强调苏联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只要发生一次来自外部的社会大震荡，就可以使……苏联社会陷于内战”，苏联将因此“崩溃，让位给资本主义制度，更确切地说，将让位给资本主义的混乱状态”^③。

托洛茨基还预言过各苏维埃共和国将出现争取民族独立的倾向。他把希望寄托在民族主义上，他曾这样写道：“民族问题在完成政治革命方面具有政治现实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个星期托洛茨基说过：“有一点我是坚定不移

① 在1918年3月他曾宣称：“如果资产阶级战胜我们，这对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将是一个打击，但是这不能同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况相提并论。……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欧洲的无产阶级比我们更加成熟。即使我们被击溃了，那也毫无疑问地不会形成象巴黎公社以后那样的历史性的失败”。——《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1918年3月)。速记报告》，1962年莫斯科版第71页。

② 参看帕姆·杜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要(1848—1963年)》，第252页。

③ 《新世界舞台》(«Die neue Weltbühne»), 1933年第49期第1527页。

的；政治制度经受不起一场战争”。

托洛茨基的预言同戈培尔的吹鼓手们的说法极其相似。他们也是把苏联描绘成一个“泥足巨人”，并且预言它几乎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天就会垮台。他们非常希望我国发生内讧和民族对抗。法西斯分子的一些说法很可能就是从托洛茨基的武库中搬弄去的。要知道，正是对托洛茨基的政论很感兴趣的希特勒本人曾经说过，他“向托洛茨基学到了许多东西”^①。

托派断言苏联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要人相信国际工人阶级只会因此得到好处，因为卷入战争的国家将会爆发革命，世界资产阶级将无法对付这些革命。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写道：“只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即使苏联在军事上遭到失败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另一方面，如果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余部分还保存下来，那末，什么样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

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号召在发生战争时帮助苏联，因而受到托派宣传机器的疯狂攻击。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宣称，共产国际的立场是“莫斯科的狭隘私利”决定的。他们指责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说它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开展革命斗争，不如说是保护苏联的对外政策利益。

在这方面，托派并不是在单干。共产国际成立之后，资产阶级报刊立即蛊惑人心地诉诸劳动人民的民族感情，吵吵嚷嚷地宣传说，共产国际在反对威胁苏维埃俄国的战争危险方

^① 引自《新社会》，1962年第3期第126页。

面是“按俄国的利益”行事的。戈培尔的吹鼓手们也口口声声这样讲。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即阻挠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进步力量作好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

托派一再证明，进行反战斗争是徒劳的，因为帝国主义总是要发动战争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号召不要阻止事态的发展，最好让战火烧遍全世界，据说这对革命是有利的。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为了迎接战争的到来，革命斗争应当加以收敛。奥·威·库西宁在1932年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上说：“认为战争终归是要爆发的，而革命只有通过战争的大门才能到来的宿命论观点……意味着既放弃革命的斗争，又放弃反战的斗争”^①。

以上就是托洛茨基在被逐出苏联后的头十年所持的观点。这些观点后来成为在1938年成立的托派“国际”的思想基础。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报告》第3卷，1933年莫斯科版第120页。

第二章

“第四国际”是三十年代 托洛茨基主义的产物

在三十年代，托派分子加紧了寻求反共斗争新的组织形式。他们在被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之后，组成了许多小集团。托洛茨基一再试图将这些小集团拼凑成一个国际组织。

和二十年代一样，托洛茨基所追求的目的，仍旧是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1927年6月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通讯》声称，托洛茨基主义的“价值”就在于“瓦解布尔什维主义，动摇‘坚如磐石’的专政大厦，破坏共产国际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①。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更加卖劲地进行这一活动，因此

^① 引自《共产国际。简明历史纲要》第280页。第二国际的领导对托洛茨基及其思想抱有好感由来已久。在二十年代后半期，他们成立了一个专设机构，以散发其所属支部诬蔑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材料（参看《苏共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的历史经验》第547页）。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出面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把他开除出党并从莫斯科赶到阿拉木图（他在阿拉木图呆了一些时候又被逐出苏联）。克拉拉·蔡特金在《托洛茨基的被逐与社会民主党》（Clara Zetkin, «Trotzkis Verbannung und die Social—Demokratie»）这本专门小册子中指出：“第二国际的领导们从来没有对墨索里尼、赞科夫、毕苏斯基、爱伯特、兴登堡之流煽动和领导的恐怖主义体制表示过任何愤慨”。蔡特金在怒斥托洛茨基的反苏反党活动之后写道，苏联人民“不仅有权，而且也有责任和义务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严肃性来对待托洛茨基及其伙伴”。（见该书1928年柏林版，第12、21页）。

不仅赢得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情，而且博得了准备对共产国际进行“十字军征讨”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好感。

现在托派们常说，战前时期太短暂了，以致他们的“国际”未得以“显露头角”。但是，在他们的“国际”所提出的凝结着反苏反共毒素的“纲领性”文件及实际行动中，凡是被现代的“第四国际”信徒视为“遗产”的东西都已显露出来了。

皮·弗朗克是“第四国际”的“思想家”之一，他把“第四国际”成立前的年代，称为在原则上划清界限和集聚干部的时期。他写道：“那是我们学习的时期，如果可以用托洛茨基主义的语言这样表达的话”。^①

打着不存在的“党内派别”的旗帜

1929年3月31日，托洛茨基抵达土耳其后不久便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出信件，号召同共产党“进一步划清思想界限”，信末署名为“古罗夫”，因此弄得法国人莫名其妙，并且传为笑柄（因为法文动词“gourer”的意思是伪造、欺骗）。托洛茨基对来自苏瓦林的支持寄予莫大希望，苏瓦林派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称为法共中右倾影响的传播者。^②托洛茨基对马斯洛夫和路·费舍派也很感兴趣，这两个人都是被德共开除

^① 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的贡献》（Pierre Frank, «La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mouvement trotskyste»），1969年巴黎版第25页。

^② 参看《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93页。

的，并被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为共产主义的叛徒^①。

早在二十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就和这两个派别建立了联系，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5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1926年）和第八次全会（1927年）都曾指出过这一点^②。托洛茨基给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的机会主义组织也发出了信件。

写信的目的是试探。信中还没有提出把它们联结成一个国际组织的问题。只是建议就下列问题交换意见：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否是“中派”，“它背离马克思主义”达到何种程度，等等。托洛茨基表现了他少有的谨慎并非偶然，因为这些组织的分歧实在太多了。他的计划是要通过交换意见逐步消除分歧，从而为它们的联合打下基础。

这项计划并未能实现。波·苏瓦林是如此仇视苏联、仇视列宁主义、仇视共产党人，连托洛茨基的恶毒诽谤他都嫌“过分斟酌份量”，而且认为批判也“不彻底”。虽然他出版的《共产党人公报》杂志刊登了托洛茨基的一些论文（早在1924年就发表了他的小册子《新方针》），可是后来他说：“我并不赞成托洛茨基主义”。苏瓦林也断言，苏联“已经蜕化变质”，成了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苏维埃、工会、甚至共产党在那里都已不复存在。布尔什维主义被他说成是“国际的鸦片”^③。

① 参看《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6集，1929年莫斯科版第178页。

② 参看《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471、694、741页。

③ 让·拉博特：《一切都是可能的！1929—1944年的法兰西“左派”》（Jean Rabaut, «Tout est possible! Les <gauchistes> français 1929—1944»), 1974年巴黎版第16、17、18、40页。

苏瓦林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用“左”的词藻来掩饰自己的立场。连托洛茨基也无法表示与他意见一致，怕的是会失去自己在其他国家的拥护者。苏瓦林甚至还要求托洛茨基“在征得法国反对派的同意（也就是他的同意）之前，不得采取任何公开行动”。托洛茨基则报之以宣布苏瓦林是“前共产党人和前托洛茨基主义者”。^①

马斯洛夫、费舍以及德国的其他“反对派”集团也在许多方面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而倾向苏瓦林。正如人们从托洛茨基在1929年发表的小册子《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与反对派》中所看到的，这伙自称为“列宁主义联盟”的德国假左派宣称，反革命已在苏联取得胜利，它已成为资产阶级国家。因此，他们“不能百分之百地同意”托洛茨基，因为他“走得还不够远”。

托洛茨基也未能得到与他沆瀣一气的法国叛徒集团的支持，这一伙人以毕威尔为首，自称为“工农党”。毕威尔要求托洛茨基删去“不断革命论”中提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代之以“民主社会主义”^②的概念。托洛茨基常常批评毕威尔，并把他列为“左翼中派分子”。

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决定采取建立一些“纯托派”团体的方针，以期将来把它们联合成为一个国际组织。但是，正如伊·多伊彻指出的那样，“给他的西方追随者附于一个组织形式的最初几次尝试，结果是令人失望的”^③。托洛茨基起初

① 伊·多伊彻：《被放逐的先知》，第46页。这里不妨提一下，苏瓦林以担任反共的资产阶级报纸《费加罗报》记者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② 达尼埃尔·盖朗《人民阵线和不成功的革命》(Daniel Guérin, «Front populaire et révolution manquée»), 1963年巴黎版第243—251页。

③ 伊·多伊彻：《被放逐的先知》，第45页。

是集中力量在法国拼凑起一个直接忠于他的组织。由他出钱，在1929年8月出版了托派《真理》杂志第一期，1930年初在这个杂志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反对派联盟”^①。但是，托洛茨基曾在一封信中被迫承认，“在法国，反对派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托派组织的情况也是如此。“所有这些组织的极大不幸，——托洛茨基的一个朋友罗斯梅尔写道——就在于它们总是置身于一切行动之外；这就注定了它们不可避免地具有宗派主义的性质”^②。

原因不在于托派组织的消极性，也不是什么命中注定。它们陷入极深刻的危机，是因为它们不仅与革命群众隔绝，而且还和群众对立。乌拉圭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罗纳内·阿里斯门迪把这些组织称之为沉船的碎片。的确，托洛茨基之船早在二十年代就整个覆没了。看来，正是这一点使托洛茨基放弃了把它们联成一个组织的想法。1929—1933年，各个托派组织仍都伪称是各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虽然它们早已被有关国家的共产党开除了。

1929年9月托洛茨基在《真理》杂志上写道：“我们建议，作为当前的目标，是在思想、方法和策略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国际性的派别组织”。他试图把托派冒充为“共产国际的反对派”。其用意是想把各国共产党内政治上不坚定的分子拉入各托派组织，那怕对共产国际的状况多少发生一点影响也好。

出于策略考虑，托洛茨基拒绝了他的某些追随者提出的

① 让·拉博特：《一切都是可能的！》，第53页。

② 引自伊·多伊彻：《被放逐的先知》，第45页。

成立“第四国际”的建议。他在1930年出版的《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一书前言中写道：“人们从各方面企图把建立第四国际的意图强加在我们的头上；这是一个坏想法……我们在继续执行和发展第三国际的路线”。

1930年4月6日，一系列托派组织的代表（来自法国、美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以及法国的“犹太反对派组织”在巴黎集会，宣布自己是“国际左派反对派”，同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①。这个“左派反对派”声称要“改造共产国际”并“加入到各国支部中去”^②。“是一个派别，而不是一个政党”——托洛茨基在1932年所写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左派反对派：它的任务和方法》中有一章就用的是这个标题。

这个文件成为1933年2月一小撮托派在巴黎举行的“预备会议”的基础。当时打算在这年7月召开一个成员更为广泛，更具代表性的会议。但是，无论是在指定的日期还是在那以后，托洛茨基都未能开成这个会议。

二月会议制定了“反对派”吸收成员的“十一条”。其中有诸如否定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和“谴责苏联经济政策”之类的条件。“谴责”一词在条件中用得非常多。要求予以“谴责”的有：苏联的状况，人民阵线的政策，乃至所有各国共产党的活动。纲领的“正面”要求是要“承认不断革命论”。这次托派“预备会议”宣称，“我们对共产国际的态度是

① 《第四国际文件集》，第7页。

② 引自《第四国际》(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1964年11月号第54页。

由我们这个派别的名称——左派反对派——决定的”^①。

过了五个月，在1933年7月托洛茨基突然改变立场。在仍以古罗夫署名发出的信件中，他又坚持说：“必须成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国际……谈论‘改良’、要求反对派重新回到正式的党内，都是空想的和反动的，应立即停止”。

这几个月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要采取新的策略呢？托洛茨基解释说：法西斯主义夺取了德国政权，这都是共产党未能加以阻止的过错(?)；因此现在的斗争应是集中反对共产党人。

众所周知，希特勒分子是1933年1月30日在德国执政的。而托派在这年二月召开的“预备会议”并没有认为这件事是实现其原来方针的障碍。托洛茨基显然是需要设法掩饰一下规定在七月召开的会议遭到失败的原因，而主要的问题在于，他所设想的通过托派的“批评”，从内部使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改变性质”的方针遭到了破产。托派的政治阴谋当然未能影响共产国际的政策。

“共产国际反对派”的破产促使托洛茨基去建立自己的“国际”。大多数组织对他的意见持否定态度，说条件尚不具备，托派人数也太少^②。只有四个组织(法国的“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荷兰的两个不大的组

① 《第四国际文件集》，第23、24页。

② 托洛茨基在日记(1935年)中写道，他在各国的追随者有四千人。这个数字很可能也是被他夸大的。这本日记(正确地说是他过去的秘书范海尔诺特所写的前言)还指出，在每一个托派组织中“都有两派、三派或更多的派别由于个人名利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互相争斗”。

织)支持托洛茨基。但是不久其中有三个组织(荷兰的两个小组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与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①。

1936年7月,托洛茨基把从1933年8月起自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联盟”的那一小撮追随自己的人召集到一起开会。但是这样也没能使他们信服有必要建立“第四国际”。最后总算决定成立了“争取第四国际运动执行局和国际书记处”,并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加入“第四国际运动”。这个会议再次“谴责”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并猛烈地攻击人民阵线的政策^②。

许多追随者建议托洛茨基不要再走下去,就以建立“争取第四国际运动”为限。他断然拒绝了这一类建议,并称之为“机会主义的”和“妥协的”。不仅如此,为了加速事态发展,托洛茨基公然弄虚作假,在1934—1937年期间,他竟以这个不存在的“第四国际”的一个“苏联支部”的名义发表意见。

伊·多伊彻把托洛茨基这种作法的意图表达得不错:“他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高呼:‘第四国际万岁!’,至于其余的事,留待以后解决”^③。

“第四国际”的建立及其纲领

1938年9月3日,经过长期恼人的谈判之后,托洛茨基终于把那些总算相信有必要建立“第四国际”的追随者召来开了个“成立会议”。会议在巴黎附近举行,有二十一名托派分

① 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第34—35页。

② 《第四国际文件集》,第82、83、92页。

③ 艾·多伊彻:《被放逐的先知》,第429页。

子参加，为期一天。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任何人都不代表。匆匆忙忙地通过了托洛茨基事先写好的文件和决议。会上首先谈的是托派“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所谓执行委员会和核心组的工作，着重指出，它们“在过去几年里显示出没有能力采取行动”。换句话说，承认了“第四国际运动”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可是仍然作出了成立“第四国际”的决议，它被称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会上有些与会者表示反对成立“第四国际”，他们说：“我们的运动太弱小了，还称不上国际”^①。有人还说，“我们的宣言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得到哪怕一小部分工人阶级的响应”。也有人警告说：“不要空作姿态”，“不要干蠢事”。主持会议的美国托派分子沙赫特曼对所有反对意见置若罔闻，声称“孟什维克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

某些“创办人”的悲观情绪在会议通过的声明中也有所反映：“怀疑派问道：成立一个新国际的时机到了吗？他们说，难道可以人为地成立一个国际？它只有在大事件中才有可能产生”^②。

怀疑派的意见被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秘密名誉书记”的托洛茨基的呵叱声压下去了，他叫嚷道：“我告诉你们，三、五年后第四国际将成为世界上一支巨大的力量”。在另一次讲话中他描绘了一幅更加美妙的图景：“在今后十年内，第四国际的纲领会成为千百万人的纲领，这革命的千百万人将能一举占有大地，占有天空”。^③

① 《第四国际文件集》，第 163 页。

② 同上，第 29 页。

③ 伊·多伊彻：《被放逐的先知》，第 426 页。

“第四国际”的发起文件是那样的贫乏，而“纲领性”文件却又只会把群众吓跑，因此托洛茨基的上述预言显得更加滑稽可笑。

伊·多伊彻指出，除美国托派组织有二百人之外，在一些西欧国家中建立的“第四国际支部”总共才有数十名成员^①。他说：“第四国际差不多是一个虚构”。托洛茨基本人在1938年也不得不承认，“第四国际在一些国家中只有为数极少的支持者”^②。1939年3月，他向曾经建议暂缓成立“第四国际”的信徒们说，他们所提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意见”，“逆流而上的人是不会与群众联系在一起”。

就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提出了“先锋队的先锋队”思想。他断言，一个“知道如何行事的”规模不大的小组，也可以成为未来大先锋队的小先锋队。其实这是老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固执的群众”和“积极主动的先锋队”，以及先锋队应“拖”着群众跟自己走的思想的翻版。托洛茨基要他的追随者相信，甚至一个人数有限的小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以变成一支大规模的先锋队。

同样，为了替其追随者的组织的现状进行辩解，托洛茨基又提出了一个“干部国际”的思想。他教训说，与其努力吸收广大群众参加国际，不如努力把以后在必要时能引导群众跟自己走的适当的干部队伍组织起来。这个论点在巴黎“成立会议”通过的一个文件中也有反映。文件中说：“国际到现在为止还主要是由干部组成。但是这些干部对于未来有重大的

① 伊·多伊彻：《被放逐的先知》，第420页。

② 引自《新闻战线》，1977年3月28日。

意义”。^①

托洛茨基虽然保证说“国际”会有千百万群众加入，他却不能与他周围的人们长久地成为同志。密切的交往常常是以破裂告终。问题并不在于托洛茨基象资产阶级史学家所写的那样“天生地惹人厌”。他不能以自己的思想吸引人们，唤起人们为实现这些思想而奋斗。其实他也没有可以鼓舞人的思想。这里所指的不是苏瓦林、马斯洛夫、费舍、毕威尔以及托洛茨基未能使之成为同盟者的那些人们，尽管从一开始他们就“同情”托洛茨基主义。即使是那些和他一道发起托派运动的人们，他也未能使其中任何一个人成为“他的事业的继承者”。美国托派分子沙赫特曼，1938年曾主持过“第四国际成立会议”，数月之后和托洛茨基发生了争吵，便同一些志同道合者组织了一个与“国际”敌对的小组。站在沙赫特曼一边的有美国托派分子伯恩汉和詹姆士，这两个人过去常和托洛茨基接触，一度曾是他的热烈的崇拜者。与托洛茨基最亲近的人们中间有不少也离开了他，如荷兰人范海尔诺特、西班牙的安德列斯·宁，法国的纳维尔，美国的托派分子麦克斯·伊斯特曼等等。他的私人秘书皮·弗朗克也离开了他，1935年托洛茨基指责他搞中派活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才又回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怀抱”。

此外，从三十年代参加活动到战后仍留在“第四国际”的托派分子，这里只能指出两个美国人——詹姆士·坎农（死于1974年）和约瑟夫·汉森。就是对这两个人，托洛茨基在他在

^① 引自西德政府公报《内部报告。政府，政党》（《Exklusiv-Bericht. Regierung, Parteien》），1973年6月10日第6页。

世的最后几年也多次指责他们搞“修正主义”和“实用主义”，称之为机会主义者、中派分子甚至……猪猡^①。在现在的“第四国际”中，他们仍被看作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叛徒”、“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播者”。

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培养的那些干部究竟都到哪里去了？每当他试图把这些人用一个政纲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就都跑掉了。

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国际”本身就是“国际托派运动”分崩离析的形势下出现的。有一部分托派分子（来自英国、德国、挪威、瑞典）在伦敦成立了自己的“广泛的”、“非宗派的”、“非教条的”“国际托派组织”，该组织选举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国际局”，但是无论是该组织还是它的国际局，都丝毫无所作为。

“第四国际”成立后刚刚几个月就闹起了风波，当时有一个托派组织，即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发生了分裂。沙赫特曼挖走了百分之四十的党员。托派的“国际”经过这一打击之后便一蹶不振，它的活动在战争前夕已陷于瘫痪。^②

托洛茨基还企图为他的“国际”在组织上的变幻无常找出“理论”根据。他声称，不应有“机械的完整无缺”^③。坎农在解释他的思想时写道：“托洛茨基从不认为第四国际是一个完整无缺的纯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它是一个广泛的革命运动，正

① 引自《战士》，1975年11月号。

② 参看詹姆士·P·坎农《狱中来信》(James P. Cannon, «Letters from prison»), 1962年纽约版第9页。

③ 引自《真理》(La Vérité)杂志, 1977年第575期第46页。

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一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情况下可能在其中居少数地位”^①。许多托派分子对坎农的结论提出异议，认为他在“鼓吹机会主义”。

托洛茨基也不得不考虑到，联合从一开始就是昙花一现，许多托派组织彼此互不相干，除了宣布自己参加“国际”之外，和“国际”本身并没有什么联系。1939年4月托洛茨基在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承认：“国际是由一些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组织以及少数与本阶级隔绝的工人组成的”^②。现在的托洛茨基追随者也不为这一事实争辩，他们说：“托洛茨基主要是在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中间，为建立第四国际进行顽强的奋斗”^③。

被各国共产党开除的叛徒们把托派组织当作避难所。正如美国托派过去的首领之一赫尔曼（后来他投入了基督教运动的队伍）所说的那样，他的组织是靠被各国共产党开除的人来补充的^④。

三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在被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情

① 引自斯劳特主编《托洛茨基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一部文献史》，（《Trotskyism versus Revision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Ed by Slaughter*）第3卷，1974年纽约版第80页。（*作者原文是 S. Slaughter. ——见第110页注②。据《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1976年第2卷和《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s Affairs》，1975年版两书所载《托洛茨基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一部文献史》的主编应为 C. Slaughter，故予订正。——译者注）

② 引自让·拉博特：《一切都是可能的！》，第331页。

③ 《捍卫托洛茨基主义》（《In Defense of Trotskyism》），1973年伦敦版第74页。

④ A·K·赫尔曼：《托洛茨基主义。号召到基层去》（A. K. Hermann. 《Trotskyism. A call to the streets》），1975年纽约版第18页。

况下形成的，它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反对苏联，反对各国共产党和破坏它们的战斗力，这一点在1938年“成立会议”通过的“纲领性”文件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现在的托派分子竭力广泛宣传这些文件，力图使它们具有长效性。他们要人们相信，“第四国际成立会议”的各项决议，“目前仍保持着自己的价值”，并从中寻找其反苏反共活动的论据。

“成立会议”的主要文件就是所谓的过渡纲领，标题为《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其要点如下：从资本主义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义上来说，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经是“过分成熟”了，“人类的生产力已经再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由于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整个人类的文明有遭到浩劫的危险”；“现在一切取决于无产阶级，而首先是取决于它的革命先锋队”；各国共产党和苏联都已不想革命；“人类的历史性危机就在于革命领导的危机”^①。

这些议论都是为指控共产党不想推翻资本主义而发的。这样便给以下这种极其简单而又典型的托派论点安上了一个伪理论依据：要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就必须“摆脱”工人阶级的领导，“摆脱”各国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被偷换成对托派所认定的与资本主义斗争不力者的谴责。“第四国际”提出的所谓“全世界性的革命前夕形势”已经形成的论点，也是为反对各国共产党的目的服务的。当反对法西斯危险已成为现实生活提出的首要任务时，托派分子却指责共产党人集中力量进行这一斗争，是由于不想进行根本的革命改造。他

^① 《第四国际文件集》，第181页。

们一面诽谤“共产国际已彻底倒向资产阶级制度一边”，一面重弹起他们最喜爱的老调：“在把革命前夕的形势改变为革命形势的道路上，主要障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机会主义性质”^①。

托派非常明确地声称，其首要任务不是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是反对反法西斯力量。“第四国际”在1939年2月公布的《法西斯国家中的过渡要求纲领》中写道：“无情地揭露人民阵线的理论和实践，是进行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首要前提条件”。

1938年苏联人民开始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两年之前苏联通过了宪法，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同时把劳动人民的伟大社会成就通过立法程序固定下来。

帝国主义的，主要是法西斯的宣传机器，竭力诋毁列宁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成就，诽谤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第四国际”加入了反苏分子的合唱。托派把臭名远扬的一国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论点，当作进行攻击的依据。“第四国际”毫无根据地否定苏联人民的历史成就。

在那段时间里，托派对其反社会主义的策略做了某些修改。如果说，过去托洛茨基预言，苏联将在经济上日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将陷入崩溃和危机，那么现在，他不得不考虑到苏联正在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笼了一个新的反苏“论点”，即“经济进步不等于社会主义”。这也不是托洛茨基的首创。帝国主义报刊同样鼓吹这种说法，

^① 《第四国际文件集》，第181页。

企图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隐瞒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是由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保证整个社会在社会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以及工人阶级执政后实行的许多其他措施。

“成立会议”重复了托派分子的诽谤，似乎苏联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议文件《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中说，“它仍然是一个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政体”^①。

托洛茨基恶毒地攻击苏联政府关于“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但是我们的土地也绝不让给别人”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中包含着“恶劣的维持原状纲领的精神”。他号召用“无产阶级革命的侵略性”来对待争取和平和集体安全的斗争。

“成立会议”继续奉行破坏反法西斯运动的传统托派路线。《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这一文件提出：“无情地揭露人民阵线的理论和实践，是进行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首要条件”。托派所忠实信守的仍旧是他们自己的一套作法。他们保证将来在某种场合要“以革命的方式”行动，而现时却在设法妨害反法西斯力量。

“第四国际”还阴谋破坏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一般民主斗争。托派一再散布他们的谰言，说什么争取民主是“反动的空想”，争取满足经济要求是毫无指望的，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无力承受改良时期的重担”。托派分子的目的是要把所谓

^① 《第四国际文件集》，第182页。

过渡要求纲领强加给工人阶级。

请看托洛茨基本人是如何说明这个纲领的实质的：“我们的任何一项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不可能实现。因此我们称之为过渡要求”。接着又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想得到满足的只是他们——资本家——能接受的要求，那末统治阶级将只满足所要求的十分之一，或者什么也不满足。而如果我们要求的更多并坚持我们的要求，资本家就不得不尽最大的可能付给我们”。托派奉行“要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的口号，是企图败坏各国共产党号召为满足劳动人民迫切需要而斗争的纲领性文件的威信。“第四国际”自命不凡地宣称：“旧的所谓‘最低纲领’今后要由过渡纲领所取代，过渡纲领的目的，是动员群众参加无产阶级革命”^①。

和过去一样，托派奉行的公式是“越糟越好”。他们特别寄希望于危机，认为危机似乎能巩固“第四国际”的地位。托洛茨基在一次对记者的谈话中说：“如果新的危机到来，那将出现对共产国际十分困难，而对我们非常有利的局势”。

“第四国际成立会议”提出的纲领的要点就是这些。就其实质看来，它是一个反革命的纲领。

^① 引自《新闻通讯》，1969年4月5日。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托洛茨基主义

战争向来是对各个政党和组织的战略和策略观点的检验。战争不止一次地撕下了那些在和平时期立场“比左派还左”，“比革命派还革命的人”的假面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暴露了托洛茨基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破产，戳穿了它充当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同盟者，充当社会主义和革命力量的凶恶敌人的真正嘴脸。无论是在西欧各国还是在整个国际上，托派都竭力干扰组织反对纳粹侵略的斗争，自愿充当法西斯主义的走狗。

托派的这一段丑史（可惜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对它还论述得很少），其本身就是一部对“第四国际”的控诉书，就是历史这个严峻而客观的法官对它的指控。

托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看法

众所周知，列宁十分重视科学地判断战争的性质和养成对待战争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他说：“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要弄清

战争的性质，首先必须确定这次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具体环境是怎样的。必须把这次战争和产生它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自己对它的态度。”^①

列宁注意到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每次战争。他坚决反对在不同的条件下表面地类推和机械地搬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立场和口号。列宁写道：“战争是一种五花八门、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東西。用一般的死板公式硬套是不行的。”^②

共产党人积极地反对战争贩子，确定了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并且制定了自己对待战争的态度。正如各国共产党所预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第一次大战一样，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帝国主义之间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化的结果。但是两次战争又有很大的区别。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这首先是由于出现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支柱。这一点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因为它排除了用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态度来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帕·陶里亚蒂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今后的战争，即使它是在两个帝国主义列强间爆发的，或者是某个大国对一个小国的战争，都必然有形成反苏战争的倾向，必然会转变为反对苏联的战争。”^③

保卫苏联的利益，决定了国际工人阶级、各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路线。因此，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下述任务：如果战争爆发，就要号召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91页。

^② 同上，第35卷第262页。

^③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言论选》第1卷（1923—1956年10月），1965年莫斯科版第151—152页。

“全体劳动人民采取一切手段和不惜任何代价协助红军战胜帝国主义军队。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点，还在于柏林—罗马—东京法西斯轴心国不是简单地想重新瓜分世界，而是要夺取世界的统治权，奴役和消灭许多民族和国家。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命运受到致命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在揭露帝国主义势力是战争危险根源的同时，共产党人不接受所有资本主义强国都负有同等责任的观点。如果说在1914年，革命的列宁主义者主张使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战争中失败，那末现在，整个政治局势所要求的，是反对德日意这三个抱有侵略野心的最危险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和苏联的主要敌人是德国法西斯，因此共产党人号召集中力量打击它。

解决保卫祖国问题和解放战争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了。1914年，当企图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互相厮杀时，保卫祖国的口号等于是保卫掠夺权。而且就是在当时，列宁也反对把否定保卫祖国的口号变成死板的公式。他批评了那些声称根本“不可能再有民族战争”的人。这种战争是完全可能有的。“在真正的民族战争中，‘保卫祖国’一语则完全不是欺骗，我们决不反它。”②

因此，共产党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个广泛的纲领③。

①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集》，第4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1页。

③ 详细情况请参看鲍·莫·莱布森、基·基·希里尼亚：《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第178—199页；《共产国际。简明历史纲要》，第478—488页。

这个纲领是真正的原则性和周密地科学分析具体历史条件的范例。它的各项原则贯彻了马列主义的优秀传统精神。战争的岁月证实了这一纲领的伟大生命力。

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套观点则与这个纲领针锋相对，其突出特点就是，帮助法西斯主义实现仇视人类的计划。

由于不再相信自己一派在和平条件下能变成群众性的组织，托洛茨基便希望战争能给“第四国际”带来好处。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说：“战争每一天都对我们有利”。托洛茨基渴望战争，幻想战争能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致命的打击。他曾作过这样的预言：共产国际所属各党将成为“第一批牺牲品”，“它们的灭亡将是建立新生的革命运动的最重要的条件。”

托派分子疯狂地攻击各国共产党关于必须对侵略性的法西斯制度同主张和平与集体安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的论点。托洛茨基称这种论点是“不够格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潜在的法西斯国家，所以他宣称对这些国家采取任何区别对待的态度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托洛茨基说，是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取得胜利，还是与它们对立的国家取得胜利，归根到底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战争会震动国际工人阶级，推动他们采取革命行动。他写道：“日本的胜利乃至希特勒的胜利都不是历史的最终定局。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战争仍将是革命之母。革命从一开始就会在发达的国家，同样也在落后的国家提出并重新审查人类历史的全部问题，会为克服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

差别本身铺平道路。”

反对希特勒德国的力量取得胜利也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第四国际”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宣言》中说：“英法帝国主义的胜利对人类根本命运的凶险程度，并不亚于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胜利。资产阶级民主得不到拯救。工人帮助本国资产阶级反对外国法西斯，只会使本国的法西斯更快地取得胜利。历史提出的任务不是要支持帝国主义体系中的一方反对另一方，而是要消灭帝国主义体系本身。”^①

托派打算如何“消灭这个体系”呢？首先是推行使“本国”政府失败的政策。他们宣称：“官方的爱国主义只是掩盖剥削者利益的面具”^②。在这里，“第四国际”要人们相信，只有实行这种政策才是革命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已经证明它是正确的。“第四国际”不愿考虑，1939年主张失败主义与1914年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法西斯军队占领一个又一个国家时，失败主义政策就是不抵抗侵略，就是自愿接受纳粹的奴役。

当捷克斯洛伐克受到致命威胁的时候，托洛茨基仍坚持那条失败主义路线，声称支持它就是支持帝国主义剥削。他硬说：“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十足的帝国主义国家……即使从

① 《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Manifesto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on the imperialist war an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1940年纽约版第44—45页。

② 引自法国托派机关刊物《工人报导》(«Informations ouvrières»), 1970年5月20—27日第476期。

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来说，战争也不会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而是为了保存乃至尽可能地扩大帝国主义剥削的疆界”。他号召人们把纳粹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当作一桩“不值得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的小事来对待。

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不成问题地要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其他受纳粹奴役的各国人民一边。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指出，如果希特勒进攻捷克斯洛伐克，那末保卫它就是正义的事业，国际无产阶级有义务给予援助。正如大会决议所指出的那样，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不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犯的战争，可能具有解放战争的性质，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对此不能不加干预。^① 然后，1939年6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指示中又指出，希特勒分子在被占领的国家执行的是民族灭绝政策，共产党人应当成为捍卫民族事业的战士，应当采取最适当和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抵抗。指示中说，抵抗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任务“要求实行的路线，是最广泛地把各方面的人民力量团结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乃至因受德国暴力压迫，而愿意放弃其投降路线和合并路线，并赞成同人民一起走上抗击德国法西斯强盗的道路的资产阶级分子。”^②

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小伙托洛茨基追随者得到的是托洛茨基的另一种指示。在1938年10月托洛茨基就写了《新的教训。论当前战争的性质》一文，他在文章中鼓吹工人阶级无论

① 参看《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集》，第38页。

② 《共产国际。简明历史纲要》，第471页。

如何都不应当支持希特勒侵略下的牺牲者。“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并吞了苏台德日耳曼，匈牙利人、波兰人，可能还有斯洛伐克人的住区之后，希特勒决不会以奴役捷克斯洛伐克人为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才需要无产阶级的支持。这种提出问题的方法不外是社会爱国主义的诡辩”。接着他还恬不知耻地说，考虑问题应当从全局出发而不应着眼于个别的小事件，尽管他在这里所谈的是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问题。

臭名昭著的公式“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一贯被用来为消极等待未来的大变革作辩解，把加速这种变革的一切实际措施都说成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和“与革命者身份不相称”的行为；现在托派分子便利用它来加强对反法西斯运动的攻击。对于任何一个遭受德国法西斯奴役的国家来说，托派的这种路线只能被认作是背叛性的、反人民的、反民族的路线。但是他们并不因此感到难堪。为了替他们的失败主义政策和削弱抵抗希特勒侵略的国家的政策进行辩解，托派宣称“无产者没有自己的祖国”。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场合下一样，他们歪曲了列宁的思想。列宁在1908年写道：“‘无产者没有祖国’——《共产党宣言》上的确是这样说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论断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生活在哪一个祖国都无所谓，生活在君主制的德国，或共和制的法国，或专制的土耳其都一样。祖国这个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环境，是无产阶级斗争中最强有力的因素……无产阶级不能对自己为之进行斗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采取无所谓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因而，他们对本

国的命运也不能抱无所谓的态度。”^①

托洛茨基是否意识到“失败主义”政策于法西斯有利呢？看来，他是了解的。他在1938年6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承认：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站在失败主义的立场上，“工人阶级会使希特勒容易实现其军事目的，起码也会为他做工”。然而托洛茨基认为这只是“军事地图上的问题”，因为据他说局势终究要起变化。“想想看吧，”——他写道——“革命政策终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占居优势，它会导致取得政权。这对希特勒来说，比给予捷克斯洛伐克的爱国主义支持要危险百倍。”

在实际上真正地帮助希特勒，同时又虚无缥缈地指望让他以后再“倒霉”——这就是托洛茨基构想的涵义。

大事吹嘘“新秩序”的纳粹宣传机器抱怨说，建立“新秩序”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国界和作为“过去的沉重遗产”留在欧洲的一些“布头国家”。法西斯的论点同托派消灭民族国家的号召又是如此合拍。1940年5月“第四国际”郑重地宣布：“必须用以革命手段破坏民族国家的口号，来对抗‘保卫国家’的反动口号”。这段话就是在丹麦和挪威被占领几个星期之后，在希特勒军队入侵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占领了卢森堡的时候宣布的。

托派分子不是号召人们抵抗纳粹主义，而是号召人们反对共产党人和反对共产党人提出的广泛的反法西斯行动纲领。他们指责共产党“背离阶级立场”，“放弃革命目标”。为了抵制组织国际范围的反法西斯斗争，托派声称，只有德国本国的工人才能消灭希特勒。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68—169页。

苏联和各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一个支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联盟，对这一努力托洛茨基也进行诽谤中伤。1938年9月他自问自答地说：“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反希特勒军事同盟意味着什么？”“这将是凡尔赛枷锁的翻版，而且是更加沉重、更加血腥，更加不可忍受的枷锁”。

托派在战争前夕宣称，凡是与苏联建立军事同盟关系的资产阶级国家，他们都将反对。他们将象对待任何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地对待苏联，也就是要争取使它在战争中失败。

从理论上的失败主义到行动上的失败主义

托派分子在希特勒占领的国家，尤其是在法国的活动，说明了他们是怎样实现其政治路线的。法国有好几个托派组织，很难说总人数有多少。按照1934年3月法国警察当局记录，在巴黎有五百人，外地的人数大致相同^①。战前，这些组织在国际托派组织中是颇有影响的，当时他们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并肩成为国际托派的“旗手”。

自从法国开始参战，托派就持失败主义立场。他们到处散发传单，宣传托洛茨基在1940年6月写的《我们决不改变自己的方针》的声明。声明中专门谈到本国政府的失败只是一件小小的坏事。托洛茨基号召为反对“假国际主义者”而斗争。他在这里指的是法国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在1940年6月6日希特勒兵临巴黎城下时，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把首都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他们要求政府放弃反人民的政策，动员全

^① 让·拉博特：《一切都是可能的！》，第137页。

国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但是统治集团宁愿投降。于是共产党人便着手组织人民抵抗委员会。1940年7月10日法共中央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共产党人号召无情地打击占领者和反人民的维希政府，建立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法国自由独立复兴阵线”。1941年5月根据法共的倡议成立了反法西斯民族阵线，全国有很大一部分爱国力量参加了这个阵线。在开展游击运动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法共中央在1941年5月15日的号召书中强调说：“法国共产党遵循的唯一目标，就是在争取国家独立的神圣事业中，实现民族团结，它认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郑重宣布，为了建成广泛的民族解放阵线，它准备支持任何法国政府、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只要他们努力进行有效的斗争反对法国所遭受的民族压迫，反对为侵略者效劳的卖国贼。”^①

在法国最困难的时候，劳动人民反希特勒奴役者的斗争的真正民族利益，是和视法西斯主义为死敌的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利益相一致的。法国共产党人忠实地履行了自己崇高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义务，成为抵抗运动的组织者和鼓舞者，动员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入反法西斯斗争，法共在这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中损失严重。死于纳粹屠刀下的党员有七万五千人。人民把法国共产党称为“被枪杀者的党”^②。

① 引自《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三部分（1939年—五十年代中期）》，1966年莫斯科版第14页。

② 正如雅克·杜克洛指出的那样，“在抵抗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个党，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象法国共产党那样，为祖国的解放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为祖国的解放牺牲了那么多的成员。”——《法国共产党史（手册）》（《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Manuel)》），1964年巴黎版第451页。

托洛茨基以战败为目标的“小小坏事”的策略，是和保证胜利进行反希特勒强盗的解放斗争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实行这个策略的前提，是要成立一个“对内战线”，其目标不是反对敌军，而是反对那些被托派指责为执行“纯粹资产阶级政策”，“不愿实行革命改造”等等的从事反法西斯解放斗争的某些组织。其实，和直接接纳粹分子指示办事的附敌分子一样，托派执行的也是分裂抵抗运动的路线。看来，正因为如此占领者才容忍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活动。维希政权采取的也是这种立场。

有那么一个组织，尽管其中连一个无产阶级的代表也没有，可是自称为“国际主义工人党”（1936年6月2日成立），它出版了一份《工人斗争》周刊。还有一个叫“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委员会”的组织（1943年由几个小组织合并而成）出版了一份《真理》周刊。此外，在法国还成立了一个“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小组^①。

托派甚至能在被占领的情况下举行自己的代表会议。例如，在1944年年初就举行过一次代表会议，会议通过决议，把围绕《工人斗争》和《真理》两个刊物形成的两个组织合并组成“国际主义共产党，作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在1944年2月，即在巴黎武装起义前半年，托派还办了一件在当时的形势下很难办到的事：召开了“第四国际”欧洲“支部”代表会议。托派刊印了大量的宣传材料、杂志和报纸并广为散发，而且这些宣传品的名称都很响亮，例如“法国革命”、“我们的革命”、

^① 让-雅克·玛丽：《托洛茨基主义》，第57、74—75页。

“我们的斗争”、“自由”、“苏维埃”等等。^①托派写道：“对法国来说，对欧洲来说，美国是一个比希特勒德国大得多的危险”。因而，他们也对法西斯德国进行非难：“德国削弱了英国，因此它迄今一直在充当着美国走卒的角色”^②。1943年3月，托派用“亲美的法西斯主义”的说法来吓唬法国人民，希特勒主义和它比较起来简直成了一件好事：“美国的胜利将意味着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失败，意味着回到野蛮时代”^③。出版《苏维埃》周刊的另一个托派组织在1943年4月1日宣称：“我们反对一个帝国主义战胜另一个帝国主义……”^④。

在法国南部活动并自封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一些托派分子，在1940年指责共产党人实行的反法西斯政策。他们主张“法国同德国立即媾和”^⑤。当法西斯军队野蛮地迫害和平居民，用暴力把工人押往德国的时候，托洛茨基竟鼓吹说：“德国的士兵，即工人和农民，将对被战胜的人民比对他们本国的统治阶级抱有更大的同情”。

① 让·拉博特：《一切都是可能的！》，第356、367—368页。现在的托派声称，在战争时期他们的报刊也受到了迫害，并举出了下述事实为证：1941年6月13日纳粹分子逮捕了托派机关刊物《巴黎革命》的发行人让·卢，判处了他……六个月监禁。处罚是相当宽容的，因为它大致上只相当于对德国国内犯了些小过错的编辑和发行人的处分。因此这一事实简直可以说是纳粹对托派普遍优待的典型，而决不是受迫害的例证。

② 同上，第348页。

③ 同上，第367页。托派还力图用这种办法败坏反法西斯斗争的声誉。他们声称：“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反希特勒的政策”，“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所有这一切都不外是美帝国主义对人民施加压力的结果。

④ 让·拉博特：《一切都是可能的！》，第367页。

⑤ 同上，第342页。

托派分子对英勇的全民反法西斯斗争也持批判立场，他们谴责对纳粹军队进行武装抵抗，因为他们认为抵抗是……同国际主义不相容的。托派分子声称，穿纳粹军装的是德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号召同他们搞友好亲善活动。《真理》周刊在1941年还谴责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对希特勒军队的军事人员和附敌分子进行恐怖活动^①。

同纳粹分子搞友好亲善活动的口号不是偶然提出的。托派分子后来也一直在坚持这一口号。上述的那份《真理》周刊在1944年5月1日对法国人说：“第四国际号召你们同你们的德国兄弟搞友好亲善活动”^②。

为什么要号召受害者同害人者，被劫者同劫掠者，被压迫者同压迫者亲善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教条式地忠于生搬硬套的公式的问题。

托洛茨基主义在战争年代的政策，还反映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固有的不坚定性、摇摆倾向以及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习性。当反法西斯运动日益向全民起义发展时，这部分小资产阶级便惊慌失措，由于根深蒂固的对共产党人的偏见^③，使他们对以法国共产党为其灵魂和组织者的抵抗运动开始持敌视态度。

① 莱奥·斐盖尔：《托洛茨基主义即反列宁主义》，第195页；让·拉博特：《一切都是可能的！》，第369页。

② 让·拉博特：《一切都是可能的！》，第373页。

③ 为了迎合这种符合托派思想观点的情绪，《第四国际》杂志在1944年8月号号召集中力量“反对那些不能成为领导者的人”。这样，托派又一次证明，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反对法西斯，而是反对共产党。

于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同希望阻止民族解放斗争转变为反法西斯民主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一次不谋而合。大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破坏国内反法西斯力量。稍加改头换面地反映某些小资产阶级对深刻社会变革的惧怕心理的托派，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行事的。

托派还竭力败坏抵抗运动的声誉。他们搞出了一些假左派组织与抵抗运动相对抗，这些组织的纲领中既有假革命词句又有投降主义的提法。1940年7月，他们成立了一个“革命民族运动”，其中也有毕威尔的追随者参加。据它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既不亲英，也不亲德、亲法，而是一个“主张欧洲与德国合作的组织”，但不赞成“压迫下的合作”。它的“纲领性”声明中说，“在等待解决军事冲突的过程中，法国人应该既不搞亲英宣传，也不搞亲德宣传。他们的言行举止应该象法国人的样子”。

在他们含糊其词地号召“不要再在亲英的观望政策和亲德的屈膝行为之间摇摆不定”的背后，仍掩藏着帮助法西斯行凶作恶的勾当^①。托洛茨基分子对采取某些措施迫使资产阶级放弃观望政策的建议，根本不感兴趣。1942年5月22日《真理》周刊写道：“法国劳动人民有两个敌人，即赖伐尔和戴高乐”^②。同时托派又提出了“由革命民族运动组织夺取政权”，“实行银行国有化并把银行合并为统一机构”的“左”倾口号，

① 让·拉博特：《一切都是可能的！》，第343—344页。观望政策是消极等待“新秩序”垮台并指望在战争结束阶段夺取政权的一些资产阶级组织所执行的政策。它们只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压力下才被迫同意采取联合行动。

② 同上，第366页。

正如人们所意料的那样，“革命民族运动”还未来得及形成就垮台了。

此外，还有一些托派分子自己就鼓吹“革命的观望政策”。他们断言，“对法国的占领不会长久，因为德国一定会爆发革命”^①。

托派关于“社会主义欧洲联邦”的臆想，也同样浸透了“观望政策”的思想，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联邦”将取代法西斯的“新秩序”。托派要人们相信，希特勒分子几乎统治了整个西欧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样就更加容易向全欧社会主义过渡。“国际主义工人党”公开宣称：“大资产阶级在希特勒欧洲范围内的联合，使得有可能……把希特勒欧洲当作跳板联合工人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来反对它。……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应当组织起团结德国劳动人民和德国士兵反对纳粹的活动，以便走上社会主义欧洲联邦的大道”。^②

据“第四国际”的领导者们承认，“走上大道”不会很快。例如，法国的一个托派头目，在建议其追随者到附敌机关工作（据说是为了在那里贯彻“革命政策”）时说：“我们认为，德国人将长期占领欧洲，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我们参加那些在将来唯有它们能分享政权的组织的问题。”^③托派就以这种借口参加了法国“志愿”军团，这是一个由法西斯当局直接下令成立的武装镇压抵抗运动的机构^④。

① 让-雅克·玛丽：《托洛茨基主义》，第74—75页。

② 同上。

③ 莱奥·斐盖尔：《托洛茨基主义即反列宁主义》，第195页。

④ 让·拉博特：《一切都是可能的！》，第365页。

法国托派认为，在抵抗运动队伍中宣传自己的观点是他们的一项主要任务。1944年通过的《欧洲临时书记处关于游击运动的决议》中说，托派应“把自己的政策灌输到游击队中去，以便重新配置力量”^①。“重新配置力量”的意思就是加强他们的地位，削弱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地位。

在托派组织之间实行一种特殊的责任分工：“国际主义工人党”秘密向游击运动渗透，而所谓“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委员会”则集中力量在各类工厂的工人团体中进行破坏活动^②。

战后时期，为了证明自己的同伙在当年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托派的“思想家”（例如，弗朗克在《第四国际。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的贡献》一书中就曾写到过这一点）鼓吹说，战争期间有些托派分子曾为反对纳粹主义进行过战斗，甚至还牺牲了生命。实际上那是些已经和托派断绝关系的人们。为此，这些人在《关于工人运动的形势和第四国际发展远景的提纲》（1944年4月）中还受到过批判。这份《提纲》要求“在国际主义原则立场上”采取措施防止“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流行病感染的危险”。其中还谈到必须反对“社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问题。《提纲》着重指出，有些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支持抵抗运动是一种“社会爱国主义的反常现象，应该作为与第四国际的纲领和基本思想都不相容的行为，再次加以公开谴责和抛弃”^③。

① 让·拉博特：《一切都是可能的！》，第372页。

② 让-雅克·玛丽：《托洛茨基主义》，第75页。

③ 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第48—49页。

因此,法国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完全有理由认为,托派分子是希特勒的奸细。不论其主观情况如何,就客观作用而言,他们也正是这样的人。

这一评价也适用于希特勒军队占领下的其他西欧国家的托派分子。他们都参加了1944年在法国举行的托派国际代表会议,都支持这次会议作出的“失败主义”决议。

托派执行的是使苏联在对外政策 方面遭受孤立和失败的路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第四国际”就以讨论为名肆无忌惮地进行反苏宣传活动,1941—1945年期间,这种活动搞得尤其猖狂。首先发难的是美国的托派分子沙赫特曼和伯恩汉。1939年9月,他们建议重新审议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成立会议”对苏联的政治评价。他们诽谤说,苏联不再是“变质的工人国家”,已经变成一个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成果似乎已经丧失,而在国内“反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沙赫特曼和伯恩汉居然使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许多党员相信了这一点,而且在英国、加拿大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附和者。

战争爆发刚刚几天,托派就掀起反苏恶浪,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除了捏造十月革命成果已经丧失的谎言之外,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同样是诽谤性的论点:既然苏联已经变成“一个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谈不到国际工人阶级在它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予以支持的问题。他们说,对待它应当同对待

任何一个帝国主义一样，也就是应当争取使它失败。

“第四国际”另一派系的参加者反对沙赫特曼和伯恩汉的观点，认为这两个人走得“太远了”。但是他们也没有放过讨论的机会，把一大堆荒诞无稽的罪状强加在苏联和苏联各族人民头上。

至于在帝国主义侵略者反对苏联时应当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与沙赫特曼只有细微差别，而无实质不同。托洛茨基又搬出了他早先的论点：必须利用战争时机推翻苏联政府。

这两派都否定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要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敌视苏联。他们都是要使人们相信，苏联在遭到帝国主义军事进攻时必定失败。按照他们的一致看法，国际革命运动不会因此遭受损失，因为战争将是阶级斗争的“新起点”，世界革命必将随之迅速到来，因此人类就会在军事冲突结束后获得“新生”。在托派看来，苏联的失败将不过是今后一系列“比较重大的”世界事变中的一个小小插曲。

1940年5月在纽约通过了一个《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托派在那里也谈到了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他们宣称：“战争是革命之母”，并号召人们不要惧怕破坏，因为无产阶级会迅速实行重建，而且许多东西将建设得更好。《宣言》对战争进行了一种奇特的歌颂：“战争可以毁坏大厦、铁路、工厂、矿山，但是它不能消灭技术、科学和技艺。无产阶级在创建了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自己的队伍，把资产阶级政权遗留下的熟练干部纳入生产过程，并按照统一的

计划组织起生产之后，不仅能在几年之内把被战争毁坏的一切重建起来，而且还将在团结的基础上为文化的高度繁荣创造条件”。^①

和托派的其他文件一样，《宣言》的矛头不是指向法西斯主义，而是指向苏联。《宣言》中说：“我们坚决否定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接着便提出了行动纲领：“第四国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准备以革命手段推翻莫斯科的统治者”。^②

托派竭力为帮助各种反动集团在国际上加紧孤立苏联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帝国主义反动派一样，“第四国际”并不掩饰它希望出现联合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同苏联对峙的政治局面。

托派企图煽动西方的工人阶级和进步舆论反对苏联。为此他们根据讲话的场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臆造：忽而指责我国“背叛革命”，忽而指责我国“对外政策狡诈”，忽而又指责我国是“民族利己主义”。同时，他们还竭力用假革命的词句阻挠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阻挠建立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政治和军事同盟。

战争前夕，托派搞了一个要求撕毁 1935 年 5 月签订的法苏互助条约的宣传运动。他们肆意诬蔑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号召法国的劳动人民“以革命的名义”反对这项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在受到第三国的军事进攻时，缔约双方应立即

① 《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第 38 页。

② 例如，托派当时寄希望于苏联国内燃起民族主义情绪。1939 年 7 月托洛茨基曾号召建立“统一、自由和独立的乌克兰”。他预言当战争爆发时就会出现“政治革命范围内的民族起义”（《第四国际》，1972 年第 4 期第 27 页）。

相互援助。这一条约与同时签订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互助条约一起，本可作为欧洲集体安全体制的基础。可是法国的反动势力却把同苏联签订协定当作权宜之计，并不打算履行所承担的义务。

反希特勒同盟的建立激起了托派头子的切齿痛恨。“第四国际”在1943年发表的宣言，把这个同盟称之为“同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行为”^①。美国托派头子坎农当时也宣称，这种联盟是与列宁的观点不相容的。^②

然而，苏联遵循列宁的指示，主张集体抵御法西斯侵略和建立反希特勒同盟。列宁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指出，取得了胜利的工人阶级国家，如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适宜的，可以同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强国集团签订协定。“如果军事协定不违背苏维埃政权的原则，能够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和阻止某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对它的进攻……”共产党人不应“完全拒绝同一个帝国主义联盟缔结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的军事协定”^③。

促使爱好自由的力量团结到反法西斯同盟队伍中来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认为，苏联能够战败希特勒德国并拯救世界文明。法西斯侵略者背信弃义进攻苏联之后，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立即掀起了支持苏联人民的运

① 《共产国际的终结。第四国际的宣言》(《The End of the Comintern. The Manifesto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3年纽约版第31—32页。

② 詹姆士·P·坎农：《共产国际的终结》(James P. Cannon, 《The End of the Comintern》), 1943年纽约版第15—1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35页。

动。广泛展开了要求给与苏联人民以必要援助的活动。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不能不予以考虑,而且它们也担心,希特勒德国的胜利孕育着对它们的威胁。

托派则宣称,对工人阶级来说反希特勒同盟的危险性不亚于法西斯集团各国。他们指责苏联“为了稳定资本主义制度”“从事反无产阶级的活动”。实际上,他们执行的政策才是反对世界革命运动、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他们的政策会导致国际工人运动成果的丧失。

1943年3月,即希特勒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溃败后几个星期,法国托派甚至还说:“苏联的失败是必然的,但这是一个暂时性的事件”,因为“西方无产阶级必定会发起新的冲击”^①。

托派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反法西斯国家中的活动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在各国参战以前,托派的政策是阻止它们参战。例如:“社会主义工人党”号召美国工人阶级向罗斯福政府施加压力,以使美国保持中立。与该“党”竞争的沙赫特曼一伙则露骨地说,他们的任务就是“阻止美国以任何方式参加新的世界战争”。他们宣称:“苏美同日本及某些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会使战争的性质有所改变”^②。

① 让·拉博特:《一切都是可能的!》,第366页。

② 洛伦·巴茨编《美国的左派。二十世纪的激进政治思想》(《The American Left. Radical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by Loren Bartz), 1971年纽约版第298页。美国托派分子还提出了这样的论点:“支持俄国奉行的联盟政策就是主张第三次世界大战”(同上,第303页)。他们这是力图使人们相信,“社会帝国主义”(他们这样称呼苏联)一旦胜利就会利用其军事实力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英国托派奉行的也是这种政策。他们认为，在苏联被迫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工人阶级应当“置身于战争之外”。苏联站在帝国主义‘同盟国’一边参战，无论对两边的帝国主义者来说，还是对其他什么人来说，都不会使战争的性质有所改变。这也改变不了我们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战略”。紧接着他们又补充说：采用“反法西斯主义”一词的是“社会主义的叛徒”^①。伦敦“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现任领导人之一杰里·希利吹嘘说：“这是一场……资本主义战争，凡是与工人阶级有利害关系的事它一件也解决不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唯一作出这样的声明的国际流派”^②。

美国和英国的托派力图首先在军事企业组织罢工，号召抵制向苏联供应武器。顺便提一下，“第四国际”现在的“思想家”不仅不因其先辈的这种行径感到羞耻，反而引以为荣。

出于同样的目的，托派还号召阻止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因为“它将阻碍欧洲的革命斗争”^③。法国的托派则恐吓说，美英军队的登陆会导致“奴役”欧洲和加强蓄意实行所谓“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苏联^④。

在战争的进程发生了有利于反希特勒同盟的根本转变的时期，托派的所作所为也是引人注意的。他们认为这时可以

① 引自《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 1973年第3期第135页。

② 转引自《今日马克思主义》，1964年第9期第277页。

③ 同上。

④ 让·拉博特：《一切都是可能的！》，第368页。

公开地对法西斯德国表示同情。例如，1943年12月，“第四国际欧洲临时书记处”曾对轰炸德国的军事目标表示“愤慨”。和戈培尔的宣传机器一样，托派也挖空心思地诽谤德黑兰会议——三大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提出了反希特勒同盟的总战略，并制定了战后和平调整工作的初步轮廓。

1945年5月，当战争的炮火最后停息下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为胜利而欢欣鼓舞。托派却同肆意亵渎千百万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的战士的一些人站在一起，公然说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而战争也没有得到期望的结局。沙赫特曼和他的信徒们抱怨“俄国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乃至严重的社会变动，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社会结构，在那里都原封未动”^①。他们和其他托派分子一样大失所望，因为苏联的社会政治基础不仅没有被战争动摇，反而更加巩固了。沙赫特曼甚至公然声称，在战后，一种更加严酷的“新奴役制”取代了法西斯的奴役制。他在1945年9月写道：“同盟国从轴心国奴役下每解放出一个人，至少要有两个或三个人遭受同盟国的奴役。改变的只是被奴役者的姓名和所在地，而不是奴役制本身”。谈到德国和意大利的人民，沙赫特曼说：“与战前相比，这两国的每一个居民得到的自由更少，受到的奴役更大；其中许多人不是比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统治下更自由了；有的人要比在轴心国统治时期更不自由”^②。

沙赫特曼所说的“失去自由”指的是什么，他想同谁站在

① 《美国的左派。二十世纪的激进政治思想》，第328页。

② 同上，第319页。

一起？大国波茨坦协定堵塞了法西斯主义复活的道路。同时为在原法西斯国家恢复真正的民主自由，为各国人民在和平与进步的道路上前进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可是托派站到了自由和民主的敌人一边。这一点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工作期间（1945年11月—1946年10月）表现尤为突出。他们把这次审判说成是“胜利者的复仇举动”，对法庭上向法西斯提出的指控的正确性散布怀疑。1946年10月12日，英国托派《社会主义先驱》周刊发表了一篇标题嚣张刺目的长文：《过错不只在一方！》。文章的作者们为法西斯的暴行辩护，说那是对“另一方的暴行”的回答。他们恬不知耻地写道：“历史上有过不少的骗局〔？〕，可是其中没有一个象这次审判这样令人莫名其妙”。^①对于在死亡营中被纳粹分子杀害或折磨死的千百万人的英灵，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亵渎吗？

托派不仅仅是对遭到军事失败的希特勒分子表示同情。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所作的社会评价，再一次清楚地表现了托派的反革命本质。

托派同最反动的势力站在一起，要人们相信战争带来了“莫斯科在东欧的统治”。“第四国际”宣称，战争的结果，国际工人阶级不是赢了，而是输了。顺便说一下，“第四国际”现在的首领们仍在继续坚持这一观点。例如塔利克·阿里在《即将到来的英国革命》一书中明确地说：“欧洲工人阶级，由于斯大林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有助于资本主义稳定的阶级附敌政策而遭到的失败，使革命的胜利更加推迟

^① 引自《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1961年版第20页。

了”^①。

托派分子所说的“附敌政策”究竟是什么呢？原来他们指的是战后拥有巨大军事实力的苏联没有立即去“推进革命”，即没有把枪口指向反希特勒同盟国家。在战争期间逃避反法西斯斗争并诽谤这一斗争的托派分子，现在竟责难起西欧各国共产党来了，说它们“在反法西斯内战期间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目标”^②。

所有这些毫无根据的声明，都是为托派自己所实行的、与反法西斯斗争的利益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政策作“论证”的。在关系到世界革命运动的命运的最紧要关头，托洛茨基主义充当了最黑暗的反动势力的帮凶。

① 塔利克·阿里：《即将到来的英国革命》（Tariq Ali. 《The Coming British Revolution》），1972年伦敦版，第19页。

② 《工人新闻报》，1970年1月22日。

第四章

四十年代后半期至五十年代的 托洛茨基主义：“实验室时期”

“实验室时期”——托派分子自己这样形容他们战后最初十五年的历史。这种“实验”服务于一个目的，即寻求适当的活动方式和方法，以使各个托派组织在政治生活中站住脚而不致覆没。保存下来并且维持下去，已经成为“第四国际”的首领们比战前更关心的问题。许多托派组织在战争结束时有的已经解体，有的在勉强维持，整个托派经历着极其严重的思想危机。

被生活嘲讽的种种预测

托洛茨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政治是一门关于发展前途的科学”。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没有本领预见到世界革命发展的前景。他的预言一个也没有兑现：

一、托洛茨基曾多次反复地说，一旦爆发战争，帝国主义将毁灭苏联，这个预言落空了。他关于战争将成为苏联社会无法克服的矛盾的根源，关于战争将引起民族主义的离心倾向，将把苏联推向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边缘的臆测也都破产了。

我国在这场流血最多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从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苏维埃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的周围，无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劳动中，苏联共产党都被公认为群众的领导者。

二、历史为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为革命斗争由最初的民主阶段向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革命正象马克思主义者预见的那样，在具备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地方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国家开展的人民民主革命，并不是“从外部塞进来的”或“输出”的，而是阶级矛盾和革命危机急剧尖锐化的结果。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农民进行了多年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本国反动派的斗争，为革命力量的胜利作好了准备。苏联的兄弟援助促进了胜利的到来，把这些国家的人民从法西斯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制度提供了条件。可见，这些国家的革命之所以可能取得胜利，是内部和外部的有利因素有机结合的结果。

世界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跨出了苏联国界，成为一个世界体系，成为对一切国际事态发展具有影响的世界革命过程的主要动力。

三、托洛茨基关于帝国主义“不容许”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顺利开展的论断也是站不住脚的。

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巩固，民族解放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经开始解体。这个过程从亚洲开始，现已遍及非洲大陆。

四、托洛茨基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不可避免地要变成法西

斯主义的说法也没有得到证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民群众在资产阶级企图采取法西斯管理方法时实行对抗的能力增强了。吸收各阶层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争取一般民主的斗争，已经蓬勃开展起来。这就使垄断资产阶级很难不顾民主力量的反击，公开采取恐怖手段。

五、托派分子早在 1938 年就提出过，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争取实现切身经济要求和一般民主要求的斗争，似乎不再可能作出让步，这种论点在现代条件下已显得十分荒谬。无产阶级在战后经过激烈的阶级搏斗所取得的胜利，明显地推翻了这种投降主义的估量。

六、托洛茨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战争一开始就会解体”的暗淡前景的预言也没有应验。共产党人是当时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灵魂和良心。如果说，共产党人在战前只有四百二十万，那末到战争结束时已经达到二千万^①。

七、战争每一天都会使托派运动得到加强的说法，遭到了生活的无情嘲讽。战争的年代进一步揭露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本质。被托派的响亮空话欺骗的人们都抛弃了它。

托洛茨基主义对于自己的纲领和构想的失败是怎样反应的呢？两面派手法是“第四国际”的固有特征。一方面，托派领袖首先针对那些不大了解托派观点的具体细节的人，毫无根据地说战后的发展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另一方面，“第四国际”的首领在对他们的同伙谈话时，则不得不承认托洛茨基的“预言”的失败。现代托派的一个领袖约瑟夫·

^① 参看《共产国际。简明历史纲要》，第 546 页。

汉森说，“任何人也不要要求，托洛茨基的每一个继承人都‘完全赞同’托洛茨基所写的每一句话。托洛茨基本人对自己所写的一切东西就不是‘完全赞同’的”。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里，确实有很多互相矛盾的“理论”原理，这种现象常常弄得他的信徒莫名其妙，也使人们很难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批判。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马克思针对一个小资产阶级理论家讲的一段话：“……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①

有时现代托派分子在谈到对待他们的思想“遗产”的态度时，往往表现得十分坦率。美国“斯巴达克同盟”前领导人之一怀特，在一次谈话中，流露出严重的悲观主义情绪，他说：“在过去的任何时候，在每一次巨大的历史危机形势中，我们从来都没有能够影响事态的真正发展……。斗争的进程往往与我们对它的先入为主的想法相距很远，我们总是不能使我们的思想或我们的历史适应斗争的进程。……这就是我对其正确性日益深信不疑的结论”。^②

“第四国际”成立会议的前主席麦·沙赫特曼有一段话也是引人注意的。战后不久，即1945年9月，他承认：“理论的死亡——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国际中所看到的……。理论由于缺乏有营养的土壤而在死去。它正在周围事件所造成的真空中死去，这些事件把它憋得奄奄一息。它由于没有支持自己的任何出色手段而正在死去”。他进一步说道：“第四国际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1页。

② 转引自A·K·赫尔曼：《托洛茨基主义。号召到基层去》，第239页。

领袖托洛茨基为第四国际所作的基本分析，在关于俄国的阶级实质问题上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根据这种分析作出的预言同样是错误的和站不住脚的。”^①

“第四国际”的现任首领们也有意无意地承认，他们的“鼻祖”的种种预测是没有根据的。例如，巴黎“联合书记处”的一份文件说：“托洛茨基在六十年前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制订的不断革命论，对于确定研究新问题的方向是必须的，但用来理解所有各种现象则是不够的”。拉丁美洲托派头目波萨达斯承认，“在托洛茨基的著述里，没有回答现阶段提出的新问题”。

然而这样的言论毕竟是少见的。“第四国际”通常总是拒绝承认，宗派主义和脱离群众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站不住脚，由于缺乏正确的纲领造成的。托派分子在极力修补陈腐破烂的“不断革命论”上的漏洞。为了掩盖思想的真面目，为了给人造成托洛茨基主义似乎有某种观点体系的印象，他们需要这个“理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象念经一样反复地说，“我们的运动，在任何地方，都是以托洛茨基的学说为依据”。托派竭尽全力地企图掩盖他们的“理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

组织上的“异化”

战后，托派组织特别关心怎样增加——那怕是少量增

^① 《美国的左派。二十世纪的激进政治思想》，第328页。

加——拥护者的人数，怎样摆脱虚弱不堪、奄奄一息的小宗派的状况。他们把赌注押在“打进去”策略上。

托派的“打进去”策略的实质是什么呢？

这个词来自法文“*entrer*”（走进、进入）。“打进去”，就是渗入某些政党和群众组织，而在表面上装作同意和忠实于它们的目的和任务。这种策略规定，要由内部瓦解组织，从中物色可能被诱骗接受托派立场的人^①。

“打进去”的实验在战后曾广泛展开。“第四国际”的极端孤立状态迫使它求助于这种策略。托派宣称：“必须开诚布公地承认，第四国际正在经受严重的国际危机，这种危机已经持续了好多年，目前也没有找到轻而易举的或立即见效的解决办法”^②。迫使托派又想起他们战前曾怀疑过的策略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力图改善自己的地位。这里还有因他们的战

^① 托派早在三十年代，就企图实行其“打进去”的政策。伊·多伊彻指出，当时托洛茨基“坚持主张他的追随者加入各国社会党，以便从那里招募新国际的信徒”〔伊·多伊彻：《对历史的嘲弄。当代共产主义论文集》（《*The Irony of History.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ommunism*》），1966年伦敦版第175—176页〕。

1934年，“第四国际”的前身“国际左派反对派”也曾经提出过这个策略。起初他们选择法国作为实现这种策略的主要基地。那里的托派分子加入了法国社会党。

美国托派首领坎农在指示自己的爪牙在工会中应如何行动时说：“要努力成为最优秀的工会会员，担负起最多的社会工作，要表现得非常殷勤、十分积极，以便在那里获得影响力”。其他托派组织也实行类似的政策。整个说来，“打进去”策略在战前并未广泛推行，按照弗朗克的说法，只是以“个别出击”的形式实行过。很多托派分子反对这种“自我异化”，认为这种策略有使“第四国际”各“支部”丧失本身的政治面目的危险。

^②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1年第3期第98页。

时政策遭到彻底失败而产生的其他原因。

同法西斯主义的勾结，使“托洛茨基主义”这个概念在广大群众眼里具有否定的意义。托洛茨基的信徒不得不顾及到，他们的“学说”现在更加惹人生厌的问题。于是，力图以另一种面目在群众面前出现，便成为托派广泛实行“打进去”策略的原因之一。为了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这些“打进分子”不仅不承认自己忠于托洛茨基主义，而且还……谴责它，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走得有多远。这样，托洛茨基主义便以“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包装出现在人们面前。这种“为了自我肯定而自我否定”的例子，历史上大概是很少见的。托派自称：“第四国际各支部的人数实在太少了，以致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打出自己的旗帜来影响群众”。他们解释说：我们“除了采取‘打进去’政策，即作为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参加群众运动的国际生活之外，再没有其他出路”^①。

以响亮的名称——“革命共产党”进行活动的英国托派组织，为实行“打进去”策略开创了先例。战后他们立即实行“个人打进”策略，密派自己的人加入工党，以传播（特别是在青年中）托派观点，秘密招募“第四国际”的支持者。但是“革命共产党”内由杰里·希利领导的部分，却坚决主张由个人打进转向“全体打进”，即在形式上自行解散组织，让自己的党员加入工党。

1947年，“第四国际”的领导讨论了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争论之后，希利的立场得到支持。决议中说：“我们在英国

^①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3年第4期第129、69页；《在社会主义旗帜下》（«Sous le Drapeau du Socialisme»），1967年第37期第21页。

的运动,当前正处于危险的停滞状态,如果它在工党内部作为某种政治倾向开始进行有长远考虑的、经过周密准备的、系统的工作,就能够复苏和大大地巩固起来”。^①

根据这个建议,“革命共产党”在1947年宣布自行解散,它的党员加入工党。为了协调这些党员的活动,成立了一个严格保密的工作机构。

在法国,托派分子也受了“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的一定影响。竭力对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实行“打进去”策略。“社会主义左翼联盟”在战后立即成为它集中注意的对象(这个联盟后来在1960年是统一社会党的“创建者”之一)。“社会主义左翼联盟”的成员都有反共的偏见,也喜欢左倾空谈,这一切都有助于托派实行其“打进去”的阴谋。

1947年,法国托派在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和工会系统的“全国教育联合会”中间,开展了积极的“打进去”活动。为了在法国工会中进行破坏工作,成立了一个自称“解放学派”的组织作为伪装^②。

1950—1951年,国际托派中间开始就“打进去”策略究竟起多大作用展开辩论。有人怀疑它会不会导致托派的组织解体。对这个策略作了某些修改的“打进去”派在辩论中占了上风。

1951年,“第四国际书记处”全体会议要求自己的“支

① 《国际书记处内部通报》(«Internal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1947年第16期。

② 莱奥·斐盖尔:《托洛茨基主义即反列宁主义》,第199页;《共产主义手册》,1968年第10期第80页。

部”，把“打进去”作为受国际托洛茨基主义事业的现状左右的“暂时性策略”加以实行。全会建议采取“配合政策：即一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群众组织中展开活动，另一部分则退出这伪装的游戏，组成组织的独立核心”。前一部分人的任务，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招募那怕是不多的新成员”。“书记处”号召不要怕“力量的溶解”和“分散”。“如果托洛茨基主义者十分积极活跃，那么采取秘密工作方法、实行打进去活动的革命者组织就可以百分之百地确信，它将找到必要的‘并行不悖的工作方式’，不会给基本路线带来损害”^①。

“第四国际”的前书记米·帕布洛发表过一本小册子《我们向何处去？》，被评价为五十年代初的托派宣言。为了打进劳动者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会，他要求托派“既要诡谲又能忍让随和”^②。

“打进去”策略得到了1951年秋召开的“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赞许。大会指示对共产党也要实行这种策略。

托派的“打进分子”一经钻进共产党，便立即遭到坚决回击。英国共产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在总结同他们进行斗争的经验时写道：“在共产党内进行秘密工作，无疑是困难的事情。托派分子不开口就不能进行这种工作，而一开口，托派的语汇便自己暴露了自己……。我们的党章保障提出有争议的问题和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但是我们党的队伍对于那些不同意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章程、我们的现行

^① 《第四国际》，1952年2—4月号第49页；《第四国际书记处新闻公报》，1960年12月号第9—10页。

^② 让-雅克·玛丽：《托洛茨基主义》，第81页。

政策的人是关着大门的”^①。

虽然“打进去”政策没有给第四国际带来如愿以偿的结果，没能使它成为“群众性”组织，但“实验”还是被认为有成绩的。绝大多数托派组织都把“打进去”策略作为自己的武器，而且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又补充了新的狡猾手法。

托派在战后初期曾为自己的报纸、杂志和其它宣传材料几乎没有什么销路而烦恼。这促使他们采取了在意识形态上随机应变的策略。于是出现了一些故意装作不同意托洛茨基及其观点的杂志和报纸。

战争刚一结束，英国就出现了一份与托派的《社会主义呼声》没有多大差别的《社会主义展望》杂志。它所持的立场是托派的，但不直接引用他们的说法。不仅如此，在这份主要在工党党员中散发的杂志上，还可以看到对于指责该杂志有托派思想的说法表示“愤慨”的文章。只是到了后来，托派才承认了这份杂志是他们出版的。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贝蒂·里德在谈论《社会主义展望》时写到：“这份杂志的使命是实现统治阶级提出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把反苏反共的而且主要是旨在分裂左派力量的貌似‘左倾’的政策塞进工党”^②。值得注意的是，该杂志在工党领导对其他“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以后，还出

① 《今日马克思主义》，1964年第9期第278页。

② 引人注目的是英国托派的现任领导人也完全赞同在战后出版这一类刊物。托派报纸《新闻战线》在1977年2月写道：“《社会主义展望》在工联主义运动和工党运动的队伍中获得了很大的支持，因为它为实现社会主义政策而斗争”（1977年2月21日）。

版了很长时间。

托派当时不仅仅发行杂志。“作为实验”，他们还印发各种匿名的宣传材料和公报。这些印刷品引用了各种反共的材料，托派指望它们会得到一部分工会会员、首先是青年的欢迎。^①

在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也出版过这类以托洛茨基主义为内容，而在形式上是“非托洛茨基主义”甚至“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杂志、报纸和其他材料。

“第四国际”认为这种“实验”也是成功的。各种匿名材料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曾广泛发行。

此外，托派还开始把自己在某些地方拼凑起来的一些小组装扮成“独立的”组织。例如，战后不久他们在法国建立的“革命青年运动”组织，就不是正式作为托派组织出现的。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所谓“革命大学生联络中心”和一个“造反报”小组，它们都伪装成不属于托派，后来以这两个集团为基础成立了“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组织”，1969年又改组为“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争取重建第四国际）”^②。

五十年代在英国出现过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它的文件鼓吹托派观点，但从不引用托洛茨基的话和“第四国际”的主张，直到1960年5月，这个“同盟”的领导人才宣布他们属于托派。

所有这些“实验”都继续在托派分子中引起争论。一些托派分子对于那些“认为在今后一段时期，甚至应当回避提及列

^① 《评论》，1964年5月16日增刊。

^② 莱奥·斐盖尔：《托洛茨基主义即反列宁主义》，第198页。

夫·托洛茨基的名字和事业的人”表示愤慨，并且指责他们这是一种“小集团思想”。而持另一种立场的托派分子回敬他们说：“那些在保持纲领的纯洁性的口号下，拒绝沿着使我们有可能教育和领导广大群众开辟的道路前进的人，是想把我们的党变成一个小宗派”^①。

但是任何一个托派分子都没有否定“打进去”策略。争论的仅仅是它的“份量”，为的是“不要走得太远”，不要损害“托洛茨基主义的独立发展”。

在这段时间里，“第四国际”也在努力采取措施，使自己的信徒在反社会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思想统一。

无处可寻的“统一思想”

战后“第四国际”的许多支部，与其说象一些哪怕是在遥远的未来可以指望变成政党的组织，还不如说——据弗朗克承认——象一些不大的宣传小组^②。1946年春，由美国的“国际书记处”与欧洲的“第四国际书记处”联合召开的“国际代表会议”谈到了托派的组织巩固问题^③。出席会议的一小伙托派，据说是由“第四国际”的二十个“支部”派出的。会议选出了“执行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并号召为召开“国际代表大

① 贝蒂·里德：《英国的极左派》，第18—19页。

② 皮·弗朗克：《第四国际》，第50页。

③ 战时“第四国际”有两个中心——一个在美国，是战争前夕迁到那里的巴黎“书记处”；另一个是战时在法国召开的欧洲“支部”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的。

会”进行准备，大会要制订出“把宣传小组变成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政党”的纲领。新选出的“第四国际”领导机关的意图是要在“忠于托洛茨基思想”的口号下，把战后的托派联合起来。

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着造成尖锐矛盾的根源。没有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公式，被宣布为“不朽”的。而且，战后初期，“第四国际”的首领们还极力禁止在托派队伍中，对于“不断革命论”暴露出的缺陷，对于托洛茨基的种种没有兑现的预测进行任何议论。他们担心，“异端的”批评最终会动摇国际托派的思想基础。况且他们自己也不能对托派阵营中所发生的问题，作出多少令人满意的回答，以使“不断革命论”的各种论点不致受到怀疑。更简单得多的办法，是把这些问题说成“虚无主义”的，给提出问题的人贴上“背弃信念者”的标签。

1948年4—5月，在“为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而斗争”的背景下，召开了“第四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十九个国家的托洛茨基分子。皮·弗朗克在评述这次会议时写道：“回顾过去可以看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战时和战争刚结束后出现各种离心倾向时，肯定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立场。”^①代表大会重复了托洛茨基对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诽谤，以及关于它们“丧失阶级立场”之类的捏造。

代表大会通过了“第四国际”章程。在章程前言中再次否定了第一国际（“没有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便退出历史舞台”）、

^① 皮·弗朗克：《第四国际》，第51页。

第二国际（“不是国际，而是各国党的一个简单的联合会”）和共产国际（“愈来愈变成保护苏联的苏维埃官僚利益的简单工具”）。此外，还大言不惭地宣布：“第四国际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①。第二次代表大会向托派分子发出了建立“群众性政党”的号召。

“第四国际”的“思想家”想通过重申“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些起码知识”和郑重地号召把托派队伍团结起来的愿望，当然地落了空。代表大会刚一结束，许多托派分子就提出要修改“不断革命论”的某些原理。他们解释说，提出对托洛茨基“学说”进行修正，是为了加强托洛茨基主义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阵地。另一些托派分子则把这类说法看成是“叛逆的”、“修正主义的”，他们坚持托洛茨基主义原理的“不可动摇性”，因为这样似乎才能巩固“第四国际”的阵地。

这些争论是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发动“冷战”，准备新的世界大战，试图转而向民主力量、首先是向共产党发动进攻的条件下进行的。无论是“正统派”，还是“修正主义者”都采取了与反动势力打成一片的立场。

共产党认为，进一步团结民主力量，回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欲望是自己的主要任务，尽力帮助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巩固世界社会主义阵地，是自己的义务。即使是在“冷战”阴云密布的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依然为和平进行斗争，从未对实现自己所面临的任务丧失过信心。其根据是爱好和平的力量已大为巩固，可以挫败侵略者的计划。共产党人从共同反帝和

^① 引自《第四国际》，1964年，第23期第54—55页。

民主的立场出发,努力团结一切可能反抗垄断资本的力量。

在“冷战”正酣的时候,“第四国际”却开展了从“彻底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出发,应当怎样评价苏联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的政治本质的讨论。“第四国际”的首领们希望借助这种讨论,把国际托派的力量纠集起来。

这很象托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一年所采取的做法。当时也是以讨论为托词发动了猖狂的反苏运动。如果再考虑到托派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也曾确信,会很快爆发新的世界大战,那末情况就尤其相似了。

最初是1950年12月,“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向各支部分发了《关于国际局势发展前途和关于第四国际的方针的提纲》。这份《提纲》成为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开展的讨论的基础。

1951年秋举行的代表大会(有二十五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托派分子参加)同意了这份《提纲》。

《提纲》对国际形势发展前途的估量是非常简单的。托派声称,第三次世界大战眼看就要爆发,而且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共产党人进行的争取和平的斗争,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政策”;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战努力则被说成是“保守主义的表现”。

在描绘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阴暗前途时,托派道出了自己的好与恶。就象“第四国际”在1938—1939年不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反对苏联一样,现在它的继承者不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再次反对苏联,反对人民民主国家。虽然《提纲》也承认,苏联由于在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和具

有生命力，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胜利，可是它还是硬说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固然，这次对苏联的评价是：“处在社会主义准备阶段的工人国家”。但是接着便又提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一贯说法：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遥远的未来——当革命在全世界，或至少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进行。

第三次代表大会重弹起托洛茨基关于苏联是“官僚化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诽谤性老调。再次发出了进行“政治革命”，即推翻苏维埃制度的号召。

托派还以同样的观点评论人民民主国家。他们确认了“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49年4月所作的评价：这些国家是“官僚化变态的工人国家”。按照托派的说法，这些国家发生变态是由于信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结果，同时也是苏联影响的结果。

代表大会声称，社会主义已经具备取得世界性胜利的一切条件，但是由于缺乏革命的领导而阻碍了胜利的实现。他们指责各国共产党人不愿实行革命的改造，指责他们搞“改良主义”，奉行只对苏联有利的政策。

这些就是“第四国际”的领导者赖以团结国际托派的政治纲领。然而有许多托派组织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看成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它们在许多方面发表了“独特的意见”。这些托派组织声称，苏联已经变成“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托尼·克利夫领导的英国托派集团便坚持这种观点。托·克利夫受麦·沙赫特曼思想的影响，发表过许多论述苏联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书籍和小册子。他对各人民民主国家

也有类似的评价。在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年代，他说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工人阶级在这种战争中没有什么事情可做^①。

发表类似观点的还有西班牙的托派。他们出版了一本狂妄地称为《为第二个共产党宣言而奋斗》的小册子。他们指责“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出卖理论遗产”，又说他们“拘泥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正统思想”。西班牙托派也从事诽谤苏联的勾当。例如，他们声称，俄国经济同它的美国对手一样，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

由于上述的种种争论，两个主要的托派组织——法国的“国际主义共产党”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都发生了分裂。“第四国际”内部的意见分歧也更加加强了。从中又分出了两个集团：即所谓伦敦“国际委员会”和“第四国际”拉丁美洲执行局。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1954年）和第五次代表大会（1957年）上，巴黎“第四国际书记处”号召这些托派组织寻求联合的道路，结果毫无成效。“国际”内部的离心倾向日见加强。

^① 《不断革命》(«Permanente Revolution»), 1972年第3期第9页;《新闻通讯》, 1969年1月14日。

第五章

托洛茨基主义为什么在 六十至七十年代又活跃起来？

六十年代后半期，托洛茨基主义又开始有所活跃。“第四国际”的各个集团开始更频繁地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托派组织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破坏活动也都加强了。它们大量出版宣传品。有些地方在竞选期间还提出了托派候选人。

当然，不应夸大这种事态的意义。托洛茨基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它却使革命运动遭到损失。

托派破坏活动的复苏与国际舞台思想斗争的尖锐化，与垄断资产阶级不择手段地破坏社会主义的确立和阻止马列主义进一步传播的活动，无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出现这种现象的社会政治原因

占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清楚地看到，如果它能把自己的思想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结合起来，就能够把各阶层广大居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正是利用这种“相互充实”、“相互营养”的办法来加固资产阶级社会

周围的思想防护带。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压迫的变本加厉，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奴役的过程也在不断加快。各国共产党得出的结论是：“反对垄断、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行动过程，正在为各种民主潮流联合成一个政治联盟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这个政治联盟能够坚决地限制垄断组织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结束大资本的政权，以及实行根本的政治经济改革，这些改革为继续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提供最有利的条件。这个民主联盟的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①。

反抗垄断组织对于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所谓中间阶层实行专横控制的活动正在加强。正如1969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指出的那样：“中间阶层的广大群众，尽管他们的队伍还缺乏团结，并且极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但是正在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加入争取实现一般民主要求的斗争。在他们当中，对于同工人阶级实行联合行动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正在加深”。

共产党人知道，加入斗争的非无产阶级各阶层常常带有不少的偏见和成见。一些人对恢复他们已失去的社会地位还抱有希望，幻想在资本主义发生“变化”和“变得善良些”之后好时光就会到来。他们往往倾向于社会改良主义。另一些人则指望出现一个有能力“整顿秩序”、收拾“赤色分子”的“严厉政权”和“强有力人物”，因为“赤色分子”是“万恶”之源。这些人是复活法西斯主义的后备军。此外，第三种人则接受冒险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1969年6月5—17日于莫斯科》，1969年莫斯科版第307—308、310页。

主义思想,是产生各种“左”的极端主义的根源。

列宁在论述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新兵”的思想状况时写道:“如果不是根据某种虚幻的 ideals 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运动,而是把运动看成是一些普通人的实际运动,那就会很清楚,在一批一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群一群新的劳动群众被卷入运动的同时,也必然会发生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复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①。

在这种形势下托派便大显身手,在政治上见风转舵,无原则地“迎合”那些作为他们施展阴谋的对象的各社会阶层的情绪,在接受极左情绪的人们中间进行活动时,他们就以“最坚决的激进派”面目出现。在感染了改良主义幻想的人们中间活动时,托派就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改良派”。而在动摇不定的人们面前,他们又装成一些追求“中庸之道”的“中派”。

托派分子企图首先从非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阶层的反共偏见中捞取好处。“第四国际”派出的密使极力使他们相信,似乎可以既做一个革命者,同时又实行反共。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托派,甚至同常常用些假革命空话掩饰其反动计划的新法西斯分子有共同的语言。

从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托派特别加紧在学生运动中进行破坏活动。当时垄断资产阶级受到西方各国风靡一时的学生运动的出其不意的冲击。那时它却深信这方面不会有什么危险。在需要破坏工人罢工的时候,甚至有时可以从大学生中招募一些工贼。在战后的最初十年中,大部分学生是不问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7页。

政治的或反动的，只有一少部分人站在工人运动一边。

垄断资产阶级对现在的大学生的政治积极性越来越具有反帝趋势感到害怕是不无缘故的，因为他们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以英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大学生人数还不超过七万，在1962—1963年发展到二十一万六千人，三年后进而达到三十万人。

大学生的人数因科学技术革命的需要而激增。科技革命同时也急剧地改变了高等学校的状况，使它们从“象牙之塔”几乎成了培养专门人才的工业公司^①。

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决不是享受富裕生活的保证。只有很少一部分大学生可以指望进入享有特权的上流社会。更常见的是大学生象许许多多物质生产领域的普通工作者一样成为受剥削的雇佣人员。弄不好，等待他们的是用非所学的劳动甚至失业。

青年的失业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因此，1977年6月27日“共同市场”成员国在卢森堡专门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青年就业问题。在会议开幕前的一个星期，法国的工会联合组织——法国总工会公布了以下的数字：1976年底西欧各国的青年中有二百万失业者；1976年和1970年相比，二十五岁的失业者人数增长了一倍多。谁是青年人，谁就是解雇的第一候补人^②。

^① 《商业周刊》杂志(1971年9月号第28页)写道：高等教育制度“就象底特律的传送带‘吐’出汽车一样迅速有效地‘吐’出大量高校文凭持有者”。(参看《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1974年第4期第65页。)

^② 《人道报》，1977年7月21日。

大学生们要求打破数十年前形成的、已经过时的高等教育制度。他们对学校与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关系表示抗议，反对歧视教育制度和种族限制。贫苦家庭出身的人（他们在大学生中的人数越来越多）为了能完成学业要求改善物质生活保证。

大学中的风潮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因为现在的青年一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陷入深刻危机，固有的生活公式和价值观念崩溃解体的环境中开始走进生活的。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上破产的征兆，指的正是大规模的学生运动^①。

关于共产党人对待青年运动的总的态度，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1969年）已经作了说明：“共产党人高度评价青年运动的兴起并积极投入这个运动。他们在青年中间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说明可能影响青年的各种假革命思想的危害，努力帮助青年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青年的利益的斗争中寻找正确的道路。只有和工人运动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密切联系，青年才会有真正的革命前途”^②。

但是，很大一部分有激进情绪的青年表现出对工人阶级及其战斗先锋队——共产党抱有一定的成见。这是资产阶级的长期宣传说教以及整个教育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刻板训练的结果。此外还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与才能，看不起工人阶级和他们进行的反帝斗争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在评价这部分青年的政治情绪和行动时说：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6卷第61—66页。

^②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1969年6月5—17日于莫斯科》，第309页。

“……在青年们的行动中常常还出现政治经验不足和与革命斗争的先锋队联系不够的现象。因此，青年的行动往往具有自发性和表现为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形式。实质上敌视共产主义的极端主义分子，有时还有真正的帝国主义走狗都企图利用这一点”^①。

这些人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蓄意分裂青年运动。其中既有公开的法西斯极右分子，也有各种各样的假革命——托派分子、毛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等等。

托派分子和其他“左”倾极端分子一样，还极力争取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早在1903年，列宁在指出可能产生小资产阶级极端主义的根源时写道，知识分子，“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是愈来愈困难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以小生产者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的”。他指出，“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必不可免地要得到广泛传播和不断以各种形式复活”^②。

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研究和实现科学成果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给他们在社会中规定的地位之间的矛盾正在尖锐化。知识分子敏锐地感到在意识形态和精神上出现的真空状态，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空虚表示反感。

有偏激情绪的知识分子甚至在反对垄断资本时也不是总能意识到，知识分子只有和无产阶级一起并且在无产阶级的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1969年6月5—17日于莫斯科》，第59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第394页。

领导下才有可能争取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往往是由于他们脱离被剥削的群众，由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包括其中的极“左”思想。列宁强调指出：“没有群众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过而且永远不会有议会斗争手段和议会外的重要斗争手段”^①。而且这一类知识分子所固有的极端个人主义还使他们不喜欢组织起来，不喜欢纪律；而没有组织和纪律，革命斗争是无法取胜的。

在法国、英国、日本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托派和有左倾情绪的知识分子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尽管这些人并不总是愿意和托派发生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他们接受托派的个别思想，并且不断地重复托派的反共谰言。

托派分子还挑逗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农民阶级。早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他们就试图利用农民运动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某些弱点。甚至还酝酿过建立托派的“农民联盟”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遭到了失败。拉丁美洲国家的托派尚未放弃把具有激进情绪的军官拉到自己方面来的企图。他们一贯对爱好搞各种冒险的阶层感兴趣。例如，托派总是竭力在赤贫化的居民和社会地位下降的分子中间寻找拥护者。由于在科学技术革命的过程中取消了许多职业和工种，这一类人的队伍正在扩大。在许多西方国家中，例如在意大利，托派和其他“左”倾分子一起加紧在失业者中间进行破坏活动，力图把他们拉到自己的组织里来。

现代的托洛茨基分子开始对外籍工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15页，

兴趣。众所周知,这些工人的处境是尤其困难的。

据国际劳工局估计,七十年代初西欧的外籍劳工及其家属(包括非法侨居者)已达一千一百万人,每年外来移民的人数在六万至一百万之间^①。他们常常被称为“新奴隶”,被用于低报酬工作。在法国,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工资收入大大低于总工会要求的最低生活水平,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比利时甚至出现了真正的犹太区^②。

托派自称是外籍工人“利益的代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做什么》报的“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小组”特别活跃。它要外籍工人相信,他们在政治斗争中起着“重要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主导的作用”。

托洛茨基主义是寄生在错误的观点和错误的认识之上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和认识在反帝运动的社会基础扩大的情况下,必然会活跃起来。如果用图形来表示,这一过程呈以下角锥形:

寄生
在“新
兵”的错误上。
“新兵”身上的错误。
吸收更多的“新兵”
以扩大反帝斗争的社会基础。

^① 《移民工人》,国际劳工局(«Migrant Worker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1973年日内瓦版第8页。

^② 《做什么》(«Was tun»),1973年5月号(增刊)。

毫无疑问，这个角锥形的基础还将继续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映“新兵”身上的大量错误的第二级一定要与基础成正比地扩大。克服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人的积极思想工作，取决于他们在群众中的宣传解释工作。

角锥形的尖端则必然会逐渐缩小。促成这一点的因素如下：共产党人积极揭露托洛茨基主义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寄生作用和反动作用；受蒙蔽的“新兵”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认清托洛茨基主义反对革命的实质；托洛茨基主义在思想和实践上存在的深刻内部矛盾定将不断削弱和动摇它的阵地。

此外也必须估计到其中还夹杂着这样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相当影响的各种势力希望看到“新兵”的错误不断扩大，希望寄生在这些错误上的各种组织得以保存下来并加强其影响能力。

还有一些使托洛茨基主义活跃起来的因素也是值得注意的。

促使托洛茨基主义活跃起来的 思想原因和其他原因

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给予假马克思主义和假共产主义流派的支持在日益扩大。支持的目的是要把那些对科学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越来越感兴趣的非无产阶级各阶层引入歧途。有许许多多的小组织和小团体打着假革命的幌子，瓦解和分裂那些对抗或可能对抗垄断组织的势力，这对

帝国主义来说是有利的^①。难怪美国众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在1968年,根据专家小组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建议,要求美国各有关机构在同各国共产党作斗争时利用左倾分子和极左分子^②。

说资产阶级成立了“左”倾组织——这种解释恐怕是过于简单化了,没有考虑到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但是大资产阶级的赏识确实帮助它们在政治生活中得以维持下来^③。

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迫不及待地利用“左”倾分子的行为来败坏共产党的声誉。为此目的,他们在宣传中散布一种存在“两个极端主义”的说法。共产党人也被列为“左”的极端主义,法西斯分子则是右的极端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两个极端主义在政治上负同样责任。”这种宣传策略有时也能达

①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写道:大资产阶级“在帮助成立越来越多的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分裂主义组织,并慷慨地资助它们,以便破坏我国唯一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德国的共产党,破坏进步的左派力量的团结”。不仅如此,“左”倾分子还常常在此基础上与极右势力建立联系。西德新纳粹报纸《造反者》1973年发表过一份关于新纳粹派和毛派组织青年代表会晤的公报,其中说道:“毛派和民族革命派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的斗争方面是一致的”。(《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3年第11期第60页。)

② 参看《当代的共产主义。政策与思想体系》,1973年莫斯科版第14页。

③ 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大量地、往往是不加谴责地报道有关“左”倾分子搞突然袭击,搞示威游行的消息;可是对共产党组织的行动,即使有数以千计的人参加,报纸上也只字不提。这一切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左”倾分子被请到群众性宣传机构去充当对共产党的思想作斗争的“专家”。例如,瑞典就有两个电视节目,经常有二十五至三十名“左”倾分子为之撰稿(参看《新法兰西》周刊,1972年12月9日)。在法国,参加法国总工会的警察工会曾要求向公众揭露纵容“左”倾分子,并且以流氓闹事为借口“清洗国家机关中的激进分子”的警察当局某些上层领导人。洪都拉斯共产党机关报写道:“在我国各种极端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托派甚至马尔库塞分子——的队伍中,到处充斥着北美的奸细”。

到目的。例如，1972年在接受社会调查的法国人当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说他们看不出共产党人与“左”倾分子之间有什么区别^①，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施普林格系统的报刊起劲地散布“他们都是一路货色”的论点，并且要求“让共产党分子遵守秩序”。

众所周知，1973年智利发生法西斯政变的原因之一，按照皮诺切特的说法，是“必须和‘左’倾极端分子斗争”。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反动势力以“左”倾分子的活动为口实阻挠国内生活民主化的进程。

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广泛刊登过去或现在从假革命的立场出发反对共产党的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流派的观点^②。巴枯宁、涅恰耶夫以及其他新老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正在出版。一些国家的政权机关不仅容忍毛派组织散发大量的宣传品，而且鼓励在其国内出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著作。

资产阶级特别热中于宣传托洛茨基主义。和有北京领导人撑腰的毛派不同，托派不指靠什么外来势力。资产阶级的宣传家大肆宣扬托洛茨基主义“精神”，是希望非无产者阶层中、尤其是青年中有人会吞下这个思想诱饵。

资产阶级出版机关自从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以来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热衷于出版托洛茨基的书籍和文章。西方出现了一种所谓“托洛茨基研究”。特别受欢迎的是托洛茨基在1929—1940年间所写的东西，当时他极力诬蔑苏联、诬蔑各国

^① 《法兰西公众舆论杂志（民意测验）》（«Sondage, Revue française de l'opinion publique»），1972年第3期第74页。

^② “左”倾分子有相当多的机会利用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例如，法国一些左派组织的头目可以整小时地在电视节目里述说他们的观点。

共产党。凡是在那十年里出自托洛茨基手笔的每一行字都受到重视。

1973年9月21日，美国出版商诺亚尼·艾伦在回答托派报纸《战斗者》关于公布托洛茨基这些材料的目的地问题时宣称：“我们决定把用各种文字发表的全部材料译成英文。我们甚至还仔细地收集了在任何地方从未发表过的文章和书信，这是在拥有这些材料的某些个人的帮助下以及利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材料（公开部分）收集起来的”^①。

有一个叫路易斯·辛克莱的人做了一项十分细致耐心的工作：他编辑了西方所发表的托洛茨基的书籍、小册子、文章和讲稿的目录索引。他在1972年出版的《列夫·托洛茨基著作目录索引》一书，篇幅竟达一千页（！）之多。书中只列出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托洛茨基的“著作”的标题名称^②。那位诺·艾伦承认，在从1969年至1973年的四年里译成英文的托洛茨基“著作”，比托洛茨基在世时的任何四年都多。该出版商还承认，以其他文字出版的托洛茨基的作品，数量也大致相同^③。

① 这是指1940年3月托洛茨基卖给哈佛大学的档案材料中已经向读者开放的部分。该大学还藏有所谓“不公开部分”，其中保存着近二万件涉及托洛茨基在1929—1940年期间的活动的文件和书信。托洛茨基的遗言说，必须到1980年才可以把这部分材料开放供人阅读。伊·多伊彻得到托洛茨基妻子的个人同意，接触了这些材料，后来他便迫不及待地宣传说那是一批“极其珍贵的历史材料”。资产阶级宣传机构现在已经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行将到来的托洛茨基档案材料开放之日。

② 《列夫·托洛茨基著作目录索引。路易斯·辛克莱编》（《Leon Trotsky. A Bibliography. By Lois Sinclair》），1972年加利福尼亚胡佛研究所出版社版。

③ 《战斗者》，1973年9月21日。

在西方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的描述托洛茨基生平的书籍。为托洛茨基辩护的书籍大量涌现，最早发端于多伊彻。早在五十年代末，他就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出版了三部曲：《全副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被放逐的先知》。这三本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书中托洛茨基以“不屈不挠的革命家”面目出现，托洛茨基主义则被说成“革命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合法分支”。

尽管现代的托派不同意三部曲中的某些评价（例如，伊·多伊彻把“第四国际”说成一个小宗派，就使他们十分恼火），有的人甚至批判“多伊彻主义”，但是对于多伊彻给他们的帮助总是表露出感激之情。“第四国际”巴黎书记处机关报在1967年年底写道：“尽管多伊彻的作品和我们有意见分歧，但是它们常常导致许多青年人接触托洛茨基主义思想，这些人后来都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①

多伊彻把托洛茨基主义说成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即得到资产阶级宣传机器的随声附和。一些学术专著、“严肃的”和低级趣味的杂志以及报纸，全都从这个角度来描述托洛茨基。还出现了描写托洛茨基的电影和戏剧脚本，其主要意图是要引起人们对他个人及其思想的兴趣。

许多资产阶级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搜寻资料用来骗人。当年恩格斯曾写道：“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

^① 《第四国际》，1967年第32期第65页。多伊彻的其他一些书籍也有赞扬托洛茨基的内容。

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①

托洛茨基的现代追随者也同样受到重视。上文提到的那个出版商诺·艾伦宣称，象乔·诺瓦克，厄·曼德尔，詹·坎农“第四国际”“思想家”的作品，在美国也广泛发行^②。一些规模最大的资产阶级出版社的印刷厂都在排印“第四国际”的文稿。

可见，拥有印刷出版机构和掌握到处泛滥书籍广告的人，都在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③。他的思想也很容易地渗入了高等学府，托洛茨基的著作在那里被列入必读书目。资产阶级的大学还为“第四国际”的“思想家”敞开了大门。1976年9月，巴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首领之一厄·曼德尔被请到剑桥大学去开讲座。和巴黎“联合书记处”竞争的英国托派组织在报导这件事时着重提到，曼德尔被大学当局说成是“可靠的马克思主义者”^④。1978年5月曼德尔又接受邀请到美国的几个大学去讲课。

人们有理由认为，垄断资产阶级对托派的帮助，并不仅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73页。西德“历史学家”海因茨·布拉姆有一段话说明了伪造者们对托洛茨基思想的评价如何之高。他在一篇诽谤性作品《托洛茨基为继承列宁遗产而奋斗》(Heinz Brahm, «Trotzkis Kampf um die Nachfolge Lenins», 1964年科隆版)中写道：“我们都用托洛茨基的作品作为出发点，许多史学家在回答他们的研究著作的最初动因是什么的问题时，一定会承认这一点”。〔该书第9页〕。

② 《战斗者》，1973年9月21日。

③ 巴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1969年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高兴地指出：“在过去从未出现过托洛茨基著作的国家中，托洛茨基的著作空前大量地以多种文字一再出版。”(《国际》(«Die Internationale»), 1969年第2和第11期)。而托派并没有为此费吹灰之力！

④ 《新闻战线》，1976年8月1日。

限于给他们的意识形态活动和宣传活动提供经费。例如，据法国报纸《新报》计算，法国托派的总统候选人阿·克里文（1969年）在竞选广告和宣传画、竞选旅行、租赁开会场地方面，至少要花费三十万法郎。根据《快报》周刊的材料，提名阿·克里文为候选人的托派组织“共产主义同盟”在第一轮投票前夕拥有现款八万五千法郎。托派宣称，他们从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人们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款项^①。当时还发生过一件在法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事情，中士克里文（那时他正在服军役）在竞选期间还获得了休假。

其实上述现象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在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托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十分活跃，它的竞选宣传品印数很多。总统候选人林达·詹尼斯在向记者谈话时宣称，这是一次很久以来“规模最大的运动”，该党将为竞选花费五十万美元。对于一个主要由一些并不富裕的青年人组成的小组织来说，这样一笔款项是耐人寻味的。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钱是从哪里来的？由于这个党的经费支出还在不断增加，人们就更加有理由提出这个问题^②。

垄断资产阶级与托派的联盟是在反共的基础上形成的。促使他们联合的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分裂反帝阵线。

社会改良主义也帮了托派的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半无

^① 《共产主义手册》，1969年第5期。为了提名阿·克里文充当候选人至少需有一百名议员、参议员、市议会议员签名。他征集了二百多人签名。托派报纸《新闻通讯》在评论这件事时写道：“显然，他是在资产阶级政客当中征集签名的，因为无论共产党代表或社会党代表，都永远不会签名支持克里文充当候选人”（该报1969年6月7日）。

^② 参看《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1973年莫斯科版第126页。

政府主义的“革命性”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种惩罚。这个道理现在证明也适用于其他各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

西方有时把六十至七十年代称作“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许多国家组织了政府或者参加了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和思想家千方百计地传播右倾改良主义幻想，宣传资产阶级社会正在转变为“超阶级”的社会，说资本主义通过改良可以“进入社会主义”，宣传有可能建立“全民福利国家”等等。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企图通过实行一些小的改良来削弱工人阶级的战斗力，诱使他们脱离反帝运动。

但是，他们的政策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发生了极其尖锐的冲突。列宁指出：“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清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①而资本主义的社会缺陷和社会改良主义“实验”的不断失败，促使群众考虑共产党人提出的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进行深刻变革的必要性。

摆脱了改良主义的精神奴役，不一定就能走上正确的政治道路。其原因在于非无产阶级各阶层中有一部分人本来就不信任工人阶级，想要寻找社会发展中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并且具有反共情绪。

托派和其他“左”倾分子一样，积极地在对社会改良主义感到失望的人们中间进行活动，使他们相信托洛茨基思想是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157页。

唯一可以取代社会改良主义的选择对象。在“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里都可以遇到参加过社会民主党和依附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的成员。托派报纸常常公布这些人说明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原因的信件^①。

许多国家中存在的种种“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常常被托派用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列宁早就指出过，法国的革命运动不断地受到各种“左”倾空谈的拥护者的危害。布朗基主义、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各种各样极左的“社会主义”思潮乃至“苏瓦林派”和“正统派”的托洛茨基主义在这里应有尽有。尽管它们各不相同，但是都在促使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断地保持“左倾”。

“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在拉丁美洲的影响也很大。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鲁及其他一些国家中，无政府主义曾长期地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潮存在。这种情况便为鼓吹“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观点的托派所利用。拉丁美洲的托派特别具有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特点，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托派还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日益增长来进行投机。托派常常用他们的思想冒充彻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卷入政治斗争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对托洛茨基主义不甚了解或有所误解的情况下，托派的这种欺骗就

^① 在七十年代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左”倾思想招致的失败往往会带来右倾机会主义的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失望的“左”倾分子便转入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参看《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2年第6期发表的阿·库尼亚尔的文章）。西德马克思主义者京特·魏斯也指出：“当托派组织的追随者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再相信托派的说教时，他们往往转而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第104页）。

更容易蒙混过去。

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在革命斗争的社会基础急剧扩大的时期，必然会把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口号和要求，而不能坚决抛弃一般资产阶级世界观，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一切传统思想”^①的人包括进来。托洛茨基主义便被这些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接受下来。他们对此还深信不疑，因为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给托洛茨基主义的过去和现在都涂上了“革命的”色彩。

某些社会阶层由于总是觉得革命斗争发展缓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也在发生作用。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这种人看到反资本主义的决战迁延下去，总是陷入失望和无政府主义的境地^②。那些想“鞭策”历史发展的人，往往都醉心于“左”倾。各国共产党要求在反帝的基础上把群众团结起来，要求在实现既定的措施时应有很大的耐心、顽强的精神和坚定的意志；而他们认为这种战略和策略未免“过于谨慎”。这些人不愿考虑大多数劳动群众还没有认识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变革的必要性。“左”倾分子把没有大多数群众就没有革命的思想称之为“不革命”的思想。

许多卷入政治斗争的“新兵”的固有特点是希望“一举”解决全部问题，最能打动他们的是要求“立即解决问题”，“紧急行动起来”的号召。因此他们准备把托派的冒险主义纲领当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接受，反之，对提醒他们不要轻率行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7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3页。

动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却持审慎态度。

托派还经常利用人们不了解情况，利用人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的错误认识进行投机。“第四国际”在继续歪曲事实，把二十年代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粉碎托派的事实归结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个人意见分歧”。

甚至伊·多伊彻在《斯大林》这本公开反苏的亲托派著作中也反对上述的说法，反对无视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场重大的思想斗争。他写道，这种简单化的说法不能回答以下的问题：为什么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当时对俄国的整整一代人来说竟成为一项如此严重的课题，为什么它决定了这个伟大的民族在其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前途”^①。在二十年代，全党一致支持捍卫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的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

“第四国际”还妄图把托洛茨基描绘成反对个人崇拜的斗士，这是十分荒谬的。大家知道，我们党强烈反对那种过份热中于事情的纯行政方面的现象，列宁在评论托洛茨基时就提出过这一点。^②党还驳斥了托洛茨基提出的“社会劳动军事化”政策，反对他在职工会中执行的“拧紧螺丝”的路线和“压榨农民”的方针以及许多其他观点^③。党批评了托洛茨基的波

^① 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第352—353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

^③ 例如，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鼓吹了一阵“劳动军事化”之后预言说，整个经济生活都将渗进“军事化的因素”。他说：“在军事方面有强制士兵执行他们的任务的有关机构。这也应以一定的形式存在于劳动领域……。工人群众……应当和士兵完全一样地接受调遣，接受委派，接受指挥。这是劳动军事化的基础……。”（《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4月）记录》，1960年莫斯科版第93页）。党否定了托洛茨基的这些主张。

拿巴主义独裁作风。托洛茨基不只一次地试图对中央委员会实行讹诈,要求在党内和共产国际内占居特殊地位。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公正地把托洛茨基称为“拎着手杖的老爷”。托洛茨基妄图与党分庭抗礼。无怪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在1925年1月17日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言指出:“党再也不能忍受屈辱了。她不能在自己的队伍内保留一个超人”。

我们从哥尔茨曼1920年在莫斯科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可以看出,托派分子在指靠对群众实行行政命令和压制办法方面走得有多远。他在会上建议对工人群众广泛采取无情的棍棒纪律。他恫吓说:“对于那些不能明白我们的意图的人,我们将不止于采用监禁、流放和苦役的办法”^①。

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的一片有组织的喧嚣声^②,其意图是要败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把托派描绘成反对什么“斯大林主义”的斗士,并以此为幌子吸引受宣传蒙蔽的新受害者参加托派组织。“第四国际”连忙发出号召,要求它的“支部”“利用正在出现的机会”^③。有一个叫托·克利夫的现代托派头子在1968年满意地写道,这

① 参看弗·米·伊万诺夫, A·H·施麦列夫:《列宁主义和在思想政治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第295—296、349、382页。

② 苏共二十大刚刚结束,托派立即掀起了一个要求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的宣传运动。托洛茨基的妻子娜塔莉娅·谢多娃不止一次地发表“公开信”提出这一要求。托派的各种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也都弹起了同样的调子。资产阶级的各种宣传工具也立即响应这场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的闹剧,妄图破坏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威信。

③ 《今日马克思主义》,1964年第9期第279页。

项任务已经完成，“托洛茨基主义者加强了自己的阵地”^①。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主义又活跃起来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托派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他们都要竭力利用经他们挑选的思想受蒙骗的对象不了解情况和在政治上缺乏经验来为其私利服务。

那么，托派到七十年代末又干了些什么呢？它的组织状况如何呢？

① 《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 1968年第2期第45页。

第六章

七十年代下半期的托洛茨基主义：各个“国际”的竞争

正象历史所证实的那样，那些自认为“比共产党人还左”的组织的固有特征，是各自为政和思想混乱不堪。这种状况是一系列社会政治的、思想的和认识论的原因所造成的。

在社会政治方面，这些左倾组织反映了从“极端”的革命性动辄转向政治上投降和失败主义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经常变化不定的情绪。这些组织的政治和策略方针都反映了这一部分人要求与工人阶级“拉开距离”的倾向，这样便使人更加清楚地看出这些组织的无能，看出它们无法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

从思想体系方面来看，不断地从小资产阶级立场滑向资产阶级立场，是这些左倾组织的固有特点。它们似乎在捍卫某些非无产阶级阶层的利益，但是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靠近又使这些阶层的许多代表人物离开了它们。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所有这些组织都以死板的公式化、诡辩、形而上学和无原则的折衷主义为其特征。粗暴的主观主义、膨胀的个人主义和唯意志论，是它们终身的伴侣。

正是以上这些素质，“第四国际”在不停歇地发作其狂热

性，不断地发生分裂，分成不计其数的小组织。与某些托派“思想家”及其资产阶级财东的解说相反，这并不是由于时运不济或命中注定。

托派的“改革家”们提出的许多企图改善现状的办法也都没有奏效。离心的倾向在继续发展，理论、思想、纲领和政治构想方面日益尖锐化的危机更加深了托派队伍的分化现象。

1963年，巴黎“书记处”设法召集各种流派的托派代表开了一个“代表大会”。虽然这个“大会”被宣布为“团结”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托派团体拒绝参加该会。在“大会”上，托派又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

1970年，巴黎“联合书记处”和伦敦“国际委员会”两方的领导人进行过两次会晤。其结果是双方各持己见，相互的指责更变本加厉。

1976—1979年期间，伦敦“国际委员会”、巴黎“书记处”乃至其他托派组织都发出过联合的号召或“起码改善一下相互了解”的号召。而在托派中间，这一切都被当作早已不相信有可能联合而且也不愿意实现联合的人发出的空洞的宣言，或例行空话。正象“第四国际”的刊物屡次指出的那样，在联合的说法背后隐藏着要求无条件地接受一方的纲领，而其他托派团体则须放弃其原有的立场。归根结底就是要压倒竞争者，使之从属于自己。其结果是从原来的托派团体中生出了越来越多的新组织。在国际性托派组织中也发生了分裂。内讧消耗了各级托派领导人大量精力。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想把对方“咬”得更痛些。他们的相互关系使人联想起一些现在早已被

人淡忘的影片中演员们相互以把对方弄得满身油膏或泥污为乐的镜头。

“第四国际是否存在？”——托派分子自己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些人则回答说：“目前不存在第四国际”^①。

这种悲观的结论是有根据的。很难确定地回答，现在到底有多少个托派组织以“第四国际”的名义出现。象“第四国际”这样一个以“全球性”组织自居，而又分裂成那样多永无休止地相互为敌的小宗派的组织，在历史上大概是空前的。

仍都打着“第四国际”的旗号

皮·弗朗克发牢骚说，托派中间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把“第四国际”的历史写出来^②。他的小册子《第四国际。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的贡献》使人懂得了这是一个如何难于完成的任务。托派们只要召开一个什么“代表大会”，立刻就会有人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会上同样会爆发尖锐的分歧，然后作为激烈论战的结果又会出现一个新的组织。因此，弗朗克宁愿谈谈“自己的”“国际”、“自己的”“代表大会”、“自己的”一伙人。

弗朗克只承认和自己同样思考和行动的人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不久前还志同道合的人，只要不接受他的看法，就会被他“革出”托派，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取消派”。

其他国际托派组织则把弗朗克及其“书记处”放在“窃据

① 《斯巴达克主义者》，1971年版第4页。

② 皮·弗朗克：《第四国际》，第7页。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称号而阉割其根本实质”^①者的行列。参加伦敦“国际委员会”的美国托派分子发表了1951年至1973年期间的四卷资料，其总标题为：《托洛茨基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一部文献史》^②。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证明弗朗克及其“书记处”与托洛茨基主义“毫不相干”，他的“国际”则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取消主义的”组织。拉丁美洲的托派也在起劲地“揭露”弗朗克，说他和他的巴黎“联合书记处”一伙人“是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投降分子，与胡·波萨达斯所领导的第四国际的世界运动毫无共同之处”^③。

换句话说，“第四国际”有多少组织，现代托洛茨基主义就有多少部“历史”。

下面我们列举一下自称“第四国际”唯一代表的几个主要组织。

巴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它获得这个称号，是由于它是在1963年的“联合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它周围的各托派组织在这次会上拉到了百分之八十五的选票。当时“联合书

① 伦敦“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头目之一希利的说法。希利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与巴黎“书记处”决裂。

② 克·斯劳特编《托洛茨基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一部文献史》，1974—1976年纽约版。第1卷的标题是《第四国际反对帕布洛主义的斗争》；第2卷《第四国际的分裂》；第3卷《社会主义工人党：向帕布洛主义的倒退》；第4卷《国际委员会反对取消派》。

③ 《工人斗争报(Lucha obrera)》，1972年4月1日版。对于这些托派组织，巴黎“书记处”也发表过声明，“申明”它们与托洛茨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巴黎“书记处”宣称，波萨达斯所联合的一伙托派“不代表第四国际及其政治方针，因此国际书记处对它们的政治路线不负任何责任”（《第四国际》，1962年第17期第68页）。

记处”的领导者是法国的皮·弗朗克和阿·克里文和比利时人欧·热尔曼(即厄·曼德尔)。

巴黎“联合书记处”妄想成为一切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引力中心”，但是在这个集团中却是内讧连绵不断。在“联合代表大会”一年后召开的领导机关会议上，领导“多数派”的皮·弗朗克与代表“少数派”的米·帕布洛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又过了一年，这场纠纷最后以帕布洛及其追随者被逐出“第四国际”集团而告终。

1974年2月终于在瑞典又召开了一个“世界代表大会”，会上审议的每一个问题都有三名报告人发表意见：一个新出现的“多数派”，“少数派”和“第三倾向”^①。巴黎“书记处”的分裂，在这次“大会”后也没有停止。

书记处出版一份名为《第四国际》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由皮·弗朗克负责编辑。

参加这个集团的主要是西欧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托派。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也给予支持，它赞同“联合代表大会”的决议。它在形式上没有参加这个集团，据说是由于美国的法律禁止国内团体参加国际联合机构。

“第四国际国际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参加这个组织的是在1963年“代表大会”上处于少数地位的托派。会后不久他们开始出版一份杂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1964年2月14日“联合书记处”宣称，该杂志的出版未经它的同意，而且出版该杂志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是“联合代表大会”所

^① 《战斗者》，1974年4月12日。

否定的^①。

“少数派”最终在组织上形成一个独立集团，是在1965年11月底召开的一个代表会议上。正如会议公报指出，参加者是“来自各个大洲的四十名代表”。会议对巴黎“书记处”的“顽固倒退”、“宗派主义”和“背离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指责；并且宣称，“说这个领导集团继续充当第四国际的领导，那是投机行为”^②。

这个集团对自己作了这样的评价：“本组织与妄称‘第四国际’的其他流派的区别，在于它坚决不搞宗派主义、机会主义、组织上的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它的本质特征是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研究”。

例如，它的所谓“研究”就包括这样一项：应当力争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而不是简单地“恢复第四国际”。1972年5月23日的一份宣言强调说：“鉴于政治上、形势上乃至重大理论上的原因，我们宁愿不再使用迄今还作为我们国际组织名称的第四国际的提法”。接着，宣言承认目前有若干托派联合组织自称“第四国际”，但是它们“与托洛茨基所开创的运动相距甚远”。“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在指出上述一切之后宣称：“我们今后再也不愿使用这一名称，不愿意继续为狂妄引用‘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的提法在新一代革命者的队伍中造成的混乱承担责任”^③。

但是这种混乱并未减少。在以“第四国际”名义出现的形

① 《第四国际》，1964年第21期第62页。

② 《在社会主义旗帜下》，1965年第23—24期第32页。

③ 同上，1976年12月号，1977年1月号，第34页。

形形色色的集团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代表们宣称，他们“不是原先的那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的组织也“不是原先的那种国际”。他们打算这样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便在非无产阶级阶层内政治上并不成熟、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的一部分人中间募集追随者。

但是，采用这种办法也是无济于事。他们只是在法国、比利时、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在拉丁美洲个别国家和澳大利亚等地建起了一些小宗派组织。

这个集团的为首者是米歇尔·帕布洛(拉普蒂)。在战后年代，直到召开“联合代表大会”，他始终充任“第四国际”的书记。就是这个妄想扮演国际托派领袖角色的人，不仅也成了一个反对派，而且鼓吹过某些类似自我否定的思想。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他和他的“倾向”作过这样的描述：“帕布洛主义存在于某些国家，而且将继续存在，虽说它的称号形形色色，有时甚至打出反帕布洛主义的旗号”^①。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出现于1953年，是从巴黎“书记处”所领导的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当时随即成立了“国际委员会”的英国、法国、瑞士、新西兰支部，“委员会”则设于伦敦。巴黎“书记处”把伦敦“委员会”叫作“修正主义和取消主义的中心”^②。1963年，“委员会”拒绝参加巴黎“书记处”所组织的

^①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73年第2期第35页。托派还指责帕布洛当年在担任“第四国际”领导人期间侵吞过相当数量的款项。例如，波萨达斯就宣布帕布洛“盗用”了六万美元。而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第四国际”从那里弄来这样一笔为如此大量的舞弊提供方便的资金？

^② 《托洛茨基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第1卷第315页。

“联合代表大会”，也没有接受派出观察员的建议。“代表大会”结束后，“委员会”的领导人声称，其他的托派集团不过是“以托洛茨基主义的名称为掩护，而早已放弃了它的纲领”^①。1974年4月由“委员会”召开的“世界”代表大会再次提到了巴黎“书记处”的“修正主义”，并且赞扬1953年采取旨在分裂“书记处”的措施的“英明”。其他托派组织则指责“国际委员会”“在政治上招摇撞骗”，甚至说它是“政治匪团”^②。

皮·弗朗克对伦敦“国际委员会”的评论则是：“实际上它的活动始终不象是一个集中的组织，而象是一个在其拥护者之间只存在极不稳固的联系的派别”^③。英国托派组织的机关刊物《新闻战线》在1976年5月公布了“委员会”所领导的“国际”中包括的“支部”名单。从“名单”上可以看出，“支部”为数不多，只有七个，即英国、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希腊和葡萄牙的托派小组。

“委员会”的主要口号是：“重建第四国际”。它在1966年召开的“国际代表会议”宣称：“代表会议确认列·托洛茨基逝世后国际的领导者们没有能力实现创建革命政党和国际的主要任务”。然后便提出：“国际代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应通过改造第四国际的斗争，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建立起集中的领导”。此外还提出了这样一项任务：“在第四国际的队伍中招收目前还受‘联合书记处’修正主义分子蒙蔽的个

① 《新闻通讯》1965年6月7日。《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1968—1969年第3期第114页。

② 《斯巴达克主义者》，1971年第20期第7页。

③ 皮·弗朗克：《第四国际》，第86页。

别战士和小组”^①。

“国际委员会”出版《第四国际》杂志(与巴黎“书记处”的同名杂志毫无关系)和《国际通讯》(英文版和法文版)。

该“委员会”的领导者是英国的托派分子杰·希利和迈·班达。到1969年为止,它的领导集团当时还包括法国托派分子皮·朗贝尔(真姓为布塞尔)。现在朗贝尔宣称,伦敦“委员会”在建立“新的”“第四国际”的斗争中不够坚决。他同另外一些托派分子成立了一个“争取重建第四国际组织”。

“争取重建第四国际组织”出现于1969年5月,有时也称为“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争取重建第四国际)”。该“组织”指责“国际委员会”搞宗派主义,“只面向英语国家”,因而与它脱离关系。在这个组织中定调子的是1962年脱离弗朗克集团、以皮·朗贝尔为首的法国“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组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英国、墨西哥、西班牙的一些不大的托派集团也参加了这个派别。该“组织”宣称,它在近东和非洲国家还有一些志同道合者^②。

它的行动采取“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1970年召开的代表会议声称:“重建第四国际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再建列·托洛茨基在1938年创立的国际”。代表会议尖锐地批判了弗朗克—热尔曼集团(说“联合书记处是修正主义中心”)^③。

这个托派集团在1973年宣称:“第四国际没有死亡。它应

① 《真理》,1973年第560期第137、138页。

②③ 《工人报导》,1970年第483期。

得到重建”^①。但同时这些“重建者”又承认：“要解决重建第四国际的任务我们还太弱。要实现这项工作，我们的政治基础还不够”。^②

“争取重建第四国际委员会”出版《真理》杂志；该杂志由皮·朗贝尔和斯·朱斯特主持。

拉丁美洲“第四国际书记处”是从巴黎“书记处”领导的集团中分出的。巴黎“书记处”在1962年12月公布的一份公报中指出，拉丁美洲“书记处”所出版的杂志、报纸及其他宣传品“不代表第四国际及其政治方针，因此国际书记处对它们的政治路线不负任何责任”。而在更早一些时候，即1962年9月，拉丁美洲“书记处”则把巴黎“书记处”、它的杂志甚至杂志的订阅者都“革出”了托派：“皮·弗朗克出版的法文杂志《第四国际》已经不是革命的刊物。它的政治立场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订阅这个杂志的人不属于第四国际”^③。

1962年4月，以胡安·波萨达斯为首的拉丁美洲局的拥护者召开了自己的代表会议，该会称为“第四国际特别代表会议”。以西班牙文出版的《第四国际》杂志发表的公报着重指出，建立这个国际之所以成为事实，是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同其他大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扩大联系的结果^④。在这个会议上，弗朗克、热尔曼（曼德尔）、帕布洛、希利被称为“前托洛茨基主义者”。这几个人则起而报复，指责拉丁美洲局搞

①② 《真理》，1973年第561期第64页。

③ 《第四国际》（《Cuarta Internacional》），1962年9月号第13页。

④ 《工人斗争》，1976年2月20日版。波萨达斯的追随者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的《工人之声报》上说，他们的“国际”有十九个“支部”（见该报1972年第27期第17页）。

派别活动，对“第四国际”实行“突然袭击”。

波萨达斯派“第四国际”的刊物报导，该“国际”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乌拉圭以及法国、英国、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都出版了杂志。这个“国际”在1975年8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宣称，它同非洲和亚洲国家的个别人物建立了联系。

这个“国际”由阿根廷的托派分子波萨达斯领导，他热衷于推行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他自己把这个“国际”称为“波萨达斯国际”。例如，在报纸上可以看到波萨达斯的文章（他用他的“创作”塞满了该“国际”的一切杂志和报纸）以这样的话收尾：“托洛茨基—波萨达斯第四国际是历史十分需要的”，而且文末还有他的签名。^①托派们把波萨达斯的名字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字并列。墨西哥托派在1975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一项决议，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来，发展我们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和波萨达斯同志的原理”^②。南斯拉夫的一家杂志在1969年发表的《拉丁美洲的托派和第四国际》一文，对波萨达斯作了这样一个有充分根据的描述：“他把到处充斥的这些话都宣布为历史性的文献”^③。

“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或“斯巴达克同盟”。它是由一

① 《红旗》，1974年11月13日。

② 《工人之声》（《Voz obrera》），1975年第240期。

③ 《国际工人运动》（《Međunarodni radnicki pokret》），1969年第3期第87—99页。

个美国托派组织发起成立的，这个组织于1964年自称为“斯巴达克同盟”，并且在1966年脱离伦敦“国际委员会”。在其后的年代中，该“同盟”提出要争取建立一个“民主集中的国际倾向，以取代那些冒牌的托派代表们在政治上的招摇撞骗和组织上已经土崩瓦解的联盟”^①。它同下列的托派组织建立了联系，并得到它们的支持：“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新西兰斯巴达克同盟”。

1970年11月，这几个组织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宣告“第四国际”是不存在的。它们指责其他国际组织从宗派主义出发妄自尊大地想冒充“唯一的国际”或其“核心”以吞并其余的托派。

1974年7月，该“倾向”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共有八个国家的五十名托派分子参加。根据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斯巴达克同盟”的建议，通过了一项《争取成立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宣言。宣言中说，“倾向”“正在政治上和地理上扩大”。同时也承认，“倾向处在集结的过程中”^②。

“国际社会主义”。这个集团在现代托派中占居特殊的地位。参加者是美国托派麦·沙赫特曼的追随者，他曾号召把苏联当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对待。该集团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有规模不大的小组，它们相互保持联系，并且宣称只有在它们的观点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第四国际”。

分化的过程还在继续。有越来越多的报导说，内讧不仅

① 《斯巴达克主义者》，1971年第20期第7页。

② 《工人先锋》，1974年7月19日。

存在于这些集团之间,而且存在于每个集团的内部^①。

有些托派产生了一笔勾销现存的一切“第四国际”,成立一个新的……“第五国际”的念头。脱离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列宁派”,以及许多其他托派组织都提出过这个建议^②,

托派组织的“地理分布”

“第四国际”的章程写道:“各国支部是第四国际的基本组织单位。每个支部的目标是要变成一个群众性的……政党”。

“国际”的“支部”在哪一个国家也没有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往往是只用一张纸片就可以写下“支部”成员的名单;需要用三位数字的时候很少。这些托派组织通常也总是不固定的:有时它们会变得无影无踪,然后又以其他的名义出现。上文提到的那家南斯拉夫杂志颇有道理地着重指出:“托派运动的派别林立,同时也说明它在世界上广泛分布。这是许多人没有予以重视的一个事实。”^③

在西欧,托派最为活跃的地方是**法国**。那里有十来个相互竞争的托派组织在活动。其中最大的一个是“革命共产主义阵线”(1974年4月以前它自称“共产主义同盟”,这个名称

^① 这里看一看托派刊物怎样谈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竭力设法成立一个“自己的”中心的活动:“汉森实际上已造成了分裂局面,建立了摆脱联合书记处单独行动的组织(在葡萄牙、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尽管该党还在发誓在政治上忠于联合书记处,并在美国反动法令允许的范围内参加它的工作”。(《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1975年第3期第133页。)

^② 《工人先锋》,1973年第15期第11页。

^③ 《国际工人运动》,1969年第3期第87—99页。

更为人所知)。十九岁至二十五岁的成员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该“同盟”中百分之四十的人是大学生，百分之十五是其他学生，百分之十五是教员^①。这个组织支持巴黎“书记处”，是它的“支柱”。

法国的另一个托派团体——“工人斗争”来源于一个叫作“共产主义联盟”的托派组织，这个组织由于在战争年代号召同纳粹分子搞友好亲善活动而名誉扫地。托派刊物批评“工人斗争”派的队伍中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代表人物，而工人极少^②。尽管如此，“工人斗争”派还是妄想被承认为工人运动的一个团体，它断言在一些工厂中拥有支持它的力量^③。

“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还自称“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1953年产生于国际托派的分裂：它是从倾向于“第四国际”前总书记米·帕布洛的“国际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该组织中包括“争取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它打着“争取重建第四国际组织”的旗号，认为巴黎“书记处”是它的凶恶敌人。它也拒绝参加“共产主义同盟”或“工人斗争”所主办的任何活动。这个组织在大学生、中学生和青年职员中间表现得格外活跃。

1971年2月，从“共产主义同盟”中分裂出来为数不多的主要来自巴黎小组的成员，他们成立了一个“革命”小组，指责克里文的追随者搞宗派主义。该小组主张继续和发展同各毛派小组的联系，企图借此加强自己的地位。

1976年12月，“革命”小组同一个自称为“人民—工人左

① 《世界报》，1969年4月13日。

② 《共产主义斗争》，1972年12月15日；《红旗》，1973年4月4日。

③ 参看《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文集中莱·斐盖尔的论文，见该书第77—78页。

派”的毛派小组合并。这个新组织给自己取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劳动者共产主义组织”。实行联合的内幕，是它们都力图加紧反对被托派乃至毛派分子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各国共产党。这里我们指出的只是反映托派和毛派无原则性的众多事例中的一例。这个组织的创办人宣称他们希望“首先发展”同其他毛派集团的关系^①。

此外，还有两个托派组织。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革命同盟”，是帕布洛为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的一个“支部”。另一个叫作“革命共产党”，它倾向于波萨达斯的“国际”。在法国另外还有许多经常改变名称的更小的组织。

在**英国**活动最为积极的托派组织是“工人革命党”。它在1973年改称此名（原称“社会主义工人同盟”），成立于1959年2月。当时，它没有正式自称托派，并且宣称它“目前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但是正在朝着建立这样一个政党的道路发展”。

工人革命党尽管人数很少，却拥有大量资金。这是唯一能够出版一份日报——《新闻战线》（原名《工人新闻报》）的托派组织。而且它还资助出版托派青年报纸《靠左走》。

这里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维持这些报纸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要知道，工人革命党以及依附于它的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由一些穷大学生组成的。

工人革命党是伦敦“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基础，该党的首领希利被认为是“国际委员会”的不公开的独裁者，在有

^① 《工人斗争》，1976年12月11日。

些托派集团中有所谓“希利国际”的说法。

另一个组织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它是巴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一个支部。“第四国际”分裂后(1953年),一部分托派不再追随希利,继续支持巴黎“联合书记处”。这一部分人在1968年开始自称“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工人革命党”的首领之一迈·班达宣称,该小组“是由出身于中产阶层的冒险主义者和一些想出风头的机会主义者组成的”^①。“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集中力量进行争取青年的活动,在他们中间散发青年报纸《红鼯鼠》。

“国际社会主义”小组(1977年年初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②,但其他托派组织仍沿用旧名称呼它)成立于五十年代。与其他托派组织比较起来,它在英国的影响更大一些,特别活跃于某些大学,同时也试图在工人中间传播自己的观点。

由拉美托派分子波萨达斯的追随者组成的“第四国际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和“革命工人党”帕布洛派集团,在英国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活动的几个托派组织,主要是在青年中间开展工作。

“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小组”,是巴黎“联合书记处”的一个支部。追随它的还有一个“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小组是从“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小组”中分裂出来的,成立于1969年,它在1969年还建立了一个“斯巴达克”青年小组(不要把它同马克思主义大学生联盟“斯巴达克”混

① 《第四国际》,1970年第43期第62页。

② 《新闻战线》,1977年3月31日版。

为一谈)。参加托派“斯巴达克”的主要是高年级中学生和生产部门的学徒。1971年，“斯巴达克”又分出了一个自称“斯巴达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小组。

“德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小组是由以法国托派皮·朗贝尔为首的国际组织——“争取重建第四国际组织”的一些拥护者组成的。依附于它的一个青年组织称作“青年近卫军——争取建立革命青年国际”。它成立于1970年4月。同法国的“争取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英国的“青年社会主义者”有接触，并同它们一起酝酿建立“托洛茨基主义青年国际”的计划。

第四个组织是“第四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它的规模极小，支持拉美托派分子波萨达斯。这个小组出版《工人之声》报。

在比利时托派组织中特别活跃的是1971年6月成立的“劳动者革命同盟(第四国际支部)”。它的领导者是现代托派“思想家”之一厄·曼德尔。在该“同盟”成立之前，托派分子在比利时社会党内进行过长期的“打进去”的活动。1960年，曼德尔的拥护者脱离了社会党，自称“青年近卫军—社会主义者”小组。该“同盟”就是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

除“同盟”之外，比利时还有一个托派小组，但它不把自己列为巴黎“书记处”的追随者。参加者约有五百人。另外，还存在一个“革命工人党”，自称为波萨达斯的拥护者^①。它在沙勒罗瓦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在那个地区它的成员是一些外国工人。

^① 参看《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第203页；《第四国际》，1971年第50期第59页。

意大利最大的托派组织是“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它是巴黎“联合书记处”的一个支部。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革命共产党”，它与波萨达斯的书记处保持联系。除了这两个组织之外，还有一个在《红旗》报基础上成立的小组。该报宣称：“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同那些以分裂分子为主的人们毫无共同之处。”^①“红旗”小组的领导人是巴黎“书记处”的首领之一利维奥·马顿。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托派组织都人数不多；它们各自出版杂志和少量的各种宣传材料。

在某些西欧国家还存在一种所谓“同情第四国际的组织”。它们在形式上不算是哪一个国际托派组织的“支部”，但从事托派宣传。例如1971年瑞典成立了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同盟”，它就自称是“同情第四国际的组织”。它追随“联合书记处”，该“书记处”的代表克里文参加了它的“成立会议”。

美国最大的一个托派组织是“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依附于它。原托派分子A·赫尔曼说，该党是由知识分子、大学生、职员以及“不再是工人的工人”的代表人物组成的。他还指出，这两个组织中的青年大学生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连十五岁的少年都招收。这两个组织都支持巴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美国其他的托派组织都是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分出的，它们都取了各种响亮名称。美国还有一个倾向伦敦“国际

^① 《红旗》，1970年第11期第6页。

委员会”的“工人同盟”，一个“斯巴达克同盟”和追随它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以及一个自称“世界工人党”的半托派半毛派组织。

在加拿大的许多托派组织当中，最大的一个叫作“争取社会主义行动同盟—工人社会主义同盟”（由于两个组织合并，它用了这样一个重迭名称）。它是巴黎“联合书记处”的一个支部。另一个托派组织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小组”，由帕布洛的追随者组成。还有一个人数并不多的“革命共产主义倾向”也在加强活动，它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保持着联系^①。

在拉丁美洲，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波萨达斯集团，它们近年来在许多国家积极地进行破坏活动。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墨西哥、秘鲁及若干其他国家都建立有波萨达斯“第四国际”的“支部”。它们在各地使用统一的名称——“革命工人党”。此外还存在一些规模很小的宣传小组，它们分别支持巴黎“联合书记处”（最大的小组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和帕布洛的“马克思主义国际革命倾向”。

在亚洲，托派未能拼凑起象样的组织。巴黎“联合书记处”在1974年曾向其追随者提出过“在亚洲建立强有力的第四国际支部”的任务。伦敦“国际委员会”、“国际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及其他托派集团也都有此打算。

在日本，托派是各种流派拼凑的大杂烩。1960年东京出版的日本历史学家津田所著的《现代托洛茨基主义》一书指

^① 《世界展望》，1973年5月25日；《工人先锋》，1974年7月19日。关于加拿大托派组织的详细情况，可参看加共理论刊物《共产主义观点》1972年第5期第34—45页刊登的杰·范霍顿《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今昔》一文。

出，日本在战前不存在有组织的托派运动。1956年成立了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研究托洛茨基著作的不大的小组。在最大的几个托派组织中，“日本革命共产主义同盟”表现积极，它自称“第四国际日本支部”（“第四国际”指的是巴黎“联合书记处”）。1975年2月，在依附该“同盟”的几个青年托派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新组织——“日本共产主义青年（青年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

在斯里兰卡，托派曾一度打进成立于1935年的平等社会党。但是，战后时期，该党对他们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巴黎“联合书记处”把平等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不大的小组承认为自己的“支部”^①。这个国家里还有一些更小的托派组织。

印度的一个较大的托派组织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971年12月以前的名称是“印度社会主义工人党”）。它追随巴黎“联合书记处”。

新西兰有两个托派组织：一个是“社会主义行动同盟”，自称是巴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支部”；另一个是“斯巴达克同盟”，它同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类似组织保持联系^②。

在澳大利亚，各托派小组最初是在1931—1934年期间就已各自宣布它们的存在。七十年代中期全国共有九个托派组织。其中最大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同盟/社会主义工人联盟”（两个组织合并后称此名）。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一个“争取成立第五国际”小组。

① 《第四国际》，1964年第22期第41、84页。

② 《工人先锋》，1974年7月19日。

在非洲大陆，托派未能成立他们的“支部”，尽管“第四国际”的各个集团都把这件事当作首要任务提出过①。

在阿拉伯东方各国，托派在努力散播宣传材料，他们为此成立了一些不大的“发起小组”。波萨达斯领导的“国际”所出版的刊物，有时公布一些“阿拉伯托派”的决议②。波萨达斯的“国际”成立了一个“阿拉伯局”，它出版胶印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和阿拉伯文的《社会主义革命》公报。

在七十年代，上述的各托派组织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增加成员人数，都在更加积极地研制它们的思想观点，这使革命斗争的开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① 为了尽快地建立起“非洲的革命政党”，巴黎“联合书记处”在1971年10月9日成立了一个“非洲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联系工作临时委员会”。但是关于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消息（《革命青年（Jeune Révolutionnaire）》，1971年第27期第30页）。

② 《共产主义斗争》，1972年7月21日。

第七章

现代托洛茨基主义是 “左”倾极端主义思想的一个变种

现在，一些由于在社会上处于中间地位和政治上不成熟而“赋有”左倾情绪的社会阶层，在反帝运动队伍中占有不小的份量。正如鲍·尼·波诺马廖夫所指出的：“和其他‘左’倾流派一样，托派竭力想扎根于这些人之中，利用他们在思想上的摇摆性、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情绪以及各种成见和偏见进行投机”。^①

现代托派在“左”倾流派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呢？

“左”派的极右翼

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要人们相信，共产党人认为“左”倾派别之间没什么差别，并对它们一概敌视。例如，西德的反共人士克劳斯·梅涅特就硬说共产党认为所有非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都不过是“一盘好菜里令人恶心的一根头发”。他认为是共产党人不加区别地对待那些在“新左派”这个统称

^① 《鲍·尼·波诺马廖夫言论选》，第 417 页。

之下联合起来的青年组织^①。

而实际上共产党人是以列宁的下述指示为行动依据的：“有些成年人正在把无产阶级引入迷途，却妄想领导和教训别人，这是一回事。我们必须同这种人作无情的斗争。有些青年组织公开声明，它们还在学习，它们的基本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政党培养工作人才，这又是另一回事。对这些人应当尽量帮助，要尽可能地耐心对待他们的错误，并且竭力设法，主要是用说服而不是用斗争的办法来逐步克服他们的缺点”^②。

这些为数众多的持貌似左派立场的组织和团体，大体上可分为两类。

有一些组织是一片好心而误入歧途，由于不能正确地认识政治形势，而往往遭受失败和陷入悲观失望。这一类组织包括与共产党没有联系的大学生组织，反战运动参加者、反种族主义者等所组成的某些团体。他们常常自称为左倾激进派，极少自称“新左派”。在资本主义各国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一个稍大些的组织正式使用过这个名称。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这样称呼它们，目的是要使它们与“老的”、“正统的”左派，首

^① 克·梅涅特写道：“所谓‘新左派’就是那些想在各种社会主义的口号下从政治上改变世界，改变生活方式，同时又避开莫斯科所领导的老左派的各革命流派和团体的总称。当然，这指的就是1968年5月骚动的巴黎大学生、美国的‘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联盟和西德的‘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这两个组织在七十年代初都已自行解散。——作者）、无政府主义者、托派、形形色色的毛派分子，甚至还包括按照西方的样式闹政治风潮的嬉皮士团体。”克·梅涅特接着还说：“在这里不必对那些变幻无常难以数计的派别和团体进行分类，因为莫斯科也把它们看作一个统一体，并且也这样对待它们。”（《东欧(Osteuropa)》，1973年第9期第64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4页。

先是与各国共产党分庭抗礼。

为了在左倾激进组织中培养对共产党人的不信任情绪，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他们的冒牌学术“著作”中，使用各种手段来抵销马克思列宁主义日益增长的影响。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预言家，他们虽然不属于上述的任何组织，但是都试图为它们规定行动准则。在这方面美国教授赫伯特·马尔库塞表现得格外积极。

资产阶级宣传机器为赫·马尔库塞及其他自封的左倾激进主义“预言家”^①所搞的宣传，同这些人的思想的理论意义以及真正的政治影响比较起来，显然是不相称的。这样大肆宣传，其内幕是十分明显的：企图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联合成一股力量，从意识形态上影响那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感兴趣的人们。

这种“树立偶像”的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左倾激进主义运动中，没有哪一个组织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冒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当成自己的政治方针的依据。充其量不过是，他们的有些思想曾为个别阶层的青年学生所接受。而且这些青年人接触这些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知识，并非为了确定自己的政治态度。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企图把马尔库塞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解说家”的这些失败说成是，由于青年们普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低落。他们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同资本主义世界青年

^① 详见杰克·沃迪斯：《新的革命理论》(Jack Woddis. «New Theories of Revolution»), 1972年伦敦版第179—216页；尤·安·克拉辛：《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载苏联《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杂志，1973年第1期。

早已对之感到失望的各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潮说成是一路货色,大肆宣扬“思想危机”。例如,美国学者H·康恩、D·布鲁斯—布里格斯就在《未来。对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设想》一书中宣称,现有的各种思想都不符合现在的左倾激进主义青年的期望,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也是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一样的“古董”^①。

而在实际上,青年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正在加强。诚然,左倾激进主义青年中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认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般来说,他们所能看到的都是一些经过“评注”的,更确切地说是被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曲解过的书籍。而且青年本身又都在中小学校及至大专学校接受过意识形态方面的精心加工。

共产党人认为反共成见和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一样,都是暂时的现象。它是可以通过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目的和任务进行耐心细致的解说,通过他们自己进行政治斗争的经验,加以克服的。列宁说过,青年人“往往不得不用另一种方法,用和他们父辈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形式,在另一种境况下接近社会主义”^②。这段话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共产党人把左倾激进主义组织看作潜在的同盟者。七十年代在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

^① H·康恩、D·布鲁斯—布里格斯:《未来。对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设想》(H·Kahn, D·Bruce-Briggs. «Things to Come. Thinkings about the Seventies and Eighties»),1972年纽约版。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4页。

过不少它们共同进行政治行动的事例。

这种合作之所以易于进行，是因为左倾激进主义组织的大多数成员的情绪的特点，是希望积极进行反对垄断资本专横强暴行为的斗争。同时，他们有可能根据亲身经验证实，由于忽视工人阶级及其政治先锋队所积累的革命斗争经验而采取冒险主义叛乱策略所带来的恶果。

除了这些在政治方针上表现出真诚希望得到真理，而行动上却被激情和“尽快结束资本主义”的愿望所左右的组织之外，还有另一类组织，这就是托派，毛派和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它们从“比左派还左”的立场出发，依赖激进情绪，利用这种情绪来达到狭隘的派别私利。它们有反共情绪不是由于误入歧途或不了解情况，而是自觉的、有计划的政策，以粗暴地伪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

共产党人向人们说明，这些组织给革命斗争造成了怎样的危害。共产党人积极争取，使其中因政治目光短浅而误入歧途的人们，摆脱冒牌激进主义的精神束缚，转到自己方面来，同时也断然宣布，他们不能和这一类组织搞任何无原则的团结。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莱·斐盖尔在说明决不能搞这种联盟的原因时强调说：“一则是，整个运动就要对一些小团体的冒险行动承担某种责任，从而让蓄意把民主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与左倾分子等同起来的大资产阶级政府抓到一个新的把柄，用以恐吓中间阶层，把它们控制在自己的政治影响之下。再则，这样做将意味着共产党承认‘左’的反共主义。在法国，这种‘左’的反共主义和右的反共主义一起，一向是真正为民

主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一切力量实现大联合道路上的主要障碍”。^①

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托派组织，无政府主义组织和毛派组织通常被称作“左”倾极端主义组织。有人对使用“左”倾极端主义一词的论据，对其科学意义表示怀疑^②。例如，有人说二、三十年前没有这一概念，因此现在也可以不用这个概念。这种意见恐怕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极端主义”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extremus*，意思是极端的）很早就用于表示崇尚极端的、即所谓过激的观点和行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指出：“这个术语用来表示极端的观点毫无不科学之处。再加上一个形容词‘右倾的’或‘左倾的’，便可以表达清楚所谈的是哪一种极端”^③。

大家都知道，右的和“左”的极端主义往往是十分相似的，采用的是一些同样的政治斗争方法：恐怖手段，破坏行动，下流无耻地破坏社会秩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恐怖分子和“左”倾恐怖分子就都是这样干的，因此人们很难弄清楚两者当中谁是阴谋活动的组织者。

“左”倾分子的行为常常与一般的刑事犯罪如出一辙，简直无法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的行为。挟持和残酷迫害人质、劫持飞机、恐怖和破坏行动、毁坏文物和肆无忌惮的流氓行为，所有这一切与革命的工人运动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

① 《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第 83 页。

② 参看 1973 年第 1 期《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 87 页上刊登的一封信。

③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3 年第 1 期第 89 页。

之处。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使用“左倾极端主义”一词。此外，人们还使用“极左行为”、“极左派”、“左派”、“左倾行为”这样一些概念，正如《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所强调指出的，这些无疑都已经成为否定的概念^①。

与此同时，“左倾机会主义”一词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被用于分析“左”倾的思想根源，这里首先指的是试图为各种阴谋活动寻找伪理论依据的“左”倾表现。

“左倾极端主义”一词，和“左倾行为”、“极左派”、“假革命”等等一样，是用来表现形形色色的最极端、进而到荒谬绝伦地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在革命运动的不同阶段上出现过许多术语，它们所反映的实质上是同一现象，不过对这种现象作了一定的具体说明。列宁的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中所用的“左派”、“假革命”、“冒牌革命”等等术语，都是突出表现采取这种立场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持否定态度，表现他们崇尚空谈。^②

马克思主义者使用这些术语，绝不是要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可能性散布怀疑。正如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的

① 参看《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3年第1期第89页。

② 作者在《现代“左”倾极端主义的反革命性质》（1974年莫斯科版）一书中，对这些问题有更详细的论述。下列著作在“左”倾行为的方法论和对“左”倾行为的批判方面也作了不同的探讨：《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当代世界的思想斗争。现代资本主义：矛盾和理论》，第2卷，1976年莫斯科版；Э·Я·巴塔洛夫：《叛乱的哲学（对左倾激进主义思想的批判）》，1973年莫斯科版；尤·安·克拉辛：《被革命吓倒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观简评》，1975年莫斯科版；鲍·莫·莱布森：《什么是今天的革命性》，1972年莫斯科版。

丰富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小资产阶级可以和无产阶级一起为改造社会，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列宁在1905年高度地评价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行动，并且告诫不要“笼统地‘否定’这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不要“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忽视这个运动……”^①

评价一种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这表明精确科学地确定，它是一种过渡的或者是一种企图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现象。当然，把一些观点确定为小资产阶级的，这并不排除对这些观点进行区别研究，对它们的独特之处和新的特征进行探讨的必要性^②。

以上所述也适用于托派、毛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既搞同盟又相互竞争。每一派都自命不凡地想充当名为“左”倾极端主义的政治立场的主要代表。

长期以来毛派组织是各种极端主义思想的主要散播者，它们得到北京在财政上的慷慨援助和宣传上的支持。正如乌拉圭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罗纳内·阿里斯门迪所指出的，毛派“……为托派、无政府主义派以及模仿这两者的团体的一切廉价空谈和小资产阶级招摇撞骗行为提供营养。”^③

无政府主义者与托派一样，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曾试图在原来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立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297页。

② 详细情况请参看：米·伊·巴斯马诺夫、鲍·莫·莱布森合著《共产主义先锋队。意识形态斗争问题》（1975年莫斯科版）一书第88—94页；《现在的倾向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吗？》。

③ 罗纳内·阿里斯门迪：《拉丁美洲革命的课题》，1964年莫斯科版第618页。

场上联合成为一股国际势力。1968年，各种不同流派的现代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在意大利举行了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它忠于“早在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进行严肃争论时形成的”无政府主义的传统。它声称，今后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在东方实行的以教条式顽固不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特征的统治形式”^①。1971年在巴黎召开的例行代表大会上，无政府主义分子再次号召同“布尔什维克极权主义”进行斗争是一项“首要任务”。

同时，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也出现了一些思想剽窃者。他们也象托派和毛派一样，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无政府主义者盖朗在标题引人注目的《为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奋斗》一书中写道，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没有理由进行争论的。“我认为它们是一对进行无益的辩论的孪生兄弟，这种辩论会把它们变成兄弟仇敌……它们的长期战略以及最终目的实质上是一致的”^②。盖朗要人们相信，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无政府主义的”，而“今后的革命将是无政府-马克思主义的，它现在已经是这种性质的”^③。他妄图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合成“做出贡献”，指望“无政府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能帮助他的同伙摆脱宗派主义的脱离群众状态。1969年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代表大会上，有些发言就和盖朗所写的上述内容相近似。

① 《前途》(«Die Zukunft»), 1968年第19期第4页。

② 丹尼埃尔·盖朗:《为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奋斗》(Daniel Guérin, «Pour un marxisme libertaire»), 1969年巴黎版第12页。

③ 同上,第9页。

托派、毛派和无政府主义派有许多近似的冒牌理论观点和许多相似得出奇的行动。托派的观点在毛派的思想纲领中有反映，毛派对托派观点的形成也有影响。研究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西德资产阶级学者京特·巴尔奇曾就这个问题指出：“也许可以说存在着无政府主义毛派和无政府主义托派”^①。

各种“左”倾极端主义组织所采取的固有的手法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在用一套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偷换马克思主义。大多数毛派团体依然在宣称：“毛泽东主义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竭力阻挠非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寻求通向科学共产主义的道路。托派也早已在这样做，他们把托洛茨基主义说成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口中”，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类似布朗基主义的东西，具有一些它根本不会具有的搞宗派耍阴谋的特征。

托派、无政府主义派和毛派团体的社会基础也大致相同。在哲学方面它们的共同点是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②。

上述这些“左”倾极端主义组织，对其他“左”倾团体起着反苏反共思想的主要“兜售者”的作用。

^① 京特·巴尔奇：《德国的无政府主义》，第2卷（1965年—1973年），（Günter Bartsch, «Anarchismus in Deutschland» Band II 1965—1973.），1973年汉诺威版第216页。

^② 当然，也不应忽视这些“左”倾极端主义派别之间存在的明显分歧。科学地、准确地分析它们的思想 and 政治状况，揭露其中每一派的社会根源、认识论根源以及其他方面的根源，有助于各国共产党进行有区别，有目的的政治思想斗争。

共产党人在对托洛茨基主义这种“左”倾极端主义思想进行思想斗争的同时，也反对过分夸大它的政治影响。在这方面，资产阶级宣传机器表现得特别积极，它夸大现代托派和托派观点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利用“左”倾激进主义运动的加强进行投机。持“左”倾立场或发表的观点与托派相似的人绝非全是托派分子。

“左”倾的特征是思维的局限性和直线化。形形色色的“左”倾代表人物试图“避开”共产党人以及指责共产党人“缺乏革命性”，都是提出一些共同的或近似的披着理论伪装的“基本原则”。有时这些“原则”与托派的主张相似。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对托洛茨基主义一无所知。

各国共产党都号召对托派阴谋保持警惕，同时也告诫人们不要陷入极端。正如英国共产党理论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强调指出的那样，“一是要对讨论政治问题有最充分的准备，一是要有能力识别与我们的观点不同的人，共产党人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对我们的党为害最大的行为，莫过于试图压制辩论或任意地把人们划为托派分子。”^①

大家知道，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总是互相密切联系的，常常是相辅相成的。

鲍·尼·波诺马廖夫在指出这一点时强调说：“在思想政治方面，右倾的和左倾的错误观点之间的界限毕竟是很清楚的，而在政治实践中，则有不少历史事例表明这两种倾向是互相交织的，甚至两种倾向的机会主义者合作得非常密切。”现

^① 《今日马克思主义》，1964年第9期第283页。

代的“左”倾极端主义思想家越来越多地把一些早已被社会改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用作武器的观点，拿来塞进自己的伪理论体系和政治纲领^①。

“左”倾极端主义把大量的上述观点加以改头换面，通过对历史过程和整个阶级斗争的主观唯意志论的曲解把它们再反映出来。这就决定了“左”倾的“革命性”所具有的特征，以及这种“革命性”的一切表现所固有的下列“世袭的标记”：

——从小资产者的立场出发^② 有意识地歪曲现实生活，以主观主义的、反动空想的公式和理论加以反映，而这些公式和理论都是旨在“推翻”无产阶级关于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方法的概念；

——提出一些伪装革命的口号和号召而收不到任何效果，这表现在从提出一些极端的要求和冒险主义的斗争方法，一变而为鼓吹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

——不相信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力，不相信它能动员广大劳动群众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蔑视阶级斗争的规律，把革命说成是一种意志的行

① 参看《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第7页。

② 一些主张“左”倾“革命性”的人，由于被称作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往往装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声称：“对不起，我们并不主张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永恒不变，而且我们自己也不是小资产者。”可是，马克思早就揭穿过这种说法。他写道，代表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人，不一定非得是小店主。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强调指出：“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

动，而且是由一些“革命的少数派”和孤家寡人所完成的意志的行动，低估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

——无视阶级斗争形式的多样性，鼓吹脱离群众的和分明法定会失败的宗派行动；

——折衷主义和思想上的杂食性（当然是要在小资产阶级的假革命性所允许的范围内），各种各样反无产阶级的观点共栖；

——公开敌视革命的先锋力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深恶痛绝，但常常又信誓旦旦地伪装忠于马克思主义。^①

这些正是大多数现代托派分子的特点。

列宁注意到有必要揭示各种不同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共同特征，同时又强调指出：“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②这段话也适用于现代托派：美国托派不同于法国托派，法国托派不同于英国托派，等等。甚至还可以说，就是法国托派也不同

^① 关于对“左”倾“革命性”的主要评述，请参看《列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冒险主义的斗争》；谢·帕·特拉佩兹尼科夫著《在历史的大转折关头。（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的若干经验教训）》，1972年莫斯科版；K·B·古谢夫：《社会革命党：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到反革命》，1975年莫斯科版；谢·尼·卡涅夫：《十月革命与无政府主义的破产。（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1917—1922年）》，1974年莫斯科版；尤·安·克拉辛：《被革命吓倒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观简评》；鲍·莫·莱布森：《什么是今天的革命性》。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498页。

于……法国托派——在当前的条件下，这个政治派别就是如此五花八门。

存在托派组织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评论托派的理论和策略观点时，在论述托派在政治上依靠的是沾染上小资产阶级革命情绪的阶层时，把这些组织都列为极端“左”倾的表现。在英国，他们被共产党人称为一种“超左派”；在法国，被称为“gauchisme”（左派）；在意大利，他们是“议会外左派”；在西德，则被称作“左”倾极端派，等等。他们的实质是相同的。甚至对于许多观点都来源于社会改良主义的美国托派，共产党人也把他们看作一种“左”倾派别^①。

勃列日涅夫在1969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着重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者以超级的革命词句为掩护，怂恿群众去从事冒险行动，把党推上丧失团结反帝战士的能力的宗派主义道路。”无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最终都将导致同样有害的结果：削弱各国共产党的战斗力，动摇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和破坏反帝力量的团结”。^②

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套在“左”的形式里总是被拘束得难受，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内在的主要矛盾。装潢门面的脆弱的革命外壳一旦被挣破，这个矛盾就表现得格外清楚。

七十年代，为了排挤毛派和无政府主义团体，托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玩弄了一套狡黠巧妙的手法。他们要无政府主义者

^① 参看海·卢默的《托派是反动势力的“左”派喉舌》一文，载于《政治月刊》，1972年第6期第26—39页。

^②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1969年6月5—17日于莫斯科》，第67页。

相信，只有托派具备一套旨在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矫正”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纲领。对毛派则宣称，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能够使他们的团体摆脱意识形态上的绝境。

托派的意图并不仅仅在于排挤无政府主义派和毛派以巩固自己的阵地。正如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阿尔贝·贡宁克指出的那样，托派“希望的是能把现有大部分‘左’派组织纠集到自己方面来”。^①

为此目的，托派分子开始和各种“左”倾激进团体接触。他们怂恿这些团体走上与工人阶级隔绝和反对各国共产党的道路。这就说明，托派活动的加强，已经成为当前条件下“左”倾极端主义危害最大的现象之一。

“左”倾空话掩盖下的反动性

对于当前各种主要的革命运动——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争取实现一般民主要求、争取和平和消灭垄断组织压迫的斗争，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完全彻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托派依旧持敌对态度。

托派的宣传材料充斥着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保证以及援引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著作，这常常把没有经验的读者弄得莫明其妙。当托洛茨基的“继承者”以他们的思想冒充马克思主义，而只字不提自己愿属托派的时候，更使得读者完全迷惑

^① 参看阿·贡宁克的《“左”倾对谁有利？》一文，载于《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文集第 203 页。

不解了。

如果抛开托派“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宣言，而透过被篡改的引文和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帷幕，去分辨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那就会认出它不过是一个由若干公开投降的、反革命的观点拼凑起来的東西。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核心包括以下内容：对我们的时代，对时代的动力，对世界革命过程的内容作极端反动的解释；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加以毫无根据的否定；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的投降主义论点；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战斗力低落”，没有能力在革命斗争中把同盟者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谰言；否定一般民主运动，反对组成反垄断和反帝国主义的广泛同盟；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篡改为反对被指责为“罪恶滔天”的革命先锋队的斗争，实行粗暴的反苏主义。

五花八门的托派小组和团体的互相争吵可以达到疯狂的地步，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也可以极不一致。但是，对于反映在它们的“纲领性”方针和实际行动中的上述立场，它们是一致赞同的。

露骨地贯穿在托派伪理论体系中的反动透顶的世界主义，仍旧是托派思想的特点之一。世界主义不仅仅是托派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它还体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特征，体现了托派对进步和民主力量、爱好和平和反帝力量的根本利益所抱的敌对态度。

托派的世界主义十分狡诈诡谲，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认清的，因为它是用“左”的词句伪装起来的。刚刚参加政治斗争

的人们有时会被它的那种似是而非的“全球性”所吸引，其实在那背后隐藏的是对整个世界的宗派主义仇视。人们往往不易在反对“民族局限性”的响亮革命词句的背后看出托派对要求考虑斗争中的民族特点的无耻漠视，对各国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叛卖。

胡·波萨达斯肆意卖弄民族虚无主义，指着他自己和他的同伙说：“在民族性问题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①。在这种说法中引人注意的是故意炫耀他无视民族的属性。托派的危害并不在于他们宣布自己是一些“没有民族性的人”，而在于他们企图把无视民族特点说成“革命的行为规范”。

这位波萨达斯还断言：“完全没有必要去注意什么地区的利益”。^②巴黎“联合书记处”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在严格的‘民族’范围内，解决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都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展开”^③。西班牙托派在一份自命不凡地称作《为第二个共产党宣言而奋斗》的声明中提出：“而且可以这样说：一切民族斗争都是反动的”。

托派的世界主义来源于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就在传播民族虚无主义。他们在提出立即消灭一切国家和民族障碍的世界主义号召的同时，就对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为组织和巩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而采取的一系列初步措

① 《工人斗争报》，1972年10月11日。

② 《红旗》，1972年3月4日。

③ 《第四国际》，1966年第27期第6页。

施展开了破坏活动。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后来继续被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当作思想武器。

托派世界主义的特征是：它的鼓吹者一面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一面又摆出一副“同样是国际主义的”，甚至还是“彻底国际主义的”面貌。许多国家的托派都把自己的组织称之为“国际主义的”，他们的杂志也以《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评论》、《国际工人通讯》等等之类的名称出现。托派的“国际”本身也被臆造为一个“只从全世界范围”思考问题的“世界党”。

托派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立面。这是一些反动的，然而却惯用“左”的词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对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对日益巩固的反帝力量的团结作出的反应。托派世界主义同时还反对各国共产党人的团结。

1969年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文件指出：“对每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来说，民族责任和国际责任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既是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既反对民族狭隘性，又反对对民族利益的否定或估计不足，还反对霸权主义倾向。”^①

托派世界主义的反动性，在对时代的评价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第四国际”依然反对列宁关于人类通过越来越多的环节、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途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按照托派的观念，社会的改造只能是一种全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1969年6月5日—17日于莫斯科》，第327页。

球性的过程，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或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之后才会开始。

“第四国际”的章程扬言：“没有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建成。”波萨达斯集团更发挥了这个论点，他们宣称：“历史条件是这样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可能单独地建成社会主义。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可能单独取得成功并向社会主义发展，因为这一切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发生。”^①

巴黎“联合书记处”在1966年宣称：“在严格的民族范围内没有任何可能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课题。”美国的托派进一步发挥了这个世界主义的论点，他们于1978年8月声称，只有建立起“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盟、全世界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②，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建成。

为了论证上述的说法，“第四国际”的“思想家”又求助于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或数国建成的论点。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使自己陷入荒谬的境地而感到难堪。如果说在二十年代这种论点是在苏维埃俄国刚刚确定发展道路的情况下提出的，那末在已经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条件下，它就完全是一种陈词滥调了。

同时，必须消灭一切国家和国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活跃起来了。意大利托派报纸《工人斗争报》于1976年写道：“世界已经成熟到足以实行社会主义了。不要光是想着每个国家

①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杂志》(«Revista Marxista Latinoamericana»), 蒙得维的亚版1968年第14期第116页。

② 《战斗者》，1978年8月4日。

的国界所造成的障碍。那是些荒诞无稽的东西。”^①

托派否认时代的基本矛盾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对立体系之间的斗争。同时，他们也拒绝承认当代的中心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一事实。

托派关于世界革命的见解，也是反动的世界主义与投降主义观点的大杂烩。

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托派比以往更加卖力地把自己打扮成世界革命的捍卫者。形形色色的托派组织的文件照例是以“世界革命万岁！”的口号结尾。托派上街游行和参加群众大会也都叫喊这样的口号。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托派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小组”还把争取“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②载入它的章程。

为了蒙骗政治上无知的人，托派把共产党人称为“受民族局限的人”。投入政治斗争的“新兵”并不了解，共产党人数十年来始终在一代又一代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进世界革命事业。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革命才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

由于世界的革命斗争没有象托洛茨基预言的那样发展，他的追随者们便对历史本身责怪起来。请看，下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种说法。美国的托派声称：“我们认为，这些革命都背离了常规，都是历史上暂时出现在无产阶级革命大道上的一些岔路的路标。”^③

① 《工人斗争报》，1976年3月30日。

② 《内部报告。政府，政党》，1973年6月10日。

③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74年4月号第22页。

只有符合托派主观臆断的现象和事件，他们才认为是合乎实际的。凡是超出这个框框的事情，都被看作是变态的、反常的，“岂有此理”的。这就是他们那种硬要世界“听从”自己的想法和“处方”的根本行不通的观点。

这种不切实际的作法常常被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的形形色色小宗派组织用于政治斗争之中。宗派主义者自命是唯一的“真理掌握者”，认为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同一切与他们想法不同的人作斗争。

马克思主义从不想把世界革命过程的演进加以公式化，套在死板的框框里面。列宁写道：“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①。共产党人对待过去的革命斗争所积累的经验总是十分珍惜的，并且不断地丰富它。

托派则对国际工人阶级在紧张艰苦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一概敌视。托派关于“世界革命”的种种主张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认定“世界革命”首先必须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第四国际”各个集团在战后举行的历次“代表大会”总是反复提出，世界革命应当包括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亚非拉的反殖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革命”。托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总是强调指出：“政治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它“必然是世界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奏[！]”。^②托派的“世界革命”公式还有另一个特点：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号召开展的斗争也不是从反对垄断组织开始，而是先要反对……各国共产党。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7页。

② 《第四国际》，1957年12月号第10、102页。

在这里，托派依然是把他们的力量集中用于破坏各国共产党的阵地。例如，“争取重建第四国际”集团在1977年确认：“我们目前还远未实现过渡纲领的这样一项规定：第四国际的中心任务在于使无产阶级摆脱原先的领导”^①。“新时代要求出现新的领导者”——托派总是反复提出这种说法，竭力破坏共产党的威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革命活动中奉行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等原则是经受过实践的考验并证明是有生命力的，托派却提出所谓“最合理的先锋队”的抽象公式与之对抗。

托派说这个“合理的先锋队”将会“为一切人着想”，将对各个国家进行斗争作出指示。可是在它问世之前，别想指望各个国家的革命能得到顺利的发展。

而所谓“合理的先锋队”，指的不外是“第四国际”。伦敦“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极其明确地道出了这一点：“根本的(1)真理在于，革命的政党只有作为世界革命党即第四国际的支部才有可能建立起来”。^②

托派总是把争取建立这种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出现的“世界革命党”的斗争，归结为“先反对共产党人，然后再反对资本家”。这种主张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十分满意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对托派将来会在某个地方表现其革命性的恫吓并不在意，而是把他们视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乃至反对“第四国际”的信徒们口头上不断叫喊的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从托派提出的“欧洲联邦”口号中，可以清楚地

① 《真理》，1977年第575期第38页。

② 《工人新闻报》，1973年11月13日。

察觉到这种联盟的存在。

正如西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I·G·冯·海泽勒所指出的那样，“托派对争取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理解，是把以下两种不能混为一谈的东西混为一谈：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和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欧洲地区中的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活动。”^①“第四国际”各个集团的文件经常强调指出，建立“欧洲联邦”的过程应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革命”开始。

西欧各国的劳动者如果想在革命斗争中取得一定的成就，他们就应当先从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行动；至于反对垄断组织的斗争，则是“革命”的第二阶段——这是典型的托派逻辑。托派号召成立“欧洲联邦”的材料能在资产阶级的各大出版社出版，并且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和学校中随意散发，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吗？

现代托派的“纲领性”方针中不仅有“欧洲联邦”的口号。他们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还号召建立“拉丁美洲联邦”、“亚洲联邦”、“非洲联邦”、“近东联邦”等等。

不管托派号召成立什么样的“联邦”，他们有两项要求是固定不变的：在民族的基础上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世界性的“革命”改造应从“政治革命”开始，即从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始。

这样，托派便自我暴露出他们是一伙反革命。把反帝斗争篡改为反对当代的主导革命力量——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是无法把自己称作革命者的。

^① 《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第112页。

第八章

勾结帝国主义反动势力 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1969年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完全有根据地宣布：“社会主义给人类展示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前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者执政为基础的崭新的社会制度，能够保证经济按照人民的利益有计划地、没有危机地发展，保障劳动群众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为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真正民主，切实参加社会管理，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和互相友爱创造条件。实际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根本问题。”^①

社会主义对世界事态发展进程的影响正在逐年加强。1977年11月2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联合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指出：“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主义将以历史规定的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形式成为地球上占据优势的社会制度，给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1969年6月5—17日于莫斯科》，第302页。

全体劳动人类带来和平、自由、平等和福利”。^①

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扩大和不断丰富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是人类的伟大历史财富。

勃列日涅夫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共同特征时着重指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总的经验,具体说来向我们证实了以下几点:

——革命的主要问题仍旧是政权问题。要么是同全体劳动人民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的政权,要么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第三种可能是没有的。

——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真正掌握了政权,并且利用它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者及其他剥削者占居的社会经济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人必须在建设新社会和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经济及一切社会关系的斗争中善于鼓舞和团结劳动群众,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只有在劳动者的政权能够保卫革命击退阶级敌人的任何进攻(这种进攻是不可避免的——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而且更多的是来自外部的)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才有可能确立起来。

这些仅仅是当前社会主义发展的部分经验教训。”^②

列宁曾经提出过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这个社会在我国已经建成。苏联新宪法中记述了这一点。正如勃列日涅夫所指出的,人们把这个宪法“正确地称为发达社会

① 《遵循列宁的方针。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6卷第598页。

② 同上,第588页。

主义社会的生活的法规。”^①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诸国也都在顺利地建设着这种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成绩越大，帝国主义反动派也越加挖空心思和花样翻新地歪曲社会主义的现实。那种把被歪曲的社会主义的形象硬塞给不满意资本主义制度、积极参加反垄断斗争的人们的现象，也日益引人注目。

垄断资产阶级早就十分清楚，从假左派的立场对这一部分人进行反社会主义宣传，要比公开宣传资产阶级立场或社会改良主义立场更加容易和更加有效得多。在反动势力的大力鼓励下，“左”倾分子的报刊也干起了肮脏的勾当——以假革命的词句为掩护恶毒地诽谤现实的社会主义。

不相信工人阶级的革命创造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深刻的理论结论和极其丰富的实际材料非常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目标就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列宁曾着重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②

托派怀疑无产阶级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在已经完成这一使命的地方，托派认为无产阶级也不能按照社会主义的新原则来组织社会。

① 勃列日涅夫：《论苏联宪法》，第2版增订版，1977年莫斯科版第4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

关于无产阶级有没有必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荒谬议论（这个问题先是由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理论上加以解决，后来又为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是适合托派需要的，它可以用来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创造性目标这一思想，用来败坏已经得到历史证实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声誉。

被托派搅得混乱不堪的另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即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手中的问题。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①他反复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应仅仅归结为对剥削者使用暴力。他写道，除此之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愈往前去就愈要提出）积极地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这一更重要的任务。”^②

无产阶级专政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国民经济、文化事业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其他领域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③

自工人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至建成社会主义为止是过渡时期，在整个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也正是这样提出这一问题的：“在资本主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344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9页。

③ 同上，第3卷第634页。

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一是无产阶级专政应服从于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一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广泛的民主内容，即“对工人和农民来说，……是最高限度的民主制”^②——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向全民国家的转变。苏联最先走完了这段路程。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无产阶级政权都根本不同于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政权。列宁曾强调指出，“不……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③，就不可能使政权由少数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大多数被剥削者手中。

而按照托派世界主义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在国际范围，在全世界范围实现。因此，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也和建设社会主义一样地成为遥远未来的事情。例如，意大利的托派报纸就曾断言：“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在出现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④

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有一项任务，就是要对没有停止反抗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是，革命在一切国家取得胜利岂不是意味着这种反抗已经完全克服？

托派采取这种立场是由于他们企图迎合小资产阶级某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68页。

③ 同上，第3卷第723页。

④ 《工人斗争报》，1976年4月27日。

阶层的政治情绪，他们指望得到这些阶层的支持。而这些阶层则因自己所处的中间地位和社会态度的两面性，往往对无产阶级专政持敌视态度。列宁指出，半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从来不会预先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①

波萨达斯还“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无产阶级自取得政权之时起便失掉其历史的意义，便已开始解体。它开始解体是应该的。”^②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无产阶级解体”。无产阶级实现历史的使命变成了“失掉历史的意义”。

托派得出这一“结论”的“论据”是，在“从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取得胜利的革命必然伴随着发生“变态”和“反常”现象。美国的托派断言：“在这漫长的、象是一条曲线的过渡时期中（尤其是在采取少数初步措施的时候），在某个时间或某个地点出现的新社会经历反常和变态，是不可避免的。”^③这个观点得到了巴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支持，它指出：“变态……现在和将来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伴随着任何一场取得胜利的革命而发生”。^④

试问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向变态前进”吗？托派的论断就是荒谬到如此的地步，他们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38页。

② 胡·波萨达斯：《苏联存在五十年的历史概况》（J. Posadas. «Historischer Überblick von 50 Jahren des Bestehens der Sowjetunion»），1967年格隆堡版第9页。

③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4年第1期第15页。

④ 《第四国际》，1967年第32期第5页。

既极力诋毁社会主义，又要把自己打扮为社会主义者。

对社会主义革命采取有计划的敌对行动

每一次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要遭到托派的仇视。他们对东欧各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应就是这样。

有一段时间，托派准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例外，对于它的社会政治状况的评价也不同于对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托派曾经无保留地认为中国是“变态的工人国家”，号召实行“政治革命”反对它的社会制度。而在毛泽东及其同伙与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发生冲突之后，托派中间又出现了这样的论调：是否应当重新考虑以往的评价，研究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处在“不断革命阶段”。由于中国领导人同“第四国际”接触（但也不阻止他们在各国的“囊中党”同托派组织保持联系），现代托派的许多“思想家”和领袖们又号召不要把北京的领导当作例外，应当和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地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代后半期，各个国际托派集团又都重新谈论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变态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与毛派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当革命转向解决创造性的任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便会遭到托派格外疯狂的反对。古巴采取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托派就指责这个政权“背叛世界革命”，并号召推翻它。伦敦“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首领之一希利把古巴描述成“资本主义国家”，并宣称那里“并没有建立起一个与巴蒂斯

塔政权有所区别的崭新的国家”。^①智利的托派早在1961年就急忙地宣布古巴是一个“蜕化的国家”，因为它“奉行……和平共处政策和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②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指出的，托派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手中的庸俗的工具。”^③

托派对待社会主义越南的态度也是卑鄙的。当英雄的越南人民进行反对美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时，托派反对任何政治解决的调门喊得比谁都高。他们当时是和那些号召同美帝国主义战斗“到最后一个越南士兵”的“左”倾分子站在一起的。但是当国家实现了统一，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时候，托派便开始诽谤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把它称为“变了态的官僚主义国家”。^④

托派极其希望人民和党发生矛盾。和维护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一样，“第四国际”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制度在种种意见分歧和“裂痕”的影响下垮台，因此必需千方百计地促进这些分歧和“裂痕”的产生。他们号召进行“新的革命”，号召推翻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所追求的正是这一目的。

托派关于“政治革命”的说法是极其反动的。实质上就是指望工人阶级的敌对势力进行政治革命以反对导致工人阶级执政的政治革命。这是一条使国际无产阶级丧失它已经夺得

①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73年第2期第31页。

② 同上，1961年第3期第86页。

③ 《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第56页。

④ 1976年11月12日，美国《战斗者》报批评越南人民“有意识地选择苏联制度的……政治结构”，指责越南“官僚化”（《战斗者》报，1976年11月12日）。

的政治和经济阵地的路线。

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① 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证明，建立工人阶级政权是肃清被推翻阶级的反抗，团结群众建设无剥削的社会这一伟大事业的基础。勃列日涅夫在分析了各国阶级斗争的实践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后指出，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有这样一个根本的特征，“这就是在工人阶级起先锋作用条件下的劳动者的政权，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社会发展的领导”。^②

托派企图把政治革命说成是一种脱离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孤立现象，他们诋毁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说这些革命没有解决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是受骗者”。但是，这种说法无法回答下述的问题：如果不是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那么是什么力量摧毁了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反抗，根本改变了有关各国的社会经济面貌，保卫了革命成果免遭帝国主义的侵犯？

托派有时承认，如果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不发生变化，政治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帝国主义势力所关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勃列日涅夫指出，“他们巴不得能削弱党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这是因为他们始终在梦想削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扑灭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③

托派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们实行阴险狡诈的策略的真正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62页。

② 《遵循列宁的方针。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2卷第590页。

③ 列·伊·勃列日涅夫：《论苏联宪法》，第47页。

动因：“我们不是反对制度，而是反对领导”。他们要实行的“政治革命”究竟是怎样的呢？原来托派“政治革命”的“模式”就是1956年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①和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的右倾修正主义势力的“静悄悄的反革命”（1968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帝国主义集团和国内反革命的企图都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它们在这两个国家所采取的策略，都是破坏共产党对社会的领导作用，削弱劳动群众的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思想。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明显地证明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右倾机会主义势力和托派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站在一起向社会主义进攻，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

1968年4月18日，巴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通过了一项专门决议，表示欢迎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发展。^②托派在全国广为散发的宣传材料中说，问题不在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要以所谓的“真正”民主来取代它。其实，他们所要实行的不过是通常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托派非常赞成“工会独立”的口号；他们认为，工会应当“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受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犯。有一个国家的反党集团提出，要建立一个可以把托派“第四国际”、毛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派别的思想都包括在内的思想流派。这也是右倾机

^① 托派甚至干出这样的亵渎行为：他们将这次叛乱和推翻古巴巴蒂斯塔政权放在一起评论，把两者都称为革命（《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3年第1期第94页）。

^② 《真理》，1977年第575期。

会主义势力利用托派思想的一个例证。

《文学报》周刊连续十期刊载了伊·多伊彻的一本反苏著作：《未完成的革命》。书评中否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质上也就根本否定了捷克斯洛伐克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要性。^①托派分子试图同缺乏政治经验的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建立联系，向他们鼓吹托派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②，多年来托派一直和逃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展关系，和他们一起组织各种集会和游行示威。

托派还为一些被西方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单干的背叛者的种种表演掀起吵吵嚷嚷的宣传运动。托派在报刊杂志上以极其同情的态度大量报导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消息。尽管托派也承认“这些人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不代表任何社会力量”^③，“对工人国家不能造成任何威胁”^④，他们还是以五花八门的形式采取“声援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他们忽而为索尔仁尼琴对苏联的攻击往往是“亦步亦趋地追随托洛茨基”^⑤而兴高采烈，忽而又因持不同政见者的成绩“与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所取得的成就相距甚远”^⑥而表示惋惜。托派报纸《新闻战线》多年来一直在从事“支持不同政见者”的宣传活动，它从不放过机会告诉人们，托派是“资格最

① 参看海·卢默的文章，载于《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一书的第156—157页。

② 请看上书第157页。

③ 《红旗》，1974年7月9日。

④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75年第1期第40页。

⑤ 《工人新闻报》，1974年2月2日。

⑥ 《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1973年第3期第162页。

老的政治反对派”。

从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 立场批判社会主义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托派为败坏现实社会主义的声誉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点在腔调和着重点上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托派扮演起……非社会主义的空想主义者的角色。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当年曾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而现在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妄图使科学社会主义倒退为空想主义。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反对现实社会主义的空想主义只能是反动的。

托派特别重视编造各种反动的空想主义观点，这一事实本身是很说明问题的。他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所作的种种评价和“预测”已经完全陷于混乱状态。

例如，他们现在不得不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必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的预言。1957年“第四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还在谈论“资本主义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而在十一年后的1968年，同一个托派集团的书记处又声称：“苏联社会已不再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①美国的托派也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断资本主义已经复辟或复辟的威胁可能顺利实现”。^②

托派现在也不再提起他们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必

① 《第四国际》，1968年4月第33期第58页。

②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72年第11期第22页。

然落后的种种说法。他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不得不说“工人国家对资本主义的优势表现得日益明显”。^① 这种说法也不再被现代托派认为是“背叛”。

但是托派还是一致拒绝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说明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他们找到了一种诽谤和诋毁社会主义的新方法：他们过去是把着重点放在臆造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的说法上，如今则是鼓吹社会主义的面貌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

托派企图充当那些“承认马克思主义，但只承认到社会主义阶段以前”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思想代表。这些阶层并不公开地宣称自己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总是反对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托派正是以这一部分人为宣传对象，要他们相信“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作出自己的结论”。^②

托派常常采用下述手段破坏现实社会主义的威信。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抽出一些关于共产主义制度下应当存在什么的论述，然后便作出结论说：“既然这一切都不存在，那就是说社会主义也不存在。”下面我们举一个故意混淆概念的实例。1977年3月，英国托派报纸《新闻战线》写道：“社会主义是无阶级的社会。它之所以没有阶级，是

① 《红旗》，1977年2月4日。

② 苏联哲学家尤·沃尔科夫和费·盖尔布赫注意到这种说法在方法论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们十分有根据地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即不是凭着善良的愿望，而是依靠如实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理论，不可能有若干个；这样的理论只能有一个。这是因为社会发展规律也和自然规律一样，具有普遍的、无所不包的性质——这就是说，这些规律对于一切国家是统一的”。（参看《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1977年第3期第51页。）

因为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民根据人的需要来计划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①

在这里，问题完全被搅混了。的确，社会主义是要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且根据整个社会的需要加以计划使用。但是它还不能取消工农之间的差别。因此，社会主义是无剥削的社会，而不是无阶级的社会。

托洛茨基的继承者重弹起托洛茨基的旧调，他们声称，如果还存在国家，仍旧保存商品货币关系，那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胡·波萨达斯断言：“商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需要购买。但是就商业本身而论，其必要性会越来越来少……俄国革命后的头五年期间，商业经济是不可缺少的……在初期是不能不要市场经济的，因为当时还没有用来满足居民需要的最低数量的商品”。根据上述论断，他们引伸出一个结论：革命数十年后还存在着商业，还保留着货币关系，这难道可以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吗？^② 拉丁美洲的托派则宣称：“社会主义制度下不需要商业，因为商业是生产物质化和获取销售利润的产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有它的地位。因为生产不是服从于积累和获得利润，而是服从于需要”。^③

托派否定商业，仅仅是因为它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难道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一切都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抵触吗？在这方面，引用一下苏联哲学家格·叶·格列泽尔曼的下述论据是十分恰当的。“除了社会主义要加以克服

① 《新闻战线》，1977年3月12日。

② 《红旗》，1971年2月17日；1971年5月25日。

③ 《无产者之声》（《Voz Proletaria》），1972年9月20日。

的那些现象之外，还存在着社会主义要加以改造、利用并使之为自己服务的一些现象。例如，商品货币关系机制就属于这种现象，社会主义正在充分地利用它来发展生产力。这一机制是社会主义从旧的社会形态继承下来的，但是它并不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更不是同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恰恰相反，它会成为社会主义关系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条件下之所以必须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实际达到的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现有水平要求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经济在经营上有一定的独立性，两者要通过商品交换相互联系。因此，商品交换形式和与之相联系的货币关系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极其重要的经济杠杆。”^①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以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为依据，并且由计划加以调节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既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利益，也照顾到各个社会成员的利益。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后有过不少头脑发热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共产党人，要求立即取消货币，废除经济核算制和实行直接的商品交换。列宁坚决反对这种“左”倾主张。他指出，不能“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②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和按劳分配才会消失。

^① 格·叶·格列泽尔曼：《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1973年莫斯科第2版，增订版第1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托派甚至对公路上交通安全的管理也加以反对，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在以无政府主义态度否定国家方面已经发展到何等地步。波萨达斯的说法是这样的：“是否需要由警察来管理交通呢？在资产阶级社会是需要的，因为在那里每个人想怎么走路就怎么走……。在工人国家中，交通管理则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他甚至要人们相信，不要警察也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居民自己可以把任何违法者逮捕起来送交地方政权机关。^①

在这些说法中很难说是无知还是幼稚所占的份量更大些。不过它们都是为了这样一个论断服务的：“那里”既然存在上述的那种机构，因此就不会有社会主义。

“实行没有警察和官僚的管理”，这是“争取重建第四国际”这个托派组织提出的口号^②。所谓“第四国际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组织则在1977年1月宣称，它反对“把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政权交给日后必然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各种机构〔国家、政党、工会〕”。^③

无政府主义的托派在这里着重反对的依然是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起领导作用这一主题。参加巴黎“联合书记处”的法国托派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早在1972年发表的《宣言》就鼓吹，革命后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阶级的政党不应有任何权力”。这个党可以处于不干涉政治和反对派的地位，其任务“不是管理，而是教育”，它“可以宣传自己的思想”，但“不

① 胡·波萨达斯：《苏联存在五十年的历史概况》，第12页。

② 《真理》，1971年第552期第44页。

③ 《在社会主义旗帜下》，1977年1月号第34页。

能抱有领导刚刚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的目的”。^①

托派并不是单纯地反对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起先锋作用，而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1969年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指出：“共产党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先锋队……实践表明，社会主义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利用新制度发掘出的巨大潜力首先取决于居于领导地位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取决于它们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能力。”^②

正因为这样，苏联人民一致拥护苏联新宪法第六条宣布的以下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共产党规定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规定苏联的内外政策路线，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计划性，并有科学根据。^③

苏联共产党宣布的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方针，也是托派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托派把这个方针说成是“不革命的”，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消费社会”。现代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要求。中央委员会1月29日和30日的宣言》(«Ce que veut la Ligue Communiste. Manifeste du Comité Central des 29 et 30 janvier»), 1972年巴黎版。

②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1969年6月5—17日于莫斯科》，第302—303页。

③ 参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1978年莫斯科版第7页。

托派的“理想”是所谓平均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贫乏得可怜的涵义，始终是颂扬普遍均等化和“分享贫困”。

从波萨达斯对“普遍平等”的描述可以看出，托派“理论家”关于“平均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已经混乱到何等程度。他写道：“谁都不应当拥有汽车。房屋不应属于任何人。衣服、鞋子等等，一切都要实行分配”。^①波萨达斯还企图把这种“毫无例外地普遍实行分配”的无政府主义要求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托派号召“消灭工资中的一切差别”，“取消一切等级”。^②他们把工资本身看成是“资产阶级形式”的劳动报酬^③，认为我们郑重公诸于世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托派宣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不平等都应铲除，分配也不例外，因为应当实行的是‘按需分配’的原则”。^④在这种说法中引人注意的是：第一，“各尽所能”的提法不见了。这再次突出地表明，托派极力想拉拢小资产阶级中间的这样一部分人：他们想入非非地认为，在无剥削的社会里似乎无需劳动，因为“想要的一切”都可得到分配将成为主要的原则。

第二，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篡改成一种“消费”公式。托派企图用这种办法使人相信，似乎共产主义会直接取代资本主义，尽管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证明，

① 《工人之声报》，1970年4月2日。

② 《红旗》，1971年4月10日和1971年4月25日。

③ 《工人斗争》，1971年4月15日。

④ 同上。

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由资本主义只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则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把社会引导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阶段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阶段，持续的时间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社会改造（包括培养新人的工作）的深度。

第三，托派关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说法是臆造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发挥能力的机会和从事劳动的权利。物质福利的源泉是劳动，而不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实现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同时它也在培养着一种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完全不同的劳动态度。除了保证消费品的极大丰富之外，自觉的劳动态度是向共产主义分配形式过渡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在这方面，恩格斯指出：“……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地全面发展、保持和运用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①

托派以及与他们联合行动的形形色色的“左”倾极端分子是这样推论的：只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保留着工资并且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雇佣劳动制度便继续存在。他们不想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按劳分配原则本身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不存在人剥削人的现象，凡是有工作能力的人都要劳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0页。

经验证明,只有坚持彻底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才会为实现下述的过程创造条件:“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以后,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实现以后……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①我们党的纲领强调指出,要到按劳分配原则的作用彻底发挥净尽之后,也就是当物质和文化财富极大丰富的局面出现,劳动成为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生活第一需要的时候,向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过渡才会最终实现。

至于因工作人员熟练程度不同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保留的工资差别,也失去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具有的那种社会意义。而且,通过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国家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拨发国家补助金,广泛实行社会保险,增加社会消费基金等等办法,工资差别正在有计划地逐步消除。1977年11月2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联合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强调指出:“诚实的劳动、高度的文明和思想道德品质,这一切决定着个人在我国的位置和尊严。个人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和道德提高的无穷无尽的源泉就在于此。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的最令人信服的表现就在于此。”^②

托派提出那些冒牌的理论论断,是为了诋毁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所取得的伟大社会成就。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257页。

^② 《遵循列宁的方针。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6卷第581页。

众所周知，七十年代在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了许多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左”倾的以及其他的“否定派”反对真实的社会主义。托派也连忙搬出自己的反动空想主义观点在他们的队伍中占了一席之地。但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正象它在历史上屡次表现的那样，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and 实践，同科学的社会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第九章

托派敌视反垄断和反帝运动

七十年代是作为资本主义各国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十年载入国际工人运动的史册。越来越多的劳动阶层卷入罢工斗争。罢工的参加者日益频繁地从提出经济要求进而提出政治要求。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威信，它作为保卫全民族利益的先锋队的作用提高了。它把广大的劳动阶层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且在一系列国家提出参与政治领导的要求。这一切在促使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深刻的质的变化，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反帝运动开创了新的形势。

各国共产党努力促进反垄断反帝运动的蓬勃发展，十分注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研究，引导群众认识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的必要性和以革命方式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问题。

提高群众的组织性和自觉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的革命多数派，并且使它无论在政治斗争相对“平静”发展时期，还是在阶级搏斗极其尖锐的环境中，无论在各国共产党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条件下，还是在接近于参加政府甚至已经参加政府的时候，都能积极地进行活动，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任务。

反垄断斗争的政治大军的形成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会出现不少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困难，其间可能出现高潮和低潮，进攻的热潮可能转变为积极性减退的局面。

不仅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且也捍卫全体劳动者的利益的无产阶级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是促使革命多数派形成的决定因素。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它的队伍的统一以及善于团结同盟军的能力，决定着反垄断大联合的广度和持久性。

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共产党人日益重视在革命运动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问题。马克思曾经谈到“**社会的过渡状态**”是由下述情况决定的：“一方面，社会目前的经济基础尚未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工人群众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强迫采取旨在最终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的过渡性措施**”。^①

各国共产党的出发点是：广泛的反垄断联盟，只有在提出可以团结大多数反帝力量的过渡性要求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如果一味想在最终目标的基础上，在纯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搞团结，便可能导致宗派主义，结果会把那些因其所处的地位不可能立即为社会主义奋斗，需要通过漫长而艰难的道路，在实践的教育下逐渐克服疑虑和动摇之后才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力量，排出革命运动。

过渡性要求既要照顾到每个阶级和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又要考虑到整个反对垄断运动的利益。提出过渡性要求，是为了把那些虽然反对垄断组织的专横，但是还没有认识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5页。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的人们也吸收来参加政治斗争。

葛斯·霍尔指出，反对垄断组织的斗争正在就不同的具体课题展开，其中有经济的、政治的和反战的课题，有争取公民权和争取民主的课题^①。卷入反垄断斗争的居民阶层日益广泛，他们有的是要争取取消垄断组织的独裁统治，有的则只想对之加以限制。

各国共产党指引劳动群众参加反对垄断组织的斗争，而目前并不提出使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这绝不是它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所说的“耍弄手段”和“欺骗各国人民”。群众自己会根据本身的经验认清，不仅有必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造，而且还必须以无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各国共产党从不隐瞒它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并且把建立社会主义视为自己的最高目标。

劳动群众看到共产党人的真诚、正直和既定目标的高尚，因此高度信任他们。正是由于这样，共产党人在法国的选举中获得的选票达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在意大利达到百分之三十三，在塞浦路斯约为百分之四十一^②。其他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也都在日益扩大。

反垄断力量的胜利促使帝国主义反动派采取措施（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以及社会心理的措施）以图自保。他们竭力阻挠反垄断运动得到巩固，分裂这个运动，破坏各国共

① 参看葛斯·霍尔：《革命的工人运动与现代帝国主义》，1974年莫斯科版第351页。

② 参看《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1977年第2期第20页。

产党的政治影响。

和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托派在这方面也是同最反动的势力齐心协力地行动。他们的需要虽然各不相同，但目的是一致的。

立场有假左派和右派之分， 标榜的是同一个“理论”

托派作为革命工人运动的众多的敌人之一，其特点是它既从假左派立场又从右派立场进行活动。所有托派使用的都是同一个思想武器，即托洛茨基的臭名昭著的“不断革命论”。大多数托派玩弄的是这个理论的一些极左观点。但是也有一些人以其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更加惹人注意。第三种人则在寻求中间立场；在托派营垒中他们被称之为“中派”。

胡·波萨达斯的追随者在托派的“左”翼中影响最大，在西欧和拉丁美洲各国都有这一类人。这一部分托派在容易受小资产阶级革命情绪影响的人们中间特别活跃。为了进行这种活动，这部分托派分子需要和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们混在一起。这些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只承认“直接行动”，并且把破坏社会秩序与反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混为一谈，把对人身的暴力与阶级的暴力等同起来，主张“放纵本能”。他们的信条是：“不断冲突的战略”，“不停地骚扰群众”。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所谓休克疗法，实行预谋的挑拨活动，才能“唤醒群众”。

为了博得倾向无政府主义的人的同情，这些托派分子千方百计地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辩解，甚至情愿把自己称为“极

左派”。波萨达斯宣称：“极左不是‘左’倾，也不是造反。极左、‘左’倾和造反反映的是不同的活动。它们有相同之点，但是极左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动的组织基础……极左派当然是有纲领的而且也有它的政策。”^①

波萨达斯这一番咬文嚼字的“探讨”，不用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一切语言中，“极左”（和“左倾”、“造反”一样）的概念都具有一定的否定涵意。重要的是指出另外一点。波萨达斯使人看清，他和他的信徒们不仅不属于谴责极左派的人，而且还公然“赞美”极左派，进而把自己也列为这一类人物。

波萨达斯并不掩饰他希望用这种手法把形形色色“左”倾团体的人士吸引到托派组织中来。他在比利时托派报纸《工人斗争》上写道：“左倾团体不断地丧失一部分成员，同时又补充进一批新人”。^②现代托派的另一头目阿·克里文则随声附和地说：“大学生可以象换衬衣一样地更换党，这对他们的学业和活动不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影响。”托派极其盼望有些人把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或毛派的“衬衣”换成托派的“衬衣”。

急躁情绪被奉为一种理论，“街垒战术”备受赞扬，到处在鼓吹“向社会主义飞跃”。在许多国家中，例如在西德，出现了“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

例如，帕布洛的追随者就把“用革命暴力的语言回答警察暴力”^③的口号当作武器。许多托派团体都同意“通过同警察冲突走向革命”的“左”倾方针。请看澳大利亚的马克思主义

① 《工人斗争报》，1973年3月1日。

② 《工人斗争》，1976年9月10日。

③ 《在社会主义旗帜下》，1970年第51期第18页。

者是如何评论该国托派的行为的：“造成一种对抗形势（不管找什么借口都可以）就会迫使当局诉诸武力，暴露出它真正的本质。他们认为这就是促使人们觉醒的途径。而且这样便会实现澳大利亚革命”。^①

这一类托派中间盛传着一个“座右铭”，即托洛茨基在《为恐怖主义辩护》一书中提出的：“任何一帮外行都代替不了一位专家。一群病人代替不了一位医生”^②。这里“一帮外行”指的是广大群众，而“专家”、“医生”指的是一小撮“左”倾分子。

硬说各国共产党只宣传和平革命途径而不考虑采用武装斗争方法的必要性，是“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惯用的宣传诡计之一。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革命和平发展，指的是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方面有可能建立起决定性的力量优势以阻止垄断资产阶级采取武装暴力。共产党人坚定地认为，在采取和平的革命发展方针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反动势力诉诸武力的可能性。

那种企图硬说共产党人总是希望资产阶级会似乎“不经过斗争客客气气地把政权交给人民”也是站不住脚的。无论革命采取和平途径还是非和平途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有强制的手段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形形色色的“左”倾分子相反，共产党人毫无消极等待“X日”到来的思想。

① 《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评论》，1972年第35期第11页。

② 引自《国际社会主义》，1960年第1期第23页。根据托洛茨基的这一说法，他的现代追随者也出来为无政府主义的恐怖行为辩护。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机关刊物《红色》周刊为恐怖主义者的行动发表文章，号召“无条件地支持”他们（《真理》，1973年第559期第124页）。

除了“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之外，也有一些人越来越倾向于右倾社会改良主义。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有自己的“思想家”，有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破坏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

在托派改良主义营垒中充当领袖角色的是厄·曼德尔。他常常伪装成“左翼”社会党人，并以这种身份参加各国社会党人举行的各种国际性活动^①。

仅仅从厄·曼德尔及其追随者在社会党人的队伍中实行“打进去”策略这个角度来评价他的主张未必是妥当的。从曼德尔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发表的许多书籍、小册子和文章来看，从反映曼德尔观点的许多托派组织的“纲领性”文件来看，他的主张已经超出了一般“打进去”的范围。

曼德尔自吹自擂地说自己观点“与时代并进”，并且对当代最迫切的问题作出了答案。

实际上曼德尔的观点的依据，是托洛茨基当年对帝国主义所做的投降主义评价。这首先指的是夸大资本主义制度的能力和对革命斗争作失败主义预测的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

他喋喋不休地一味重复这样一个思想：“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其发展的第三阶段。犹如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一样，这个阶段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即不同于列宁、希法亭及其他人所描述的帝国主义”^②。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也罢，非马克思

^① 曼德尔曾多次扮作比利时“左翼”社会党领导成员参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左翼”社会党人召开的代表会议。

^② 《新闻通讯》，1969年2月25日。批评厄·曼德尔的这家托派报纸给他

主义者也罢,在解释晚期资本主义方面全都失败了”^③。

1977年英国托派头子托·克利夫也发表过同样意思的说法:“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评价不可能是权威性的”^④。

曼德尔对现代帝国主义所作的“创新”的评价到底具有什么政治涵意,他常常使用的“新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中究竟包含着些什么货色呢?

资产阶级的和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是曼德尔的根本观点。来源于此的不止是“新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之类的术语。曼德尔积极地利用形形色色赞扬资本主义具有“新潜力”的思想,并以此冒充“新马克思主义”思想。例如,他鼓吹“新资本主义”表现出避免危机、自行调节各个企业乃至全国范围的生产关系的能力。曼德尔声称,这一切表现在大垄断组织过渡到实行投资的程序化和计划化方面。^⑤同时,他还指责各国共产党不愿意分析现代帝国主义正在发生的各种过程。

其实共产党人早已注意到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的许多最新现象。六十年代各国共产党举行的代表大会以及莫斯科的国际会议(1969年)都分析了当代帝国主义基于垄断组织与国家

的这段话加了一句挖苦的评语:“请您就这样理解吧——从前有过一位马克思,后来又有一位列宁,现在么,出现了一位……曼德尔”(同上)。

③ 厄·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E. Mandel. «Late Capitalism»), 1975年伦敦版第523页。

④ 《工人先锋》, 1977年9月16日。

⑤ 厄·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E. Mandel. «Marxistische Wirtschafts Theorie»), 196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558页。

机关日益紧密结合的事实而加以利用的那些新条件。生产的程序化和预测以及为了垄断组织的利益对市场自发势力实行一定限制的其他措施，都在共产党人的视野之内。

共产党人得出的结论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结论，那些人把国家垄断资本说成具有调节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以致使资本主义的许多特征似乎已经成为过去。这些思想家把注意力着重放在帝国主义为了自我保全而采取的个别措施上，“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先天的不治之症，不承认资本主义灭亡将是历史的必然。

勃列日涅夫在1969年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说：“毫无疑问，帝国主义今后仍将竭力寻找各种新的机会以延长它的寿命。对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不能不加以考虑。

但是，我们在谈论现代帝国主义的这些方面时，虽不低估敌人的力量和潜力，同时也认为对此不应作过高的估计。正是在当代，使资本主义不断削弱的种种深刻的、根本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首先是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表现得日趋尖锐。在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的压力下，资本主义的世界阵地将继续削弱。今天，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充分地暴露出它是一种社会不平等、民族不平等、压迫和暴力的制度……各国人民日益看清这样一种反常的状况：往往不止为一个国家服务的生产综合体，仍是一小撮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私有财产”^①。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1969年6月5—17日于莫斯科》，第45页。

曼德尔，乃至与他思想一致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观点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缺陷，在于他们把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工业生产上升的现象说成战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说成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的种种经济和社会课题得到解决的标志。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暂时现象被描绘成为资本主义的新规律。^①

曼德尔及其追随者凭借这种手法公然声称列宁错了，说列宁重视资本主义的腐朽而好象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复苏的可能性。其实列宁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指示。他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②。

尽管资本主义竭力争取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且采用了各种方法来调节经济，但是它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始终没有消除。“现在大家都看到，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编造的一个主要的神话，即现代的资本主义有能力摆脱危机的神话，已经破灭了”。^③

曼德尔观点的反革命投降主义内容，就表现在他——正如托派自己也指出的那样——企图“把斗争限制在纯经济领

① 曼德尔还为此受到过托派报刊的以下批评：“曼德尔实际上是接受了资产阶级关于‘经济增长’、‘工艺革新’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等全部经济的和社会学的谰言”（《新闻通讯》，1969年2月28日）。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42页。

③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资料汇编》，1976年莫斯科版第28页。

域”。还有一些托派这样议论他：“曼德尔教授是资本主义病床旁的助理护士”。

曼德尔鼓吹，资本主义会调节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劳动者的让步，从而避免发生最尖锐的阶级冲突。不仅如此，他还说，资本主义有能力在国际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缓和社会冲突的尖锐性。曼德尔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次会议上说：“企业家和在不同程度上服从他们的各国政府可以周期性地确认：在某个国家中过高地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或已达到的工资水平，破坏了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因此必须实行‘制动’、‘整顿’、‘保持分寸’和‘社会休整’”。^①

按照曼德尔及其追随者的公式，劳动群众的全部阶级斗争不过是：“提出要求——满足要求”，“再提出新要求——再加以满足”，等等。由于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潜力，所以劳动者的要求将得到满足而无损于有关各国的经济。

曼德尔死乞白赖地兜售这样一个思想：许多事情在不加剧社会冲突的情况下是可以做到的。他鼓吹：“资本家不会让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因为那样会引起劳动群众极其强烈的反应。”英国《工人新闻报》就这个问题写道：“换句话说，资本家有能力判断，在劳动群众允许的条件下他们可以让失业和

^① 《新资本主义。经济军事化。西欧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同盟和社会主义大学生同盟 1965 年 11 月 6—7 日会议记录》(《Neokapitalismus. Rüstungswirtschaft. Westeuropäische Arbeiterbewegung. Protokoll einer Tagung des Sozialistischen Bundes und des Sozialistischen Studentenbundes vom 6. u. 7. Nov. 1965》), 1966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89 页。

通货膨胀达到何等程度。”^①可见，曼德尔所构想的是一种“社会平衡”，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提倡的“社会伙伴关系”的翻版。

曼德尔的观点不是纯“学术”性的。它们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形形色色的托派组织都把他的观点当作武器。这里指的首先是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正如一些托派报纸所写的那样，“奉行的是曼德尔观点的逻辑，但是它并不承认这一点”。许多托派认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改良主义的党”^②，它非常“想成为美国的一个社会民主改良主义的党”^③。

美国托派与社会改良主义的结合已经达到如此地步，以致他们竟把托洛茨基也描绘成……为改良而奋斗的战士。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杂志《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企图证明，托洛茨基“主张成立为实行改良而奋斗的独立的社会主义运动，这种改良将冲毁资本主义政权并通过群众性行动导致建立直接向资本主义现状挑战的人民运动”。^④

可见，抬出托洛茨基是为了鼓吹社会改良主义的政策。社会主义工人党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不主张采用暴力办法的党”。例如，它就不参加未经官方许可的游行。

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竞争的美国托派“工人同盟”指责该党：“在迅速地丧失独立于资产阶级的最后一点标志”。^⑤伦敦

① 《工人新闻报》，1974年12月7日。

② 同上，1971年11月4日。

③ 《新闻通讯》，1972年第14期第2页。

④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72年第10期第24页。

⑤ 《公报》，1976年7月27日。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也宣称，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了保持一点点体面”，什么事都可以去干。美国托派企图用一种投降主义的、同时也是世界主义的言论来掩盖其怯懦的改良主义，说自己“在全世界的斗争开展起来的时候还将大显身手”。例如，1978年8月底，他们在纽约举行的纪念“第四国际”成立四十周年的集会上宣称，社会主义工人党政策的出发点是：“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一个国际体系，只有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消灭它”。由于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运动，所以托派号召“要学会忍耐”。

加拿大一些托派的立场亦大体如此。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按照托派方式推行社会改良思想的是所谓“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组织和依附于它的青年小组。在法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有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者。

曼德尔的同盟者和所谓的“中派”都反对共产党人提出的反帝斗争纲领，但是他们多少是从不同于“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立场来反对的。他们的立场接近于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后者也是力图把阶级斗争限制在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和右倾机会主义不同的是他们拿马克思主义进行投机，为的是表示自己“也是革命者”。

实际上所有托派的立场都是十分相近的。他们在诽谤工人阶级和诬蔑共产党方面，在败坏反帝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声誉以及破坏反帝队伍的团结方面都是一致的。

破坏工人阶级的战斗力， 臆造“新的革命先锋队”

二十世纪的革命实践清楚地表明，国际工人阶级在人类的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在不断提高。它在社会阶级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也在直线上升。

其原因不仅仅在于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广泛开展发生了日益明显的数量变化。列宁的这样一段话的正确性再次得到证实：“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神经，同时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利益。”^①

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对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阶级和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的言行都有巨大的动员作用。革命斗争的实践使劳动群众懂得，实现深刻的民主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实现的自觉的过程。

共产党人认为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在于，使工人阶级不局限于从事防御性活动，还要为不仅反对国家垄断制政策的后果，而且反对垄断资本统治的整个制度而斗争。而且，苏联著名的哲学家彼·尼·费多谢耶夫十分有根据地强调指出：“如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37—138页。

果一切工人阶级队伍都能实现其领导作用，那末资本主义早已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被推翻。如果资产阶级仍然统治着多数国家，这说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夺得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应属于它的领导地位，还未能把资本的全部反对者联合起来，而且本身也还有一部分处于资产阶级思想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①

此外，还有这样一个“规律”是引人注目的：国际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越大，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玩弄的骗术就越巧妙。为了使无产阶级与阶级敌人和解，为了迫使它放弃斗争，垄断资产阶级花费了数量空前的人力和物力。他们要工人相信自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比在其他社会制度下“生活得好”。如果说占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过去企图用枪弹和鞭子“打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那末现在则鼓吹阶级和平、社会和谐、社会伙伴关系等等。它号召无产阶级“为自身利益着想”不再做“捣乱分子”。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吹鼓手以妄想冒充真实，硬说无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阶级，已经“溶化”在日益增长的雇佣劳动大军之中。

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者也是这样干的。他们的相似之处，是都否定工人阶级促进革命的作用。他们在实质上是从不同的思想立场出发，走向同一目标——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潜力，瓦解它的队伍。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在各个托派集团和托派“支部”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都异口同声地提出过资本主义各国无

^① 《共产党人》，1971年第15期第78页。

产阶级“消极化”和“工人革命运动停滞”的论点。巴黎“联合书记处”在1969年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公开宣称“工人阶级士气低落”。美国托派则硬说，工人阶级“好象已经睡着”。波萨达斯在本集团的“代表大会”上声称：“无产阶级没有能力表现自己”。帕布洛的追随者扬言，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民运动推动下才能恢复活动。

“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是这样论证他们所编造的谣言的：由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各国都没有发生革命，不存在武装斗争和内战，因此，无产阶级被娇惯得十分懦弱，正在失去历史责任感。主张社会改良主义的托派则声称，工人运动处于停滞状态。他们对这一结论的论证非常简单：早在1918—1919年工人阶级就争得了八小时工作制；从那以后工作日再也未能缩短；我们看到的是“停滞状况”^①。

托派竭力不去理会国际工人阶级近六十年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毫无根据地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无产阶级越来越广泛地参加积极反对垄断资本的行动，社会斗争越来越具有灼热的政治性质。此外，他们还肆意夸大这样一些客观存在的消极现象：部分工人阶级中间存在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情绪（在这方面，厄·曼德尔谈到过所谓“思想普遍消沉化过程的危险”），他们易受资产阶级宣传的影响，对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造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缺乏认识。

^① 《新资本主义，经济军事化》，第85页。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有很大一部分阶层在行动时并不认识斗争的最终目的的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合乎规律的。他写道：“在一切国家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工人，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斗争，但是丝毫不了解社会主义，甚至还敌视社会主义”。^①不仅如此，列宁还认为部分无产阶级的观点和行为具有反动性是不可避免的：“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哪一种阶级斗争是先进阶级的一部分不站在反动派方面的”^②。

托派和其他“左”倾分子站在一起支持在青年运动的某些领域中相当流行的学生先锋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的拥护者认为，大学生不仅有能力自己解决自己所焦虑的种种问题，而且还有能力引导工人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社会阶层跟随自己前进。这种观点决定了大学生必然要搞分立主义和地方主义，使他们脱离天然的同盟者，鼓励搞冒险主义和信仰能够“点燃群众激情”的奇效的“直接行动”。这种做法带来的缺陷通常是，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失败主义，诽谤攻击工人阶级和“不受影响”的劳动群众。而且，学生运动还具有妨害社会公益的革命、没有阶级领导和阶级目标的革命的性质。

“学生骚动”和“青年造反”，只有在它们成为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先锋队所领导的阶级搏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条件下，才会对资本主义形成真正的危险——这一阶级斗争经验被别有用心地丢在了一边。青年在革命斗争中一贯起着显著的作用。但是革命是阶级斗争，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参加者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241页。

② 同上，第30卷第15页。

的年龄，而在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在于他们能否团结在当代最革命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周围。

托派煽动冒险主义情绪，打算把学生说成是世界范围的革命斗争的领袖。伦敦“国际委员会”声称：“青年不仅可以领导英国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且也可以领导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巴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则向大学生们说：“你们就是工人”。正如日本共产党《赤旗报》在1973年3月4日指出的那样，托派在各大学鼓吹“大学生在接替工人阶级”。

托派一方面把“左”倾激进主义青年颂为“新的先锋队”，另一方面把他们自己视为这个“先锋队”的领导者。法国的一个托派组织“共产主义同盟”在它的行动纲领中就是这样表述的：“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新的革命先锋队中成为领导者”。

近来托派队伍就以下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对“青年革命先锋队”的赞颂是否太过份了，这样做是否意味着放弃了“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系列原理。在这方面，人们想起了托洛茨基的这样一段话：“如果由此引伸出先锋主义的理论，即引伸出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是青年组织注定负有进步使命的理论，则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争论并没有使托派的立场发生根本的变化。许多托派依然宣称青年在现代革命斗争中起先锋作用。

此外，托派当中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把“第四国际”宣传活动的重心转向青年工人队伍，而不是面向青年学生。青年工人政治经验不足，而且由于对自己艰难的经济状

况（因技术不熟练工资很低，失业率比年龄较大的人高，在大量解雇或大量裁员时受到厂方格外无理的待遇）日益不满往往采取“左”倾的轻率行动。对于这些情况，托派则极力加以利用。青年当中也有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抱有成见。托派奉行的是“通过青年接近老一辈工人”的口号，竭力在工人阶级当中扩大破坏活动的范围。

除了“青年先锋队”之外，托派还“发现”了一个所谓“新的群众先锋队”。请看他们是如何设想的：“这个新的群众先锋队，简略地说，就是在行动上不受传统的官僚主义领导对群众运动的约束，并在群众运动的左翼从事活动的势力的总称。同时这里指的也是一些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非凡人才，因为其中包括了青年、工人阶级、妇女界的激进化阶层……”。

可见，加入托派所发明的“新的群众先锋队”的条件只有一条：不同意各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与它们划清界限或进行斗争。托派的“先锋队”无非是分裂反帝力量的一个工具。

托派自己承认，在他们的“先锋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并不因此感到难为情。他们还认为，“把这支先锋队变成一种与经过改造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同的工具”，这个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么谁来对“先锋队”和工人运动进行“改造”呢？看来，还是这些托派。他们提出的目标是：“为在新的群众先锋队中建立马克思主义革命〔？〕政治领导权而奋斗”。^①

按照托派的理解，“把运动改造成无产阶级的”只有一个

^① 《第四国际》，1974年第16—17期第32—33页。

意思，即把运动的矛头转向各国共产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托派再一次扮演了鼓吹始终反对和仇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小资产阶级挑衅行为的吹鼓手。

并不是所有的托派都赞同“两个先锋队理论”。许多托派仍然只承认一个“青年先锋队”。他们的宣传材料依然是连篇累牍地申明，“只有正在斗争的革命青年能够训练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青年将引导工人进行最后的战斗”。

所有的托派组织在反对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各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垄断行动纲领方面也是一致的。这一点在它们提出的“构想”中表现得格外清楚。

“政治道路堵塞”论

“第四国际”各集团的头目继续编造各种各样可以称之为“反理论”的“理论”，为把列入“新先锋队”的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建立思想基础。这些理论的用途，是对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基础的思想提出异议。托派的伪理论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败坏反垄断改革斗争的声誉；诽谤现有的反帝斗争形式和方法，鼓吹宗派主义涵义的“包罗万象”的斗争形式；利用冒险主义的口号甚至公开投降的思想破坏反垄断联盟。

托派在思想方面攻击的目标是各国共产党制定的经过科学论证的反垄断斗争纲领，这些纲领既照顾了工人阶级和各行各业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又展示出今后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前景。

托派一如既往地反对各国共产党提出的先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开展争取深刻的经济政治改造的斗争，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他们宣布“革命过程不可分割”，以否定共产党人作为当前的目标提出的建立反垄断民主政府的要求。

在这方面，看看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评论托派政策的言论是很有趣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施吕贝尔斯在对德国企业家讲话时说道，德国共产党“在它的计划中宣布，作为第一个阶段要争取使工人参加管理生产，争取在企业中实行更广泛的民主，争取高等学校民主化，争取用民主方法通过决定，争取实现社会公正等等。这里所谈的绝大部分是民主力量也提出的一些要求，而且其中有些要求反映的是近百年来一直激动着许多人的人道主义意愿。但是只有德国共产党是仅仅联系着它关于当前目标和最终目标的构想来看待这些任务的。这正是德国共产党与毛派和托派的区别。这两个派别从不晓得有这样的第一阶段，而号召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做收效甚微，并使它们陷于孤立。”^①

共产党人从不忘记列宁的这样一段话：争取一般民主的要求“无论何时，无论在何种情形和何种条件下，都是不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的。恰恰相反，它们总是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为它扩展基础，吸引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新阶层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领导的反垄断运动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和新的目标，吸引

^① 引自京特·魏斯的文章：《“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反动观点》，载《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论文集第9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6页。

着越来越多的劳动阶层参加斗争，这一事实十分明显地证明列宁的结论是有根据的。

“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硬说，反帝斗争的纲领诱使无产阶级放弃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溶化在其他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利益之中。托派还指责共产党人“零敲碎打，而不把斗争集中在一个点上”。

他们在这里指责的是共产党人动员广大劳动群众起来反对垄断制。在他们看来，斗争应当立即发展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这里也表现了“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思想。例如，法国托派在1978年7月宣布，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保证劳动者的要求得到满足。凡是由于种种原因反对垄断组织的霸权、但是还不情愿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的人，托派都想使他们“断绝”积极的政治活动。

在回答“反垄断斗争是否偏离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问题时，葛斯·霍尔写道：“这取决于从怎样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只是反复喊叫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空洞口号和动听的空话，而且从这样的立场来看待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当然也可以不去理睬生活中实际存在着垄断组织占居统治地位的现象，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垄断组织，垄断组织就是资本主义’……如果把社会主义道路看作是群众围绕着最迫切的问题进行的斗争，看作是使群众学会认识他们真正的阶级敌人，认清他们自己的阶级力量并且使他们根据亲身经验得出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的结论的斗争，那么反对垄断斗争便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①托派的推论是非常简单的：资本主义

^① 葛斯·霍尔：《革命的工人运动与现代帝国主义》，第350—351页。

在历史上已经过时；它是能够而且应当消灭的；不要求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依据的这种前提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列宁在回答“左派”的这一类论断时曾强调指出，不应把这种或那种社会现象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已经“过时”和从具体的实际政治角度来看已经“过时”混为一谈。^①

托派故意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的成熟，同在这样或那样条件下客观上产生的革命形势混为一谈，同资产阶级已经无法按照老样子实行管理，工人阶级也不能按照老样子生活下去的实际情况混为一谈。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早已存在，但是它不会自动地导致革命形势，而且大家知道，形势本身也不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中任何时候都能“实现”的。

列宁曾经指出：“……某些个人或集团常常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特点或某一‘教训’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②

托派依然象在战前年代那样宣称，现代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是不可逆转地沿着压制民主自由和法西斯制度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发展的。胡·波萨达斯扬言：“欧洲资本主义不得不建立法西斯政府以克服它的危机”。^③英国托派于1977年2月声称：“统治阶级现在准备以军事手段推翻议会民主”。^④与此同时，法国托派也预言法国和西班牙正在走向建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93—394页。

③ 《工人之声报》，1972年9月12日。

④ 《新闻战线》，1977年2月22日。

立军事独裁：“现政权除了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波拿巴主义便不能存在下去”。^①

半个世纪以来托派一直以法西斯必然上台来恐吓资本主义各国的劳动人民。然而现代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和经验证明，法西斯制度是注定建立不起来的。与取消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社会生活法西斯化的趋势（毫无疑问，这是垄断资本的政策的重要特征）相对立的还有另外一种趋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制止向右转的能力日益增大。

战后时期，人民群众不止一次地回击法西斯主义。秘密军队组织的反动计划便遭到了破产。在意大利、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一系列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在胜利地对抗法西斯的进攻。

同时，共产党人也清楚地看到，在反社会主义运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旨在加强反动势力的行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法西斯危险增大的令人忧虑的现象。

正因为如此，各国共产党从未停止反法西斯斗争。1976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柏林会议也指出有必要对法西斯阴谋保持警惕。

托派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必然蜕化为法西斯主义的构想，是为提出一份独特的“革命的哀的美敦书”服务的。托派要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劳动群众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是法西斯，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例如，英国托派宣称：“选择就是这样，要么让残酷的法西斯专政把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压垮，要么建立

^① 《真理》，1977年第575期第54页。

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①西德的托派还威胁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如果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前途是黑暗的。他们断言：“问题非常明显，二者必择其一：或者是工人阶级推翻这个资本主义的政府并夺取政权……或者是资本家今后继续利用这个政府来建立实行新的劳役制和新的集中营的新法西斯专政”。^②

由此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些西德托派答道，必须“坚决摒弃”一切争取实现一般民主要求的斗争，因为它“诱使人们放弃基本目标”。不仅如此，“革命的利益”要求把反对共产党人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使无产阶级迷失方向，使资产阶级民主更“便于”转变为法西斯主义^③。

托派号召“集中火力”攻击各国共产党，在客观上是在为帝国主义反动派以及为在某些地方急于夺取政权的法西斯分子效劳。

对资本主义作的主观主义的解释孕育着危险的政治后果，所谓的“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他们提出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劳动人民的处境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的投降主义论点中，也在重复这种主观主义的解释。英国托派对厄·曼德尔的反对论点表示异议，他们宣称：“在英国根本没有可

① 《新闻战线》，1976年7月24日。

② 《火花》，1976年5月1日。

③ 被他们当作“论据”的是1940年托洛茨基在《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一文中提出的论点：“资本主义之所以有可能转向法西斯主义，仅仅是因为无产阶级未能及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法西斯制度的建立就竟成了无产阶级、当然还有它的先锋队——各国共产党的“过错”。

能实行任何改革”^①。法国托派则随声附和地说：“长时间地实现居民的要求，是资本主义社会力所不及的”。^② 1976年西德托派在五一《宣言》中宣称：“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任何一项‘法律’也不能保证提供哪怕是一个就业位子”。^③ 波萨达斯则在1978年对英国的状况作了如下评述：“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政府，已经都不可能再向劳动人民提供任何东西。”

“不要白费力气了”——这就是“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实质上向争取实现一般民主要求的劳动人民发出的号召。在这里，他们利用的论据是这样的：垄断组织在全部抹煞工人阶级赢得的让步，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争取提高工资是毫无用处的。

“一切成果都在化为乌有”的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把七十年代工人阶级的状况与战后相比就不能不承认：由于同垄断资本进行了紧张艰苦的斗争，工人阶级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

反对垄断组织的斗争本身的发展，当然不会是直线上升的。垄断组织常常转入攻势和反攻势。劳动人民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即为明证。

共产党人也在谈论这种现象。但这不是要使劳动人民感到没有出路，而是要激励进步力量去积极行动。

托派的“资本主义能力有限论”，是同垄断组织及其思想帮凶向工人灌输的东西完全合拍的。垄断组织及其思想帮凶

① 《新闻战线》，1976年8月2日。

② 《工人斗争》，1976年4月17日。

③ 《火花》，1976年5月1日。

声称，争取提高工资是没有作用的，因为工资每提高一美分、一分尼和一生丁，价格也自动地随着上涨。甚至出笼了一种“工资——价格螺旋论”。为了掩盖价格上涨的社会内幕，隐瞒依靠通货膨胀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垄断组织企图让人们相信提高工资的要求只会危害国家。英国“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早在1973年就曾宣布：“英国的资本主义也和世界资本主义一样，在阶级斗争方面的妥协解决办法已经达到极限。”对垄断组织唯命是从的报界则利用英国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也进行这样的宣传。这些都是向劳动人民暗示，任何经济让步都将影响到国家的竞争能力，影响到它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托派的方针在实质上就是要收缩劳动人民保卫民主权利的行动。而垄断资产阶级所追求的难道不正是这一点吗？

托派立场所依据的是臭名远扬的“越糟越好”^①的论点。由于不相信群众的革命能力，托派便寄希望于大动乱，寄希望于激发人民起来斗争的非常形势。他们以此为自己在思想和政治上的软弱无力辩护，为规避群众斗争辩护。

托派始终认为，群众的经济状况越艰难，他们接受革命思想的能力就越强。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在“美国和西欧工人的生活水平由于巨大的经济危机而一落千丈”^②的情况下，革命便展现出良好的前景。伦敦“国际委员会”也宣布说，危机“在

^① 格·瓦·普列汉诺夫就曾批评过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民粹派的这一“原则”。民粹派认为：“坏事只要发展到极端就会导致好的结果”。（《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五卷集第1卷，1956年莫斯科版第94页）。

^②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3年第4期第123页。

打破原状，并将开创革命形势”^①。英国托派则急忙宣称，只有他们“拥有应付危机的社会主义纲领”。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经济危机并不是都能引起革命。而真正的革命者无论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都要进行斗争。

所谓“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七十年代加紧宣传准备内战，这种行动清楚地表现了他们的投降主义路线。他们鼓吹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占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需要它。

伦敦“国际委员会”断言：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的统治集团已经有了“发动内战”的计划，而且计划已在“共同市场”领导机关“通过”。^②胡·波萨达斯在评述西欧的政治形势时也认为，“事态在向内战发展”。^③他声称应当欢迎这样的事态进程。“不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并立即转入内战，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④。意大利托派则断言，本国的资产阶级“需要”一个“采取内战方针的政府”。^⑤

毫无疑问，垄断资产阶级有可能对革命势力实行武装镇压。垄断资产阶级的最反动分子在酝酿一旦革命胜利便发动内战的计划。这是不是说事态一定会按照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呢？共产党人一方面使群众注意反动

① 《工人新闻报》，1974年12月9日。

② 《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1973年第2期第112页。

③ 《红旗》，1975年5月13日。

④ 同上，1975年9月5日。

⑤ 《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杂志》，1972年第7期第5页。

派采取这种步骤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号召他们采取有组织的、团结的行动阻止军国主义势力诉诸武力。

共产党人清醒地看到,能不能避免内战,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新社会的面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如何实现,是经过内战还是不经过内战——这个问题不会不影响到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社会民主化的程度以及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

在这个问题上托派的冒牌革命家和指责共产党想发动内战的反动势力也是不谋而合的。劳动人民反而被说成具有这种想法,即必须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才能消灭资本主义。

托派的逻辑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政治局势每一次紧张化都是接近内战的一步。他们声称:“一切战争都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点应用于使社会分裂为势不两立的营垒的内战尤为正确。”^①

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印象,好象斗争越是广泛开展,社会就越接近内战。原来他们这是从资产阶级的宣传里以及从那些自封为革命家的人那里听来的。关于必须在不致引起对抗的“一定限度内”开展斗争的说法,便是由此产生的。

那么托派建议怎样“准备内战”呢?西德“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意见是这样的:“阶级搏斗越是激烈,武装自卫便越成为工人政策的抉择……”^②葡萄牙托派则在1975年3月宣称全国已经出现上述的时机,并号召实行“劳动人民普遍武

① 《战斗者》,1977年7月29日。

② 《做什么》,1974年5月号,增刊。

装”^①。

有些人希望，事态如果演变成内战，会使各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削弱，使各种非共产主义的“激进”组织的影响得到加强。例如，美国就有一个托派小组在1977年7月扬言，内战将加强“激进化的群众”对各国共产党的“压力”，各国党则会在这种压力下“疏远苏共”。^②

当“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待一般民主斗争的态度受到批判的时候，他们总是装出一副“不解”的样子。这些托派声称他们也规定有一般民主的要求，并且援引托洛茨基在1938年制定的并且为“‘第四国际’各集团”公认的“过渡纲领”为证。

从他们所作的解释可以看出，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他们提出的“过渡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美国的托派这样写道：“在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和对工业实行工人监督而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应当经常想到，所有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③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要求如果全都无法实现，那么它们的“过渡”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它们到底还有什么价值。

如果说“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主张立即进行内战，那末改良主义和中派各集团则提出以“稳妥的办法”进行斗争。这些派别分子的办法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当年马克思就曾进行过批判。他写道：“宗派认为，它存在的权利和它的名誉不在于它自己和阶级运动有共同之处，而在于把它和阶级运动

① 《第四国际》，1975年第20—21期第29页。

② 《战斗者》，1977年7月22日。

③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73年第2期第22页。

区别开来的特殊的护符”。^① 这样的“护符”托派有不少，每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护符”。

例如，加入伦敦“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托派们多年来一直坚持说，只有工人占领企业才是“对垄断组织唯一有效的回答”。他们声称，“不把主要企业全部占领就不能保护劳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托派的五一游行口号就是：“占领工厂，为剥夺工厂而斗争。”^②

巴黎“联合书记处”的“理论家”邦萨伊德在《革命与政权》一书中断言，“通过工人立即在企业夺权”便可以结束资本主义。他说：“建立了新权力的企业，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企业，即不再是异化劳动的体现”。^③

巴黎“联合书记处”的其他支持者以及其他国际托派集团的拥护者，也同样鼓吹这样的“立即行动”。

“帕布洛派”有一把解决工人阶级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他们主张“立即建立起以自治为基础的工人政权”，并批评其他各托派集团没有在纲领中提出这样的口号。“帕布洛派”宣称：“我们为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在一切领域和一切水平上民主地组织社会，为这个社会的生产者和公民直接实行自治而奋斗”。^④ 其他托派组织说这种要求是半无政府主义、半改良主义的。法国托派的《红色》周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1页。

② 《火花》，1976年5月1日。

③ 达·邦萨伊德：《革命与政权》(D. Bensaid, «La révolution et le pouvoir»), 1976年巴黎版第259页。

④ 《在社会主义旗帜下》，1976年12月—1977年1月号第34页。

写道：“自治不外是为了掩盖转向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而想出的一种卖弄风情的骗术”。^①然而倾向《红色》周刊的托派也有他们的“灵丹妙药”，即“工人自卫”；一切其他斗争形式都被说成是“站不住脚的”。

在托派的武库中还有一种“最可靠的斗争武器”，即“立即造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他们说：“工人阶级应当在企业中造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②1974年，巴黎“联合书记处”召开的代表大会宣布，两个政权并存是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由工人建立起第二个政权机关，用武器把他们装备起来，是自卫的手段，是群众及其代表机关夺取最大限度的决定性物质‘保证’（交通、运输、工具、银行、工业机构）的手段。”

托派的这些药方反映出他们的无原则性，并且很象罗·卢森堡谴责过的方法。她曾经提出，斗争形式不能“象热灌肠或冷灌肠那样从历史的餐台上任意选择”^③。

真正的革命家遵循的是列宁的指示：“采取哪一种斗争手段不取决于革命家事先的决定，而取决于……客观条件。”^④列宁强调指出：“如果资产阶级的策略始终是一个样子，或至少是一个类型，那工人阶级就能很快学会同样地用一个样子和一个类型的策略去对付它了”。^⑤

非常清楚，托派由于持宗派主义的立场，所以敌视建立广

① 《红色》，1975年6月27日。

② 《工人斗争》，1969年1月10日。

③ 罗·卢森堡：《是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959年莫斯科版第70页。

④ 《列宁全集》，第13卷第74页。

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395页。

泛的反垄断联盟的思想。他们反对反垄断联盟，和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后半期反对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时一样执拗。“第四国际”各个集团纷纷发出按照“绝不支持人民阵线！”的“传统”行动的号召。

为了寻找反对建立反垄断统一战线的借口，托派提出了一个“论点”说这一口号不适合当前的局势。例如，他们宣称，各国共产党以建立反垄断统一战线为目标，因而“把运动拉向大倒退”。

实际上正是托派自己想把革命运动从他们已经取得的阵地上排除出去，塞进一些在形式上“左倾”而在内容上投降的阶级斗争“药方”。他们主张只实行“阶级反对阶级”的政策。

大家知道，“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是有它的来历的。在二十年代后半期，这个口号曾被用来武装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口号的使命是奠定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和提高它的战斗力。同时还提出了揭露社会民主党上层的妥协政策，使工人阶级摆脱改良主义幻想的任务。

但是在实际执行“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的过程中犯了某些宗派主义的错误。譬如，当时就没有把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和一般成员区别开来。结果便取消了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因为把他们都看成了“资产阶级工党”或“资产阶级政党”。此外，同非无产阶级的各劳动阶层建立合作关系，也由于这一策略而陷入困难。^①

^① 参看：《共产国际。简明历史纲要》，第284—285页。

托派之所以主张在今天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援用“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是因为看到这个口号的主要可取之处恰恰在于,它在实际执行中具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性质的一面,以及给团结一切反帝力量的事业带来一定损失的一面。

托派不愿意考虑现在反帝运动的基础已经扩大的明显事实。无产阶级的重大切身利益与整个社会面临的极其巨大的经济政治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加强了。在目前条件下,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主张全民族的进步和动员社会上各个进步阶层起来反对垄断组织压迫的力量,它的这种历史作用现在表现得格外明显。

同时,工人阶级并没有丧失它的本来面目,也没有象托派所说的那样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溶化在一般民主运动之中。恰恰相反,它在唤醒各个被剥削阶层的人民参加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为完成它领导革命运动的使命,为提高本阶级各个组织的积极性和战斗性,为实现使劳动人民摆脱剥削的伟大目标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贝林格说道:“在工人阶级的联盟政策中,应该表现出工人阶级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解决涉及各大社会阶层并促使它们联合起来的重大问题,表现出工人阶级有能力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斗争,指出符合全国绝大多数居民的愿望和利益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的目标,而且还有公民权和民主的发展的目标)”。^①

托派粗暴地歪曲事实,他们以智利事件为例,声称那里的

^①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75年3月18—23日于罗马)》,1976年莫斯科版第308页。

事态证实了民主力量广泛联盟的政策是站不住脚的。然而，正是智利事件证明了工人阶级必须加强这种联盟。

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霍尔赫·英森萨在《革命之路》一文中强调指出：“毫无疑问，关键的问题……在于工人阶级要争取实现磐石般的团结，在它的周围并以它为首建立一个包括以农民为主的中间阶层以及在智利有很大社会势力的城市广大中产阶层的巩固联盟，并使民族资产阶级保持中立……工人阶级必要的和可能的同盟者是非常广泛的。但是这种可能性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事与愿违，在革命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实现变革的时刻，工人阶级明显地处于孤立状态，这正是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上述的一切并不能否定，工人阶级已经争取到一些有影响同盟者的事实，但是它远未得到足以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必要数量的同盟者”。^①

正如智利共产党人所指出的，对于事态的这样发展托派也是负有罪责的，他们和其他极左分子一起破坏人民的团结，执行了一条在政治上孤立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路线。不是无产者或半无产者的人，都被他们说成是“阶级敌人”。整个资产阶级毫无例外地被他们当作“统治阶级”。他们到处挑起与中小企业家的冲突。没有重要经济意义的企业也被占领。

托派和类似的“左”倾分子对保卫人民政权的成果问题表现得满不在乎。阿连德政府被说成是改良主义政府。受革命空话影响的落后劳动群众卷入了反政府的斗争，在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这些活动为部分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产阶层

^①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7年第5期第61页。

代表人物的法西斯化，为加强他们的反对派情绪提供了培养基。^①

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深入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运动，托派极力改变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形式和方法以适合现代要求。

两面派策略

近来有些托派声称他们放弃了“打进去”策略。其实不然。“打进去”是“第四国际”各个集团的长期策略。各个托派小组补充的人员大都是它们从其他组织中骗来的。例如，美国托派的“青年社会主义同盟”有百分之三十四的成员来自各个大学生组织，百分之十七来自反战组织，百分之十三来自各种妇女团体。^②这说明托派的“打进分子”长期以来始终在进行他们的宣传劝说工作。

托派头目布利克一詹金斯就依然寄希望于实行“打进去”策略，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留在工党内部好，离开工党不好”。^③1977年2月英国工党的领导不得不把一些托派“打进分子”开除，因为他们想建立“党中之党”。^④

但是，现代托派的头目们不得不考虑“打进去”策略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以及在被托派选作阴谋打进对象的组织中

① 详见《革命的教训和前途。智利来信》一文，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杂志1974年第7期第57—64页。

② A·K·赫尔曼：《托洛茨基主义。号召到基层去》，第51页。

③ 《工人新闻报》，1974年11月2日。

④ 《新闻战线》，1977年2月10日。

都遭到了揭露。“打进去”策略要求口是心非、狡猾奸诈和周旋搪塞。在参加托派队伍后第一次遇到这种要求的青年中间，这个策略是令人不解和不受欢迎的。

“第四国际”的领导人总是力图证明，“打进去”并不是什么丑事。波萨达斯在他写的一本小册子中甚至把托洛茨基的这个策略强加在……布尔什维克头上：“他们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实行‘打进去’政策”^①。他接着说，秘密的方法从来都是革命者的武器。

波萨达斯的这些“理由”是建筑在沙滩上的。采取秘密方法不是为了消灭剥削制度，而是为了从内部瓦解和破坏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和劳动人民的联盟，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算是革命者。托派的破坏活动同那些为进行特务活动钻入民主团体的领取报酬的警察奸细的行径是一样的。

“打进去”策略的声名狼藉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致许多托派团体宁愿不再象过去那样大吹大擂地宣传它们在执行这个策略。不仅如此，有些人还公开宣布他们已经放弃了它。但是莱·斐盖尔指出：尽管公开的声明是放弃了“打进去”策略，但是，“只要有机可乘和有利可图，托派还是伪装起来力图渗入各种群众组织、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青年组织”。^②

现在托派越来越重视公开的、当众表演的活动，即打着自己的标语口号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参加竞选运动并提

^① 胡·波萨达斯：《工人国家的结构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国家》（J·Posadas, «La construction de l'Etat ouvrier, et de l'Etat ouvrier au socialisme»), 1970年巴黎版第58页。

^② 《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第82页。

出自己的候选人，散发不匿名的宣传材料而且还写明材料作者的“通讯处”，托派的头目和思想家通过资产阶级报刊和广播电视发表意见。

采取积极公开活动的策略，与大多数托派团体改变了对竞选活动的态度直接有关。直到六十年代末，托派只要看到“议会选举”、“总统选举”的字样便暴跳如雷，而且指责所有参加竞选的左派人士的“议会狭隘性”。“我们的武器是街头斗争，不是选举运动”，“劳动者的权力在大街上，不在投票箱里”。^①托派把形形色色的“左”倾分子称之为“最坚定的战士”，因为其中有许多人号召在各选区放火以表明对选举的态度（“与其选进议会，不如烧光议会”）。

可是阿·克里文在1969年又突然提出由他充当法国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从那时起，法国托派便参加了总统竞选、议会选举和市政选举。

托派很想把各种接近“左”倾以及对法共纲领持否定或观望态度的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托派的利益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垄断资产阶级不择手段地力图减少左派人士应得的票数。

托派是带着反共的行动纲领去参加选举的。他们一面高喊为掌权的资产阶级效劳的口号——“不支持共同纲领”，一面大唱对资本主义毫无危险的“左”倾高调（“解决办法只有一条——革命”）。托派改良派最关心的则是败坏共产党人提出的过渡措施纲领的声誉。

^①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8年第4期第3页。

法共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手册》这样评论托派和其他“左”倾分子的选举策略：“在现阶段的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全民斗争中，‘左’倾政策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是除了为资产阶级之外不会为任何其他阶级服务的疯狂反共的改良主义”。^①

使垄断资产阶级感到满意的是，当反动势力与民主势力在全国展开极其尖锐的斗争的时候，当成立左派势力的政府已经开始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托派和其他“左”倾分子把一部分选民拉到自己方面去了。尽管支持托派的选票所占的比例无足轻重，但是资产阶级对这样的支持是善于珍视的。

托派分子克里文在1969年总统竞选中只赢得了二十三万六千张选票，勉强超过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一^②。在1974年同样的选举中托派已有两名候选人，即克里文和拉纪埃，他们共获六十九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二点七^③。

有时放在政治天平上的选票只占不大的比重，却可以起引人注目的作用，托派和其他“左”倾分子都不掩饰他们有意利用这一点。D·科恩-本迪在1975年发表的一本书中这样写道：“如果极左派在选举中能保证拿到百分之二——三的选票，那末他们便有可能影响选举的结果，因为左派势力或右派势力的候选人只要有微弱的优势就会获得选举的胜利”^④。

在1977年的市政选举中，托派连同其他“左”倾分子在巴

① 《共产主义手册》，1976年第1期第57页。

② 《人道报》，1969年6月3日。

③ 《共产主义手册》，1976年第1期第57页。

④ D·科恩-本迪：《一出大闹剧》(D. Cohn-Bendit. «Le grand Bazar»), 1975年巴黎版第100页。

黎的某些区得到了百分之二点七至百分之三点三的选票，在里昂得到的选票超过了百分之五^①。克里文在评述选举结果时声称，“极左势力”的代表从未取得过这样的成绩。

在总统选举中多次提出候选人的美国托派吹嘘说，在竞选期间有十万多人听过他们的讲演。

尽管如此，托派对于选举仍和以往一样持鄙视态度。上述的那位克里文就曾无耻地讥笑过所谓“权力票箱”。对托派来说，争取新选票象是一场狂热政治赌博。他们承认，投给他们的是“丢掉的选票，无用的选票”。比利时托派报纸《工人斗争》在评述该国过去的选举时就是这样描述的^②。

但是，丢掉这些选票的主要是民主力量，决不是反动势力。据法国资产阶级报刊报道，1974年在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支持托派候选人拉纪埃的选民，有百分之二十四在第二轮投了右派势力候选人的票。

此外，在托派破坏手段的“新作”中还应指出七十年代出现的“批判地支持共产党人”的策略，这是“打进去”策略的变种，它的内容和目标还是托洛茨基规定下的。1940年6月托洛茨基在和美国托派的一次谈话中说服他们改行“批判地支持”各国共产党政策，以便接近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托洛茨基指教他们说：“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相信我们和他们有共同语言，我们就能使他们转向反对他们的领导人。即使我们把百分之五的人吸引过来，那个党也会垮台……瓦解的过程是一定会开始的”。托洛茨基把自己的这个建议叫作使共产党人措

① 《人道报》，1977年4月22日。

② 《工人斗争》，1976年11月1日。

手不及的“暂时策略”。

现在，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托洛茨基信徒（主要是波萨达斯和帕布洛的支持者）也都宣布要“批判地支持共产党人”。波萨达斯就这一策略向所属“支部”发出指示说：“应该在各国共产党……内制造危机”。^①他还就具体做法作了如下说明：“我们应当使用我们现有的一切方法在共产党后方进行活动，以唤醒普通党员对其领导采取批判的立场，并毫不迟延地进行必要的变革。在各国共产党内需要改变的东西很多。原来的领导应当全部排除”。^②此外，他有一本小册子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现在的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在各国共产党的后方进行斗争”。^③

向各国共产党偷偷散发的宣传材料着重强调托派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许多托派小组自称“革命共产党”。

有些托派不择手段地破坏反帝战士的团结，在七十年代耍出了这样的诡计：他们开始在一些地方采取拥护反帝统一战线立场，甚至宣布“愿意”参加。他们指望利用这种办法为向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队伍灌输宗派主义观点创造有利条件。这就是说有些托派为了破坏反帝战士的团结制定了一些更加灵活机动的方式和方法。

① 《工人之声报》，1972年7月30日。

② 《工人斗争》，1973年3月1日。

③ 胡·波萨达斯：《工人国家的结构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国家》，第4页。

美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政治》月刊在揭露托派“愿意”和各民主组织团结的真意时着重指出：“当他们谈论和这些组织‘团结’时，他们脑子里想的是钻进这些组织，破坏并搞垮它们”^①。

和过去一样，托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力图利用各国共产党内发生的一些极其微小的意见分歧。

托派就是这样竭尽全力地寻找新的机会分裂国际革命运动。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摸索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进行这类活动的新形式。

^① 《政治》月刊，1969年第9—10期第52页。

第十章

托洛茨基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

七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新的卓越胜利。“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等!}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①——列宁的这段话正在实现。

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针对性在增强,具有越来越明确的反帝性质。这必然会导致帝国主义统治基础的日益削弱。

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越南恢复统一和宣告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象苏共中央在第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指出的,越南的胜利为整个东南亚开创了新的前景,将永远载入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史册。②

一批新的进步国家的诞生,是亚非人民解放斗争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安哥拉人民的胜利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成为推动整个非洲大陆反帝斗争的新动力。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2页。

② 参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资料汇编》,第6页。

尽管出现过困难和个别的“历史曲折”，社会主义发展倾向还是在聚集力量。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表现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反复出现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性。这就是消灭封建关系和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改革，建立和发展国营经济部门，取消外国资本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巩固革命民主政权，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

获得解放的国家在解决国际问题中的作用加强了。在全世界一百六十个国家中，有九十二个国家是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从属制度的崩溃而诞生的或因此而取得主权的。^①其中有许多国家在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新殖民主义，为保卫和平而积极斗争。它们积极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倡议。

但是，帝国主义现在仍然用不少的方法去影响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家的发展进程。1973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的经济宣言强调指出，“……帝国主义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道路上的最大障碍”。^②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1950—1975年期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工业生产增长五点六倍，农业产量增长百分之六十八），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赖仍在阻碍着它们的经济进步。由于依恋外国的私人投资和国内资源不足，大多数已经解放的国家的工业发展，还没有使这些国家建立起包括相互联系的各部门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综合体。这样的综合体能够

① 见K·H·勃鲁坚茨：《现阶段的民族解放斗争》，载《共产主义运动的课题。当代的世界发展条件与革命斗争》文集，1978年莫斯科版，第50页。

② 《不结盟运动文件资料汇编》，1975年莫斯科版，第233页。

保证在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实现扩大再生产。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结构和生产部门的比例失调现象以及对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依赖，反而在日益增加。在最不发达的国家（根据联合国资料，这类国家约有二十九个）中，实际上还没有开始建立工业^①。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新作用与它们被限制在帝国主义把持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体系之中的现状是不相适应的，这种不协调现象近十年来表现得格外突出。这些国家拖欠的债务到1978年约达两千五百亿美元^②。据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统计，1969—1975年期间，仅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就流入私人资本六十六亿美元，流出的利润则达一百二十亿美元。根据官方的材料，非洲四十五个国家1975年偿还的债款为四十一亿美元，等于这个大陆全年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十二^③。

资本主义表现在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哪怕稍许改善一下非洲极其落后的状态。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要把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总产值（它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增加一倍，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况且有十四个国家在最近十五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收入还有所减少。^④

① 详见罗·亚·乌里扬诺夫斯基：《反对新殖民主义斗争的经济战线》，载《亚非人民》杂志，1978年第4期。

② 参看《真理报》，1978年8月17日。

③ 参看《真理报》，1978年7月15日。

④ 同上。

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便成为前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主要领域。他们正在努力争取经济独立、经济平等和摧毁新殖民主义剥削体系。

现实生活确凿地证明，发展已解放的国家同苏联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的联系，可以对整个国际经济关系体系产生何等有利的影响。正象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 1978 年 9 月在第三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指出的，苏联在非洲以及其他大陆毫不追求任何私利，不想取得任何政治统治、任何租让权和任何军事基地^①。已解放的国家不断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在 1960—1975 年期间，商品周转额从二十二亿美元增加到二百三十四亿美元^②），有助于它们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操纵。

已经解放的国家比过去更加强烈地要求消除经济歧视和修改它们同帝国主义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整个体系，而且力图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这一切使垄断组织日益不安。新殖民主义者越来越担心自己将逐渐丧失对事态进程的影响力。

正因为如此，反动派在 1977—1978 年开始在非洲进行反扑。这种反扑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反对这个大陆的进步国家和援助南非的帝国主义桥头堡。帝国主义为了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不会放弃武装干涉政策。它在策划纠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护下的“泛非力量”。在非洲之角和非洲西北部，

① 参看《真理报》，1978 年 9 月 27 日。

② 参看《亚非人民》，1978 年第 4 期第 4—5 页。

在乍得和利比亚边界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代理人正在挑动边界冲突。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争取摆脱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

同时，他们还掀起了诽谤苏联和古巴的运动，企图以此掩盖非洲大陆重新殖民化的危险，使人对非洲各国为了自卫求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权利产生怀疑。葛罗米柯在第三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当非洲国家或者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为了反击侵略——再说一遍，是侵略——和武装进攻而请求帮助时，它们有权指望得到朋友的支持”^①。给予这种援助完全符合联合国有关集体安全的规定。

帝国主义势力反对已经解放的国家的阴谋，得到了北京领导人的支持。他们也在挑起非洲国家之间的不和，庇护反动制度，破坏进步国家的阵地，支持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散播对苏联、古巴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的敌对情绪。这一切决定了必须加强民族解放运动与它的天然盟友的团结。1969年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提出的下述结论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巩固社会主义体系、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盟，对于反帝斗争前途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②。

政治形势也迫切地要求排除妨碍亚非拉各国人民在进步道路上前进，使这些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彻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丧失明确目的与明确任务的一切因素。其中也包括力图把反帝解放运动引入迷途的托洛茨基主

① 《真理报》，1978年9月27日。

②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1969年6月5—17日于莫斯科》，第315页。

义。无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怎样微不足道，它的那些在形式上极左而在实质上投降的思想，总是得到了参加反帝解放运动的某些具有反共情绪的人的支持。

托派在进行极其复杂多变的破坏活动。其中包括：使民族解放斗争同当代的其他革命潮流相对立，使它与社会主义大家庭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相隔绝；把一些可能造成危险和有害后果的关于斗争性质和方法的思想带进民族解放运动；最后一点，就是极力分裂反帝战士的队伍。

妄图孤立民族解放运动

托派把自己打扮成通晓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和利益的“行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式和方法的“制定者”。他们从1957年开始加紧炮制有关民族解放斗争问题的各种“纲领性”文件。

其实，托派无论在思想上或政治上都没有准备好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主张。托洛茨基始终回避这方面的课题，认为它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之前并非当务之急^①。1961年的托派“代表大会”公开宣布：“由于正当的历史原因，在一整段时期内，第四国际的发展是集中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一直是把先进的资本

^① 他在《不断革命》一书中写道：“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条件下，只有当本国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成熟到足以使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群众的领袖掌握政权的时候，民族民主革命才有可能进行到底。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末殖民地解放斗争只会产生十分不彻底的结果，而且这种结果是完全反对劳动群众的。”

主义国家看做是世界革命的第一号中心。现在第四国际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必须根据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来重新组织它的活动，在一整段时期内，把它的主要努力放在这方面。”^①皮·弗朗克承认，“民族独立问题并不是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具有如何重要意义的部分”。

托派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提出的主张同“不断革命论”的许多原理是直接矛盾的。这些主张带有无原则的适应环境的烙印。托派极力骗取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的信任，利用他们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弱点。

厄·曼德尔(热尔曼)在1960年公开宣称：托洛茨基主义者应当把“最大希望”寄托在民族解放运动地区。“第四国际”的其他头目也承认，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最后希望”。

巴黎“书记处”的领导人之一埃克托尔·吕歇尔在谈到渗入争取独立的国家的意义时着重指出：“第四国际如果在实践上、组织上和行动上……不能实现这些任务……，它就会丧失自己在理论方面的作用，变成单纯的文献收藏家”。在把自己的代表分别派遣到民族解放运动地区之后，“书记处”讨论了是否应当“重新布置自己的力量”的问题。有人提议实行“国际不断转移”的体制^②。

托派开始向农民鼓吹，不依靠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帮助他们也能独立地解决自己的问题。鲍·尼·波诺马廖夫指出，“于是，一条‘左’倾宗派主义路线——无产阶级不要

① 《第四国际》，1961年第12期第70页。

② 《第四国际书记处内部通报》(«Bulletin intérieur du Secrétariat international de la IV Internationale»), 1960年12月号第15页。

农民——被另一条同样是宗派主义的路线——农民不要国际工人阶级——所代替”^①。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主要革命力量（可见其中也包括农民，因为农民在民族解放运动地区占人口的大多数）的论点，是1957年举行的“第四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的。这次会上通过的专门决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殖民地革命》中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民族解放运动一直是世界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②1963年的所谓“联合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说，“殖民地革命是当前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已在一定时期内转移到殖民地国家”。^③帕布洛的拥护者在1969年11月的代表会议上也宣称，“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的总进程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纠集在波萨达斯周围的托派分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的“代表大会”说，农民是“革命现阶段的中心和轴心”^④。

托派遵照“谁生活得不好谁革命”的典型“左”倾空谈主义方针宣称：“一切农民群众……由于吃不饱饭和居住条件恶劣而具有革命意识”。农民被说成具有“在世界的其他部分推进社会主义”的能力。^⑤

为了加强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进程中起首要作用的观点，托派提出了所谓“落后国家革命理论”。

① 见鲍·尼·波诺马廖夫的文章《思想政治斗争的迫切任务（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共的工具）》，载《共产党人反对托派思想的斗争》文集第26页。

② 《第四国际》，1957年12月号增刊第41页。

③ 同上，1963年第19期第23、48页。

④ 《欧洲马克思主义评论》，1968年第1期第126页。

⑤ 同上，1968年第1期第126、170页。

这种“理论”并不新鲜，民粹派早就坚持过，他们声称革命是经济落后国家命中注定的。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也在玩弄这种骗术，妄图证明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专属”经济不发达国家，而不适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中甚至出现了一个流派，把“落后论”提高到一般社会学理论的高度，并且要人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不发达状况”下发生，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不具备革命的基础。^①

托派也象资产阶级“落后论”的拥护者一样叫嚷过农民是革命精神的主要源泉，现在他们又重复提出这种“论据”是很自然的。托派声称：发生革命的许多国家过去在经济上都比较落后。

他们把俄国也列入落后国家。列宁当年就反对这种简单化的说法：“不对；是从‘比较弱的’开始的。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不会成功的。”^②

托派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落后国家发生了革命的“结论”也是对事实的主观主义解释。为了这种“理论”的需要，他们把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国家也都列为落后国家。

按照托派的这种无知的逻辑，革命就不应发生在东欧国家，而应当首先发生在非洲，因为那里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低

^① 详见尤·安·克拉辛的《被革命吓倒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观简评》一书的《“落后论”是对革命必然性的否定》部分，第302—315页。

^②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版第60页。

得多。

革命斗争的经验是极其丰富多采的，根本不可能事先规定出革命将在哪里以及将按照怎样的顺序发生。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有把握地说，仍和过去一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的是要具备客观的和主观的前提。这些前提可以出现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主义本身的变化。十月革命前后，托洛茨基鼓吹说革命只能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胜利发展。其他国家只能消极等待轮到自已。现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战略摆”又摆到了落后国家一边。于是，那种普遍的失败投降情绪便又表现为“建议”消极等待来自亚、非、拉彼岸的革命浪潮。

为了把自己的“落后国家革命论”打扮得合乎情理“有根有据”，托派断言落后国家由于阶级敌人软弱而具备更为有利的条件。巴黎“第四国际书记处”1963年“代表大会”决议中说：“落后国家中敌人的软弱为更加容易地夺取政权提供了可能性”^①。帕布洛的拥护者在1969年举行的代表会议重复了这个论点：“在进行殖民地革命的国家夺取政权总是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容易”。

争取社会解放的亚非拉各国人民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有同样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现在的新殖民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它具有“集体”性。尽管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依然存在尖锐矛盾并且在继续进行斗争，帝国主

^① 《第四国际》，1963年第19期第13页。

义却越来越经常地作出联合的努力，以便把发展中国家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为了阻止这些国家在社会方面走上自由发展的道路，帝国主义不惜采取任何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军事的手段。由于既不存在成熟的工人阶级，又不具备国际工人运动积累起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因此甚至可以说那里的反帝力量有一定的弱点。

七十年代，大多数托派组织已经不大提起这种“理论”。但是有些集团，例如帕布洛派，依然在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中把它摆在首要地位。他们吹嘘自己“制定”了并且在继续坚持“关于革命从外围向中心，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向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堡垒推进的观点”^①。

为了尽量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其他革命潮流隔绝开来，托派避而不谈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提供的大量援助。众所周知，年青国家在争取政治独立、建立自主的民族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同它们加强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关系密切相关的。同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是每一个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是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发展的客观必要条件。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说：“假如没有苏联，资本主义列强在原料资源短缺和能源危机的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重新动手瓜分世界。假如没有苏联，不能想象小国会享有今天这样的独立，各国人民会争得收

^① 《国际马克思主义评论》，1972年第3期第6页。

回自然资源的胜利，他们会在现今的国际舞台上如此有力的发言权”^①。

限制和排挤外国垄断组织，实行工业国有化^②，巩固国营经济成分（在客观上是针对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实行民主改革——这一切离开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是极难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帮助各国人民独立解决自己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问题。这种合作是促使民族解放任务同社会解放任务顺利结合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经验证明，不同世界社会主义结成紧密的同盟，要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是不可能的。

华沙条约参加国政治协商委员会 1978 年 1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谴责了矛头指向争取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反对新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各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政策。会议宣言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一贯反对这种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背道而驰的政策。它们表明了自己完全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的斗争。它们对于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对于在艰苦斗争中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其中包括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保障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的自由权利——的已解放国家的人民，给予了而且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1976 年 2 月 24 日—3 月 5 日）速记报告》，1976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第 194 页。

②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1960—1974 年期间六十个发展中国家已登记注册的外国企业国有化证书和监督权证书共八百七十五份。1970—1974 年的国有化速度又超过六十年代一倍。（见柳宾·格奥尔基耶夫《论已解放国家的国有化的社会政治内容》一文，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7 年第 7 期第 78 页。）

今后将继续给予支持。它们再次强调今后决心继续发展自己同采取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年青国家的多边合作和同志式相互关系”。^①

托派对苏联的诽谤攻击，主要是说它没有采取措施促使民族解放运动“加速”发展，“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波萨达斯集团指责社会主义国家“不实行革命政策，不输出革命”。

波萨达斯的拥护者这一次是直言不讳地谈论“输出革命”。战前的托派总是用一些“保卫革命”的空泛议论伪装自己，当人们揭露他们的“输出革命”方针时，总是装出一副委屈不解的姿态。现在的托洛茨基继承者则率直地行动起来了。

他们乞灵于臭名远扬的“推动革命论”，是为了怂恿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不去反对帝国主义。“第四国际”的这种手法是从托洛茨基那里学来的。1938年托洛茨基在《反对派通报》上写道：“苏联的政策是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托派把希望寄托在人数不多的崇拜“外来福音”思想和强制加快社会进程的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身上。与此同时，他们还叫喊一些冒充左派的空话，为的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们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粗暴攻击有什么“根据”。

托派还同样恶毒地指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不愿帮助民族解放斗争，硬说它“对这一斗争的胜利不感兴趣”。

^① 《真理报》，1978年11月24日。

其实共产党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引导原宗主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早就指出过在实现这项任务方面存在的困难：“广泛实行殖民政策的结果，使欧洲无产者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养活全社会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几乎是被掠夺的殖民地人民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在某些国家里，形成了使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①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威胁说失去殖民地会使本国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千方百计地煽起殖民沙文主义情绪。

共产党人一直在领导支持殖民地人民独立的群众运动。这里只要指出以下的事例便足以说明问题：法国共产党当年为了支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组织了示威游行和罢工。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对于阿拉伯人民反击以色列黠武主义者阴谋挑衅活动所表现的团结支持精神是举世皆知的。1978年，国际工人运动曾愤怒地谴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加国对扎伊尔的武装干涉。

托派对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的态度以及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给予这两个国家的援助所采取的态度，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立场是如何反动。

1974年的埃塞俄比亚革命扫除了腐败透顶的封建君主制度，宣布了实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的方针。1976年4月通过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规定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全国实行了土地改革，银行、保险公司和主要工业企业实现了国有化。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61页。

帝国主义势力力图消灭这些革命成果，他们寄希望于怀有沙文主义情绪的索马里领导人对埃塞俄比亚的强烈敌对态度。当1977年夏季索马里领导人开始军事行动的时候，苏联站在侵略行动的受害者一边，应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请求提供了必要的援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古巴，也给予同样的支援。结果，埃塞俄比亚人民不仅保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而且大大巩固了革命的阵地。

托派也象帝国主义宣传机器一样诋毁埃塞俄比亚，声称那里没有发生任何革命，而是“实行反人民政策”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人取得了政权”。他们指责苏联、古巴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巩固了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国家机器”。^①

托派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安哥拉的革命爱国运动。他们断言，在那里“掌权的是具有民族主义野心的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府”。^②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被指控“同非洲的民族主义领袖发生联系”，“同情那些应被抛弃的人”。^③

同时，很多托派分子直言不讳地说，必须首先同那些宣布自己愿意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进行斗争。他们硬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实行“蓄意欺骗群众的政策”，“把非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引入迷途”，“散布不切实际的幻想”等等。

托派提出的口号是“决不支持这些国家”，因此同资本主义国家和非洲国家反动势力的立场是一致的。也有些托派建

① 《战斗者》，1978年7月7日。

② 同上，1978年7月7日；1978年7月14日。

③ 同上，7月14日。

议对这一口号作一定的修正，改为：“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是一回事，在和平条件下给予资产阶级政府以政治支持则是另外一回事”。^①曼德尔宣称，帮助“民族主义制度”（他这样称呼采取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国家），是“同帝国主义合作的继续”^②。

托派阴谋煽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不信任，是同亚非拉各国资产阶级宣传机器掀起的反共运动密切配合的。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同托派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走向同一个目标——散布对共产党人的怀疑。

但是，俗话说谎言是走不远的。为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谁是支持他们的，谁是反对他们的。他们越来越看清用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进行恫吓的那些人所搞的种种活动的政治内幕。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威胁。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才是亚非拉各国人民的主要危险。

托派企图削弱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帝锋芒，把它推上反苏反共的道路。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托派在民族解放运动地区推行自己的观点的如意算盘没有兑现。“最后的希望”化成泡影，农民已经不再理睬他们。

这时托派内部开始争论对民族解放斗争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估价是否过份的问题。厄·曼德尔在1972年提出了一个安抚争论双方的“弹性”公式。他声称：“世界革命中心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但是人

① 《战斗者》，1978年7月7日。

② 同上，6月16日。

类的命运最终还是要在日本、西欧和美国决定。”^①因此，他提出了托派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展开活动的方针。

托派分子并不满意这个公式。多数人宁愿改为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巴黎“联合书记处”1974年举行的“代表大会”指出：“现在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集中地和有计划地深入学生运动方面”。^②显然，“第四国际”又认定学生队伍是他们的“最最”最后希望所在……。

托派在作了一番调整之后，并没有重新修订他们企图强加给民族解放斗争参加者而未能如愿的那些“建议”。不仅如此，他们还顽固地强调说，过去就民族解放斗争的形式和方法所提出的各种口号和主张都依然有效。

冒险主义的处方

为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引起人们的注意，托派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提出了种种伪装革命的口号。他们不去认真思考这些地区的事态发展进程和进行反帝斗争的实际可能。他们的特点是简单的公式化作风和不愿深入研究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内部政治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以漠视民族特点夸口逞强。

波萨达斯集团的一次“代表大会”强调说：“我们对于具体分析某个国家的情况不感兴趣，……因为那不是历史发展的

① 厄·曼德尔：《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E. Mandel. «Friedliche Koexistenz und weltrevolution»），1977年汉堡版第39页。

② 《国际》，1974年9月号第94页。

决定因素”。倾向巴黎“第四国际书记处”的拉丁美洲托派也发表了类似的主张。他们武断地宣布：“大多数国家存在着同样的条件”。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勃列日涅夫在1969年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把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划分为以下三大类：

——采取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国家。它们的出现是革命力量的巨大成就和帝国主义的惨重失败。这些国家在实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造方面已经取得重要的胜利；

——在第二类国家中，由于种种客观因素，同时也由于进步力量组织性较差或消极被动，在宣布政治独立以后政权被那些同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反动分子所攫取。其中有些国家建立了军事独裁，迫害进步力量。帝国主义把它们领土用于侵略目的，例如设立军事基地。共产党人及其同盟者在这些国家的斗争条件同殖民地时期的条件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三类国家今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还没有十分明确地确定下来。进步力量同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派正在为国家的未来进行着斗争。这些国家的国内社会分化过程正在深化。劳动人民要求实行深刻的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则反对社会进步和实行彻底的反帝方针。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尖锐的阶级斗争^①。

托派拒绝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概念，号召“立即普遍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巴黎“第四国际书记处”的拥护者声称：

^① 参看《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1969年6月5—17日于莫斯科》，第60—62页。

“沿着阶梯一步一步地走，无疑等于拒绝革命”。^①他们不断重申：“划分革命阶段的公式，是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想法”。^②伦敦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在1976年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把“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的路线”称为“孟什维克”路线。^③

托派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不仅仅限于提出“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他们甚至规定出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期限”。例如，危地马拉的托派和其他“左”倾分子在1964年宣称，社会主义革命至迟应于两年之内在危地马拉爆发。

为什么托派发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号召呢？要知道，他们不会不了解亚非国家的状况，那里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成分，在几乎全是文盲的居民中充满了宗教的、部族的、种姓的及其他的偏见。

在“第四国际”的“纲领性”文件中，也可以看到关于亚非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不发达的议论。但是托派却硬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一切问题现在都可以解决。

如上文所述，托派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异议，否认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有可能建成无剥削的社会。而对于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的亚非拉地区，他们却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人们相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这不是“策略上的灵活性”，而是托洛茨基主义固有的无

①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1年第3期第86页。

② 同上，1961年第2期第8页。

③ 《新闻战线》，1976年5月22日。

原则性和为了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不惜践踏自己的“基本”思想的本领。号召“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是托派在思想方面专门向亚非拉国家“外销”的货色。

托派是在有意地利用社会主义思想和冒牌社会主义思想都在这些国家广泛传播的状况，利用各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憎恨心理。在亚洲和非洲存在不少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除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之外，还存在村社农民的、反动官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民族社会主义”派别。在它们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私目的，他们力图用“民族社会主义”对抗真正的社会主义，用蛊惑性的诺言欺骗群众，说什么可以沿着一条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保持“等距离”的道路前进。右倾改良主义的代表则对传播“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

托派企图干预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家就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的辩论。他们立即站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的人们一边。

托派要求“普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的伪善性质，也表现在他们对待采取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国家的态度上。伦敦的“国际委员会”宣称：“关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领袖能够领导民族革命的理论……只会导致支持（公开的或隐蔽的支持）反对工人阶级并且准备保存或恢复同帝国主义的联系的独裁制度”。^①

^① 《工人新闻报》，1971年6月22日。

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把自己打扮成“最坚决的革命者”，托派号召“尽快建立工农国家”^①。他们要求“立即建立苏维埃”，鼓吹说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托派又一次把“左”倾的空话加在投降主义立场上。他们在1974年的“代表大会”上宣称：“无产阶级不联合贫农夺取政权”，“任何一个问题也不能解决”。^②不但如此，“代表大会”还警告不要幻想“依靠扩大民主斗争、经济斗争和其他方面的斗争能取得什么成果”^③。

托派对反帝战线的攻击，与他们在西欧采取的手法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声称反对组织广泛的反垄断联盟，因为它会诱使人们丢开革命斗争任务。托派极力把自己的“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搬到亚非地区。于是又陷入了这样的抽象公式：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存在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但是在许多国家还不存在形成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

托派的“处方”在拉丁美洲国家也是不现实的。正象各国共产党人指出的那样，托派及其他“左”倾分子从不考虑，反帝斗争和民主革命与那里的千百万中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是利害相关的。实行宗派政策使他们背离工人阶级，这便会给反帝斗争带来重大损失，使敌对力量更加容易实行其动摇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的团结的阴谋。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社会经济改造只有在彻底的反帝斗

① 《第四国际》，1961年第14期第95页。

② 《国际》，1974年特刊第30页。

③ 同上，第16页。

争的道路上才有可能实现，而托派不愿考虑这一经验。

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把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的民族民主战线问题提到首位。各国的民族民主战线所面临的任务是互有区别的。在采取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国家，摆在首位的问题自然是巩固革命民主制度，保证沿着深刻改造的道路不断发展，最终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变为现实。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中，揭露反动势力的政策，争取扩大民主，争取为将来向社会主义道路过渡准备条件则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尚未消灭殖民主义的地区，建立统一战线是为了在最短时期内实现消灭殖民主义的主要目标。

把民主任务同社会主义任务混为一谈、破坏反帝力量团结的托派路线，是为反动势力的利益服务的。托派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最有效”形式和方法的种种主张，也是从属于这个目的的。

托派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散发的材料，其特点是不问这三大洲国家的政治情况如何，把武装斗争说成是唯一的斗争形式。托派在1961年的“代表大会”上预言：“工农武装斗争将成为一切地方的常规”。^①对于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他们的态度也不例外。按照他们的意见，在那里必须“一切从头开始”。

对武装斗争本身，他们作了极其片面的解释。游击战争被宣布为唯一的和万能的方式。巴黎“联合书记处”1961年“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世界形势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宣布

^① 《第四国际》，1961年第12期第3页。

游击战争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国内战争的开端。“游击战争越来越反映出国内战争的根本特征……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为游击战争培养出工农先锋队”。^①帕布洛的拥护者也同样明确地表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唯一道路是游击战争的道路”。^②波萨达斯的追随者也发表过同样的声明。

托派的冒险主义观点同拉丁美洲共产党人对待游击战争的态度是根本对立的。共产党把游击活动看作可能采取的一种阶级斗争形式，是以列宁的指示为根据的。列宁在专门为此而写的《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这种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必然的，同时又强调指出：“这种手段应当服从于其他的斗争手段，应当适应于主要的斗争手段，应当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和组织上的影响变成一种高尚的手段”。他还指示说：“……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斗争手段，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③

托派如此一致地推崇游击战争的原因何在呢？要知道，过去他们是无视这种革命斗争形式的。当他们看到游击运动在许多国家展开以后，又连忙宣布自己是游击运动的支持者。他们硬说游击队定将成为“在本质上是群众性的和革命的政党”^④，同时也毫不掩饰他们“向共产党人挑战”和试图“成为农民组织进行公开斗争的中枢”^⑤的计划。

① 《第四国际》，1961年第12期第14页。

② 《在社会主义旗帜下》，1962年第40期第8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680页。

④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7年第5期第17页。

⑤ 同上，1965年第2期第43、44页。

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地方，托派分子渗入了游击队。他们企图割断游击队同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系，并且在那里传播会使革命力量陷于分裂的冒牌左派观点。

1963年和1965—1966年在秘鲁，1963年在厄瓜多尔以及在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托派的策略都给革命斗争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尽管托洛茨基主义的构想遭到了现实生活的痛击，托派的密使也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遭到了应有的抵制，“第四国际”的各个集团依然加紧进行宣传，企图使各种挑拨性的和冒险主义的思想打进发展中国家。

1974年托派“代表大会”（巴黎“联合书记处”召开）听取的《关于拉丁美洲武装斗争》的报告提出了一项任务，要在关于武装斗争和“反对合法活动的幻想”问题上“不断地开展宣传运动”。

然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有人对大会通过的决议提出了批评，因为“游击活动被归结为武装斗争的唯一形式”，而“武装斗争本身被看作某种依其自身的规律而存在的东西，被看作与群众运动相脱离的……现象”。会上还有人谈到“小组活动策略”在拉丁美洲的失败。但是“代表大会”的多数参加者依然支持过去的游击斗争方针。

在拉丁美洲活动的个别托派组织与其他“左”倾团体一起发展了“城市游击中心”的理论，以取代过去的“农村游击中心”思想。托派又一次同那些力图通过破坏活动及其他类似活动“唤醒群众”的无政府主义恐怖组织站到了一起。

菲德尔·卡斯特罗揭露了托派的阴谋，指出“第四国际”

的纲领是“从卖身投靠美帝国主义的人那里贩运来的骗人货色”^①。这个评价确切地反映了托派在民族解放运动领域的活动所具有的亲帝国主义的反动性质。

^① 《社会主义古巴》，1966年第54期第93—94页。

第十一章

托派是和平共处与缓和国际 紧张局势政策的反对者

保障和平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任务。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课题，因为它同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最直接的联系，可以为这一过渡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这是一个极大的革命课题，因为它要求“彻底消灭军国主义”。正象列宁所指出的，应当把这一课题看作“不是在和平主义意义上来说的，而是与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联，并且是这一革命的结果。”^① 它的解决会使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不受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的干涉，顺利地确定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课题，因为只有在巩固和平的道路上才有可能妥善解决“冷战”时期积累起来的、早已成为发展国际关系的障碍的种种最棘手的问题。

这是一个全人类的课题，因为它关系到人类文明的保存。勃列日涅夫在 1973 年 10 月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上对世界上

^① 《列宁文稿》，第 6 卷第 382 页。

建立起来的“火药库”能毁灭我们的星球表示不安^①。要杀死一个人，只需要十五克爆炸物。我们地球上积累起来的爆炸物在1975年已达每人平均十五吨。^②

人类的极大幸运，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发明不是发生在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条件下，当时保卫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社会主义体系已经与作为战争和冲突根源的帝国主义体系同时并存，而且积极地影响着国际事态的发展进程。

苏共第二十四次和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改善世界政治气氛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由于社会主义各国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协同行动，国际紧张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缓和。

七十年代将作为争取和平斗争的重要阶段载入史册。十年来解决了一些过去认为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从这方面来看，以前的任何一个十年都无法同这十年相比。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缔结了国家间的条约；签订了关于西柏林国际法律地位的协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彻底冲破了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封锁，得到了广泛的外交承认；进一步改善了同法国及其他许多西欧国家的关系；缔结了互不使用核武器的重要条约；美国政府承认在苏美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原则。这只是一份关于国际事态更大进展的不完全的清单。

① 《遵循列宁的方针。勃列日涅夫言论集》，1975年莫斯科版第4卷第333页。

② 见瓦·瓦·科尔图诺夫：《裁军问题的社会历史方面》，载《苏共历史问题》，1978年第10期第42—43页。

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安全和合作会议开辟了令人鼓舞的前景。会议文件是一份周密详尽的欧洲和平共处纲领。

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正在为使政治缓和具有稳定的、不可逆转的性质，为以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为减少军事对抗和沿着普遍彻底裁军道路前进而奋斗。然而，使缓和局面进一步深化，是一个长期的绝非平静的过程。

勃列日涅夫 1977 年 11 月 2 日在《伟大的十月与人类的进步》的报告中说：“国际关系现在象是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今后不是信任与合作得到发展，便是相互畏惧、猜疑和武器积累进一步增加，即最终或者导致持久和平，或者至多不过保持战争边缘的平衡状态。缓和可以为选择和平道路提供机会。放掉这种机会就是犯罪。”^①缓和不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现象，而且是一种阶级-社会现象。

在当前的条件下，对和平事业，对缓和紧张局势的主要威胁，来自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

《真理报》的编辑文章《评美国政府的当前政策》指出，“必须考虑到，‘冷战’同帝国主义的老传统有牢固的联系，对资本主义说来它是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不受资本主义欢迎的变化作出的传统反应，这是一种军国主义的、暴力的、不合各国人民意愿的反应，尽管这种反应在当前的时代是彻底陈旧过时的和危险的。”^②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78 年会议宣布为期数十年的新的

① 《遵循列宁的方针。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 6 卷第 595 页。

② 《真理报》，1978 年 6 月 17 日。

军备竞赛方针；五角大楼顽固坚持实行制造并在欧洲国家的领土上部署中子弹的计划；围绕着虚构的所谓苏联威胁展开紧张的宣传运动；伪善地指责社会主义国家“侵犯人权”——这一切都是竭力想破坏缓和，妄图使世界向“冷战”、向新的军事对抗和无节制的军备竞赛倒退的帝国主义势力所执行的政策的不同环节。同军事工业综合体接近的各个政治集团、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和新法西斯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军国主义反动派别，都发出了“资本主义将被毁掉”的叫喊。巩固和平的方针被他们描绘成一种阴险狡诈的圈套。那些立意阻止改善国际政治气氛的人信口开河地叫嚷：“要当心苏联的外交倡议，对于今天的和平，明天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中国的现领导也从类似的立场出发反对和平政策。他们呼吁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自己的军事政治联盟，增加军备。北京领导人告诫说，“缓和是麻醉各国人民的鸦片”，要人们相信“和平会发展为战争”。在所谓“苏联威胁”的叫喊声下，北京在为实现自己的大国霸权主义计划进行政治和军事准备。

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所谓“左派”反对者也积极地活动起来，他们把国际局势的缓和看作是“挖阶级斗争的墙角”，而把局势的尖锐化说成战胜帝国主义的捷径。

这些“左派”也象右派阵营一样，为了反苏反共的目的利用人类从“冷战”向广泛的国际合作过渡这个复杂而又至关重要的时期难免产生的种种困难。这条道路上出现任何困难（当然，这种困难无论现在或将来都是不可避免的），都会使他们幸灾乐祸和得意洋洋地说什么“这是早已预料到的”。这些“左

派”，首先在容易接受“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思想影响的非无产者阶层中间，散布悲观主义和对巩固和平任务能否实现的怀疑情绪。

列宁的这样的一段话在今天还具有它的现实意义：必须“对目前各种维护战争的诡辩作出十分详细的分析”。^①这段话不仅仅是针对维护战争的帝国主义辩护士说的。

共产党人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进行的斗争由来已久。这一斗争过去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尖锐。这并不是由于它的危险性增加了。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先锋队在迫使“左派”从他们的阵地大规模后退。斗争的尖锐化是另有原因的：当前，特别是在武器的破坏作用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革命力量对世界的命运所负的责任急剧地加重了。工人阶级对于污蔑它的和平意愿的任何活动，对于为了推销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仇视人类的荒谬思想而利用革命理想进行投机的任何活动，都不能置若罔闻。

反对缓和紧张局势的“左派”组织并不能影响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解决。但是它们能诱使一部分非无产者阶层放弃保卫和平的积极行动，这部分人由于政治上缺乏经验总是爱好那些伪装革命的言论和行动。

然而在和平运动中没有也不会有“多余的人”。为了吸收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和平运动，必须坚决地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各种冒牌理论。

下面我们谈一谈托派在七十年代大肆宣传的一些思想。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73页。

把革命斗争同和平共处政策对立起来

“第四国际”各集团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进行攻击，来源于托派对争取和平的斗争传统的敌视态度。早在1960年托派就曾针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举行的国际会议发表声明说，托洛茨基主义者“三十多年来一贯反对和平共处，现在我们根据同样的基本原因依然反对这种所谓的理论”。^①

1975年托派又进一步确认他们今后仍将反对“这种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②

引人注目的是托派“计算”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时间，不是从十月革命算起的。他们是想用这种办法再次强调这个政策不是列宁在世时实行的，而是在他去世后开始的。

托派仍象过去一样把和平共处政策同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加以割裂。他们否认这个政策同列宁关于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环节突破帝国主义链条的结论具有逻辑联系。对于托洛茨基主义来说，世界革命是世界战争的同义语，这种战争应当一直继续到最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投降为止。取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与包围着它的资本主义“暂停”军事冲突，则被说成是“放弃革命”。托派采取这种立场，是为了污蔑世界革命进程以及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为了给旨在巩固和平的一切活动抹黑。

① 《第四国际》，1961年第13期第19页。

② 《做什么》，1975年1月22日。

为在国际事务中确立和平共处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和真正的革命斗争，托派则对此提出异议。然而，和平共处政策正在解决这样一个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任务：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彻底放弃对正在建设或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实行军事进攻的企图。这样就能巩固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为推动人类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前进创造有利的条件。

托派硬说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和平共处政策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它们的利益同开展世界革命斗争根本不能相容。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

真正的革命者一贯把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现在是建设共产主义——创造的有利的国际条件，同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履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民族义务和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看作互相密切联系的事业。历史把首先开辟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充当世界革命堡垒的伟大使命交给了苏联。列宁强调指出：“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地屹立着”。^①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这个火炬燃烧得更加耀目，它的光芒已经照耀到资本主义世界最偏僻的角落。

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对一切走上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道路的人民的有效援助。它还可以促进在帝国主义的主要堡垒中进行的革命斗争。大家知道，军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必然导致国内生活中反民主倾向的加强。列宁在《好战的军国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34页。

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叫嚣越厉害，它们对本国反军国主义运动的镇压就越无情。他指出现代军国主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生外部冲突时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如德国人所说的«Militarismus nach aussen»），一种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运动的武器（«Militarismus nach innen»）。”^①

军国主义的第一种形式具体表现为不断增强军事工业的潜力，准备重新瓜分世界，进行对邻国的破坏活动。第二种形式则表现为加强警察恐怖机构，摧残进步力量，取缔民主组织，压制一切反对情绪。

战后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冷战”和它造成的气氛为摧残进步民主力量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反动派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搞起了“政治迫害活动”，煽动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仇恨情绪。“冷战”被用来践踏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完全勾销以前的革命斗争所争得的成果。

在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下则展现出另一种发展前景。反动派再不能那样简单地借口局势紧张、“外来威胁”等等为自己的反民主行为辩护。在为实现和平共处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进行斗争的情况下，劳动人民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证实谁是战争的拥护者，自己会认清为保卫民主而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必要性。由此更可以进一步直接认识到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的必然性，直接导致组成一支任何民主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66页。

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可缺少的群众性反帝大军。

托派扬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会促使各国共产党对阶级敌人采取调和主义的立场。他们还硬说共产党人“想约束工人阶级”。^① 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所召开的代表大会表明，它们的纲领变得越来越有进攻性，提出的阶级斗争形式则越加复杂多样。

和平共处政策也有利于已经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以及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意味着应当彻底结束反革命的武装干涉、“炮舰外交”、讹诈政策及帝国主义列强经常采用的其他对外干涉手段。乌拉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纳内·阿里斯门迪形象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给帝国主义的计划戴上了笼头，可以防止帝国主义者被赶出大门之后又从窗户跳进来”。^②

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表明了苏联今后仍将决心站在争取独立的各国人民一边。关于进一步争取和平与国际合作、争取各国人民自由与独立的纲领指出：“彻底消灭殖民压迫制度的一切残余和妨害各国人民实现平等与独立的一切障碍，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切根源，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国际任务”。勃列日涅夫强调说：“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支持为自己的自由而战的各国人民”。^③

现代的各个托派集团还诽谤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和缓和紧张局势是为了“冻结”世界革命进程，保持

① 《新闻战线》，1976年8月3日。

② 罗纳内·阿里斯门迪：《拉丁美洲革命的课题》，第137页。

③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资料汇编》，第26、12页。

世界上现存的“社会原状”。这样，它们又唱起了托洛茨基当年唱过的调子。

苏联六十多年的历史揭穿了这种论点的虚伪性。

托洛茨基的现代追随者所使用的仍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偷换概念和故意歪曲世界事态的客观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承认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被他们说成是“维持原状政策”。他们还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国家“接受了帝国主义的现状”。

然而，承认国家主权并不等于永远保持世界上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信，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地图上将出现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过程是按照各个国家本身的阶级斗争客观规律发展的，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道：“假左派把和平共处几乎说成是‘帮助资本主义’和‘冻结社会政治现状’，我们对于这种说法的回答是：一切革命都首先是那个社会内部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且生活本身也推翻了关于‘冻结’的谎言。只要回顾一下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重大革命变革就足以说明问题”。^①

正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反帝革命斗争明显地表现出社会内容加深和动力扩大的趋向。西方国家强大的反垄断运动粉碎了关于“社会和谐”的资产阶级神话以及关于“工人运动停滞不前”的“左”倾机会主义臆造。葡萄牙和希腊已经推翻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资料汇编》，第33页。

了法西斯专政。西班牙正在开展争取民主化的斗争。

此外，托派还有一个同样站不住脚的“论据”——苏联和各国共产党把和平共处从国家间关系搬到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领域。他们指责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想缓和阶级冲突和“防止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

1969年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声明：“和平共处政策并不排斥被压迫人民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有权采取自己认为必须采取的手段——武装的或非武装的手段，也绝不意味着支持反动的政治制度……。和平共处政策可以阻止帝国主义通过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扩大战争危险克服其内部矛盾的活动。这一政策既不意味着维持社会、政治现状，也不意味着削弱意识形态的斗争”。^①

在反对国际局势正常化的托派当中，西欧各国的“第四国际”拥护者表现得格外积极。人们不禁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的敌意表现得如此长期和如此疯狂，是不是由于世界上紧张局势的缓和是从这个大陆开始的？他们表现得如此猖狂，是不是由于妄想一笔抹煞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在努力改善欧洲政治气候方面取得的成绩？

托派分子声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欧洲政策所追求的目的，是“保持欧洲大陆的分裂状态”，“使各国工人阶级队伍相互隔绝”。^②

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恰恰是在“冷”战、尤其是“热”战的环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1969年6月5—17日于莫斯科》，第317页。

^② 《工人报导》，1973年第619期。

境中，才会出现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按照民族住区”相互隔绝的企图。垄断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种情况消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煽动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各国进步力量以及革命力量之间的联系因而受到破坏。

“第四国际”各个集团还试图败坏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普遍彻底裁军的斗争的声誉。他们把这个任务说成是“无法实现的梦想”，是提出“泄气的口号”，“散布幻想”等等。

共产党人清醒地估计到在争取停止乃至消灭军备竞赛方面存在的困难。他们把这项任务看作是直接关系到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关系到扩大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事态进程的影响力的最大社会问题。他们牢记着列宁的这样一段话：应当把彻底消灭军国主义看作“不是在和平主义意义上来说的，而是与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联，并且是这一革命的结果”。

当前，解决裁军问题已经开始具备主观的和客观的前提。主要的主观前提，是存在一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不仅能提出反对军国主义的纲领，而且有能力实现这个纲领。客观的前提则是军备竞赛政策的历史性危机。核时代使全球战争的破坏性达到极大的程度，以致战争已经不能再成为达到经济、政治和阶级目的的手段。

托派把注意力一味地放在世界事态发展的消极方面。他们不愿意考虑七十年代达成的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不仅限制了核军备竞赛的范围，而且成为真正实行裁军的实际措施。这里指的是关于禁止研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武器和毒气武器的公约（1972年4月10日）；苏美限制反弹道

导弹系统的条约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1972年5月29日）；苏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1974年7月3日）。1979年6月在维也纳签订了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借口臆造的所谓“苏联威胁”试图破坏裁军谈判，增加军事拨款，加紧军备竞赛。由于清楚地看到在裁军事业上存在强大的敌人，华沙条约参加国1978年11月在政治协商委员会莫斯科会议上声明，“如果把当代一切关心保卫和巩固和平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就能克服反对停止军备竞赛的人的阻扰”。^①

华沙条约参加国提出了裁减军备的许多具体措施，并且指出，“这些措施都处在多少有所进展的阶段，双方讨论和设法达成协议的对象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而是具有直接的军事和物质性质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表明自己准备协助克服就下面一系列问题谈判的道路上出现的障碍：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苏美之间就限制战略武器达成协议问题；在一切国家都可以不受任何歧视地和平利用核动力和核技术的条件下，加强禁止扩散核武器问题；禁止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武器系统问题；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问题，等等。

争取全面彻底裁军的斗争，正在加强爱好和平力量的地位，使公开的军国主义集团陷于孤立。

最后还要谈谈在托派当中流行的一种宣传公式。这里指的是他们关于“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的说法。他们与毛派

^① 《真理报》，1978年11月24日。

分子一唱一和，大肆叫嚣苏联和美国“共同瓜分世界”。托派在这里根本不顾这两个国家不同的阶级性质和社会性质。所谓“两个超级大国”的主张，旨在隐瞒这样一个根本的真理：其中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

托派围绕这个虚伪的论点集中展开宣传运动绝非偶然。在当前的条件下，不设法寻求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就难于达到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目的。

托派极力贬低下述事实的历史意义：美国通过条约承认不得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实力政策”，并同意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这是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取得的重大政治胜利。

主张“两个超级大国”论的人——这种人在“左”倾分子当中有，在资产阶级思想家当中也有——是希望把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立起来，把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对立起来。

大家知道，苏联和它的盟友为促成政治气候的改善作了不断的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对现阶段的基本倾向，对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的长远利益所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是它们采取协同行动的基础。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贯政策，无产阶级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彻底消除世界大战和把一切战争从人类生活中排除出去——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在这方面，葛罗米柯强调指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国际舞台上阶级斗争的一个主要因素”。^①苏联是在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密切合作

^① 《苏联的对外政策》，1975年莫斯科版，第4页。

之下实行其对外政策的。

“帝国主义不会让步”的 提法的投降主义性质

各个托派集团宣称，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是不会发生作用的。美国的托派分子在1978年7月对世界的政治形势作过这样的描述：“缓和没有减少世界战争的危险”^①。

波萨达斯在1977年7月声称：“资本主义发动战争是阻止不了的”。他们的主要论据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无法改变，不可能使它放弃军国主义，放弃对军事冒险和暴力的嗜好。属于波萨达斯集团的英国托派分子扬言：“战争是无法防止的，资本主义不会放弃使用战争手段，它必然要发动战争”^②。他们的意大利同伙重复说：“帝国主义对和平没有任何兴趣，它不会容忍和平”^③。伦敦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则宣称：“资本主义已不再对和平发生兴趣，因为它的利润在减少”^④。

共产党人追求的目的不是要“改造”帝国主义。他们的任务在于阻止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迫使它们放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计划。这虽然要作出巨大的努力，却是可以实现的。现在，军国主义势力不得不考虑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和

① 《战斗者》，1978年7月14日。

② 《红旗》，1973年6月22日。

③ 《工人斗争报》，1972年3月15日。

④ 《工人新闻报》，1974年11月26日。

社会主义所拥有的不亚于它们的军事力量。

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了解形势的关键。不考虑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就会得出极其错误的结论。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托派竟然求助于列宁的权威。例如，美国托派的报纸《战斗者》就断言：“列宁的观点是：战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继续存在，就不可能有‘长期的和平’”。托派由此得出结论说，争取和平的斗争和防止战争的方针是“同列宁主义根本不相容的”。这家报纸还从二十年代初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援引这样的论点：不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就不能创造消除战争的条件^①。

与帝国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相比，七十年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无论在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帝国主义都不得不考虑到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存在。

历史也使各国人民学到了很多东西。

国际工人阶级及其先锋力量——共产党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强。欧洲各国共产党在1976年6月举行的柏林会议上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必须刻不容缓地消除核战争危险，发动核战争是对人类的最大犯罪”^②。

和平拥护者的阵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它吸收了千百万不同政治观点和不同信仰的人，不容许发生战争的共

① 《战斗者》，1973年8月6日。

② 《争取欧洲的和平、安全、合作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总结。1976年6月29—30日于柏林》，1976年莫斯科版第35页。

同愿望使他们联合起来。

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世界和平大会上说：“我们的和平哲学是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的哲学，尽管当前局势错综复杂，矛盾重重，我们仍相信今天广泛开展的和平攻势定能成功”^①。

这种乐观主义，正象勃列日涅夫所指出的，是以下述的经常发生作用的因素为依据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它的和平政策就是来源于这种社会制度的本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人民对和平的深切关心；和平共处政策已经取得的成就；深信占世界居民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对和平的热爱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对于争取和平的各种社会运动的力量和威力的巨大信心。

只有政治上的盲人才会（象拉丁美洲的托派分子那样）断言，“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预防核战争。绝对没有”。^②这里再次表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固有特征：夸大帝国主义的力量，轻视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他们求助于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对时代的估计，试图使现今的世界“适应”已成过去的世界的框框。正是列宁坚决反对把在一种历史条件下作出的估计机械地搬用到另一种历史条件之下，他尖锐地批评各种机会主义者说：“他们用前天的时代……的条件来偷换现代……的条件”^③。

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1969 年国际会议的参加者对当今时代所作的正确评论：“帝国主义已经无力

① 《遵循列宁的方针。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 4 卷第 341 页。

② 《第四国际》（《Cuarta Internacional》），1973 年 7 月 6 日。

③ 《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24 页。

挽回他们失掉的历史主动地位和把当今的世界发展推向倒退。人类发展的基本道路,是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力量决定的”^①。

共产党人号召各国人民,首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经常保持警惕。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这样一段话在当前仍具有现实的意义:“……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②。

那么托派用什么来对抗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呢?前几年托派的一份报纸曾发表过一封读者来信,对“第四国际”提出的“打倒和平共处”的口号表示迷惑不解。信中说:“要知道,我们总不能用‘我们拥护战争’的说法与和平共处相抗衡”^③。

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家”扮演着热核战争的公开拥护者或隐蔽的拥护者的角色。

鼓吹“革命的核战争”

五十年代末,拉丁美洲的托派分子——波萨达斯的拥护者“发明”了这样一个说法:战争的破坏性越大,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革命化作用就越大。他们在自己的一次代表会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1969年6月5—17日于莫斯科》,第2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

③ 《革命青年》,1971年第26期第3页。

议上声称：“破坏性最大的战争必然会带来最进步的结果”^①。

托派是这样论证自己的结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个国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流血更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十一个国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将是一场核战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对革命事业起更大的推进作用。

波萨达斯派召开的托派代表会议号召不要害怕核战争，因为“它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必要手段，将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最后清算”。会议宣布，“真正的革命者”是那些“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工人国家之间的最后清算作好准备的人，而这种清算是要通过热核战争实现的”^②。

至于牺牲和破坏，按照托派分子的说法，那是人类不可避免的损失。经过考验，人类将以更充沛的革命精力恢复被破坏的和建设新的。波萨达斯在那一次代表会议上声称：“共产主义社会会在短时期内在废墟上建立起来”。

这里还要顺便谈一下，波萨达斯指责毛派剽窃了他的这个公式。毛泽东集团在1960年出版的《列宁主义万岁》文集中宣称：“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因此波萨达斯责备北京说：“中国同志，你们不能武断地说你们作为革命结论提出的一切问题完全是你们自己的理论研究和政治工作的结果。那是第四国际的结论。”^③

①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3年第4期第134页。

② 同上，第132页。

③ 参看《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文件汇编》，第242页。

后来，波萨达斯还算出了人类恢复热核战争的破坏所需的时间。按照他的意见，有两年就足够了^①。

从上述的结论出发，波萨达斯的拥护者“劝告”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革命战争”，不必顾虑这一步骤的道义方面。“让帝国主义拥有在适宜的条件下准备战争的主动权，就意味着使事态发展到破坏规模增大千万倍的地步”^②。

波萨达斯集团通过的宣言直言不讳地说：“必须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发动进攻，不要等到资本主义采取攻势和由它决定开始原子战争的方式与时间”。波萨达斯之所以号召“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战争，是因为这样会赢得历史性的时间”，他扬言这种战争只需几天时间，“如果从历史的范畴考虑问题，并且估计到是革命力量而不是资本主义主动发起的，那么它对于人类也不算是多大的坏事”^③。

1975年，波萨达斯重申自己的思想，说服人们“不必害怕先发制人的战争”^④。

新的战争会从地球上消灭整个整个的民族和国家，留给后代（如果他们真的还会出现的话）的“遗产”是被放射性污染的废墟、烧焦的森林和原野、干涸的河流、有毒的空气。只有疯子和仇恨人类的人才会赞美这样的战争。

波萨达斯疯狂地叫嚷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靠核武器解决同

① 京特·巴尔奇：《托洛茨基主义是原来的苏联共产主义吗？》，第108页。

② 《工人之声报》，1972年7月30日。

③ 《欧洲马克思主义评论》，1968年第1期第55、100页。

④ 《红旗》，1975年3月2日。

资本主义的历史争论,从而使全人类更快地到达“共产主义明天”。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说法与托洛茨基的“革命战争”思想的内在联系。

托洛茨基主义对于原子战争的颂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为数不多的情绪偏激的小资产者阶层的观点。他们被争取和平的斗争遇到的困难所吓倒,不相信力量对比和力量分布方面逐渐积累起来的量变最终会导致深刻的质变。对斗争前途的悲观主义估计,往往使他们产生绝望的情绪。

这些小资产者阶层由于经受着日益沉重的资本主义剥削、贫穷和困苦,因此很容易接受那些保证不要多长时间便可以“一举”获得解放的冒险主义思想。这些人谈论的往往是“灾难性的结局总比无边的灾难好”,托派正是在他们中间进行阴谋活动的。

对热核战争的破坏性估计不足,也为产生这一类观点造成了一定的条件。“先发制人的核战争”的观点由拉丁美洲的托派分子提出并不是偶然的。看来他们是在幻想热核战争会避开地球的这一地区。

如果说波萨达斯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减少了对“先发制人的热核战争”的赞颂,那是出于一定的策略考虑。他打算在西欧也成立一些追随自己的小组,而颂扬核冲突在那里不会给他带来政治资本。因此便把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号召稍加收敛,但是只字不提它有什么错误。这显然是把它“储备”起来等待“适当的”时机。

伦敦“第四国际委员会”采取了类似波萨达斯集团的立场。英国的托派分子曾经毫不掩饰地宣称,只有社会主义体

系同资本主义体系的战争才能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提供决定性的机会”。他们号召“动员人民群众准备迎接灾难性的破坏”^①。然而由于看到公开赞美核战争得不到支持，他们也象波萨达斯那样开始把自己伪装起来。

西欧的其他托派提出了利用核武器进行“革命投机”的方案。巴黎的“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原子讹诈。它断言：“现在不是要在实现社会主义与保存不人道、不公平甚至野蛮的社会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必须在社会主义与原子灭亡之间作出选择，世界要么成为社会主义的天下，要么彻底毁灭”^②。巴黎的一些“战略家”则认为，事情也可能不会发展到战争的地步。对于人类只要求作出这样的抉择就可以了：“社会主义或野蛮时代”^③。

那些在口头上谴责“先发制人的原子战争”的托派分子提出问题的方法也大致如此。例如，厄·曼德尔宣布自己是热核冲突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冲突会“消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曼德尔主张所谓“反升级政策”。这是一种什么政策呢？原来它是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成为局部冲突的发动者，以便“迫使帝国主义者把自己的后备军派往世界各地”。曼德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将会削弱，因为它要“把自己的力量分散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在地图上寻求越来越多的军事冲突地区，这反映了现代托派的冒险主义和对和平的命运

①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3年第4期第132页。

② 《第四国际》，1963年第19期第9页；第18期第3页。

③ 同上，1974年第15期第30页。

挑衅态度。社会主义国家一贯认为，制止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途径，是援助遭受侵略的各国人民使帝国主义势力不敢再发动进攻。

可见，托派的特点是以赤裸裸的冒险主义态度对待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他们当中有些人号召实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另一些人要求搞原子讹诈；也有一些人主张“反战争升级”。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原子战争。

此外，托派还象在其他方面一样散布投降主义情绪，其根源依然是“左”倾空话伪装下的反动的世界主义，依然是不从“全球的角度提出问题”便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思想。美国的托派分子声称：“只有通过群众斗争，而且必须是通过全世界的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才能使帝国主义解除武装”^①。其言外之意还是那一句老话：在现代的条件下不可能取得任何实际的成果。

托派的这种观点出现在全人类直接面临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就当今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反动，是对共产党提出的为争取和平积极奋斗的号召的反动。

托派采取的立场与那些同样妄图破坏国际紧张局势缓和进程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后者公开地争取巩固国际帝国主义，托派分子则是以“革命的最高利益”为自己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进行辩护。

^① 《战斗者》，1978年7月14日。

这样，托派便成为用“左”倾空话为反动势力和战争服务的突出典型。列宁正是针对这一类冒牌革命组织，强调了“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①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从意识形态方面揭露托派以及同它类似的组织和流派，也就是为亿万反帝大军协同行动对抗反动派和军国主义势力扫清道路上的障碍。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9页。

结 束 语

列宁曾经指出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利用“衡量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力量和影响的客观尺度”^①。这个客观尺度可以包括以下一些指标：代表某种政治思潮的政党或组织拥有的人数；这种思潮的社会基础以及从它所依靠的阶层得到支持的程度；组织性和战斗力；在思想上和在宣传方面拥有的装备；团结同盟者和同情者的能力；对本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程度等等。

如果用上述标准加以衡量，托派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和思想地位是极其薄弱的。然而在估计托洛茨基主义给革命运动造成的危害时，还必须额外考虑到以下的情况：垄断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和宣传上给与的支持不断加强，他们和托派自己一样热心地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观点；托派对所在国家的政治条件有极大的适应性，只要有利于加强——哪怕是稍微加强——政治地位，他们可以随意践踏自己的教条；他们在对国际革命运动进行破坏活动的方式方法上挖空心思而且颇有创造性。

现代托派继续在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之间实行无原则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513页。

的见风转舵策略，以求在反对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他们的支持。这种随机应变和在思想上适应环境的策略，是托派多年来“锻炼”出来的。

大家记得，在十月革命以前，托洛茨基主义力图得到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在假左词句的掩饰下力图阻止列宁主义思想取得胜利，妨害新型政党的建立和俄国革命的胜利。在十月革命后最初的年月，托洛茨基主义指靠的是小资产阶级当中有冒险主义情绪的阶层，他们为了实行所谓“革命的侵略性”策略，即为了到其他国家人为地“推进革命”，准备牺牲苏维埃俄国劳动人民的历史性胜利成果。在二十年代，托派又决定依靠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形色色小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最后，在三十年代，托派在被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后，便同公开反对革命的最疯狂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成联盟，并且极力向切齿痛恨正在苏联建设的社会主义，痛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个别小资产阶级分子寻求共同的语言。

托洛茨基主义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则力图首先取得有“左”倾情绪的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并且通过这种办法从组织上和政治上加强自己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主要的托派集团现在都打着“左”的旗号。

我们在注意到托洛茨基主义的上述策略手段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指出，现在的托派依然是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直接继承人。现代托派完全赞同先辈的政策和策略，并同他们一起分担托派全部反革命活动的责任。托派现在虽然部分地放弃了自己的“祖师爷”的观点，

甚至有些地方还同他有直接矛盾，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并没有改变原先的立场。

弄清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与本世纪最初三十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共同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加强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过去与现在的批判攻势。这种态度完全符合列宁的以下要求：“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①

如果从1903年托洛茨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次登台表演算起，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存在了七十多年，其间也包括了它在政治舞台上几乎完全销声匿迹的漫长时期。

托派分子竟把自己的历史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诞生到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作亵渎性的对比。波萨达斯集团出版的意大利文理论刊物《欧洲马克思主义杂志》夸口说：“马克思主义用了七十年时间才使自己的预见得到证实，我们就不需要这样的七十年”^②。托派想使没有政治经验的青年们相信，历史的真理在他们一边。

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冒牌的理论“发现”和实际行动，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同二十世纪的伟大历史真理以及世界革命的客观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托派一贯地扮演着同一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② 《欧洲马克思主义杂志》，1972年第7期第25—26页。

个角色——敌视社会进步的破坏力量。它有史以来从没有为劳动人民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提供过任何有益的思想。在有关革命、社会主义、战争与和平的一切基本战略问题上，托派总是同最露骨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和它的革命先锋队。

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白雪皇后》中谈到，从前有个极凶恶的特罗利（在斯堪的纳维亚童话里特罗利是传说中的怪物），他造出了一面不寻常的镜子。一切好的和美的东西经它一照，几乎全都化为乌有，最好的人也变成令人十分憎恶的丑八怪。特罗利曾设馆收徒，他的门徒把那面镜子吹得神乎其神。他们说，现在才算看到了人类和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带着镜子开始周游世界；不久，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被这面镜子歪曲过。

托洛茨基很象是童话中的特罗利，他的拥护者和继承人则象是看到歪曲世界的镜子而兴高采烈的“特罗利信徒”。声名狼藉的“不断革命论”便是托派手中的魔镜。

七十年代托派在一些地方找到了一些轻信的人，他们便怂恿这些人用托派的镜子观察世界。现在他们又幻想对世界事态的发展进程施加某种影响。

然而，这是一种连托派自己也未必相信的妄想。同他们有交往的人越来越看清，他们的行为和构想包藏着祸心，他们是故意不愿清醒如实地估计世界上发生的事态，他们敌视革命、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是出自本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托洛茨基主义很早以来就受到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始终不渝的优待。在三十年代的西欧许多国家，如果在工人那里发现共

产党的书刊或传单，他们就要遭到解雇或者监禁。而当时的工厂管理机构却在厂内免费散发赶印出来的小册子《托洛茨基说什么？》，劝工人去“熟悉”托派搞出的宣传材料。

而在七十年代的今天，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又打算从同一块托洛茨基主义的田地上取得“第二次收获”。托洛茨基的名字又常常出现在反共的出版物上。他的书成百万册地再版。许多专题著作、通俗小册子、杂志、报纸都在写他。出现了描写他的电影和戏剧。

现在帝国主义宣传机器鼓吹托洛茨基主义，要比三十年代卖劲得多。那时的资产阶级出版商谁也没有产生过为托洛茨基出版“文集”的念头。而现在他们在这方面却争先恐后地想压倒竞争对手。

宣传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辩护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厚颜无耻。他们发动了喧嚣一时的宣传运动，要求为托洛茨基和他的“学说”“恢复名誉”。

那又有什么呢，即使是硬说三头鲸鱼驮着地球的“学说”，也可以提出“恢复名誉”的要求。但是那改变不了地球和地球的运动有自身的规律这个客观事实。要求为托洛茨基主义“恢复名誉”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那改变不了历史本身已经对托洛茨基主义作出无法推翻的评价这个客观事实。历史是不会改变它的判决的。

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支持托洛茨基主义的活动，至今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托洛茨基主义的抬头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无产阶级思想必然压倒机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趋势的不可

抗拒性，在当前的时代得到更加有力的证实。非无产者各阶层的长远利益和切身利益促使它们向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寻求共同的语言。

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与实践，是反对同帝国主义反动派互相勾结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勃列日涅夫在谈到反对机会主义的意义时强调指出，这种斗争“不能作为一种运动仅仅在某一段时间内进行。回击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过去是而且今后仍将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可动摇的法规”^①。

共产党人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意识到自己对革命先辈和后辈所负的责任。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对待公开的和隐蔽的革命敌人，方无愧于共产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为全人类共产主义明天而奋斗的战士的崇高称号。

^① 《遵循列宁的方针。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2卷第602页。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